



14

ZHANHOUGUOJIZHONGDASHIJIJIANJISHI

●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

艰难历程

——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始末

● 卫灵 著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丛书

艰 难 历 程

——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始末

● 卫 灵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豫生

封面设计：丁 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艰难历程：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始末/卫灵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丛书)

ISBN 7-5012-0859-X

I. 艰… II. 卫… III. 反种族歧视斗争-南非 IV. D747.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042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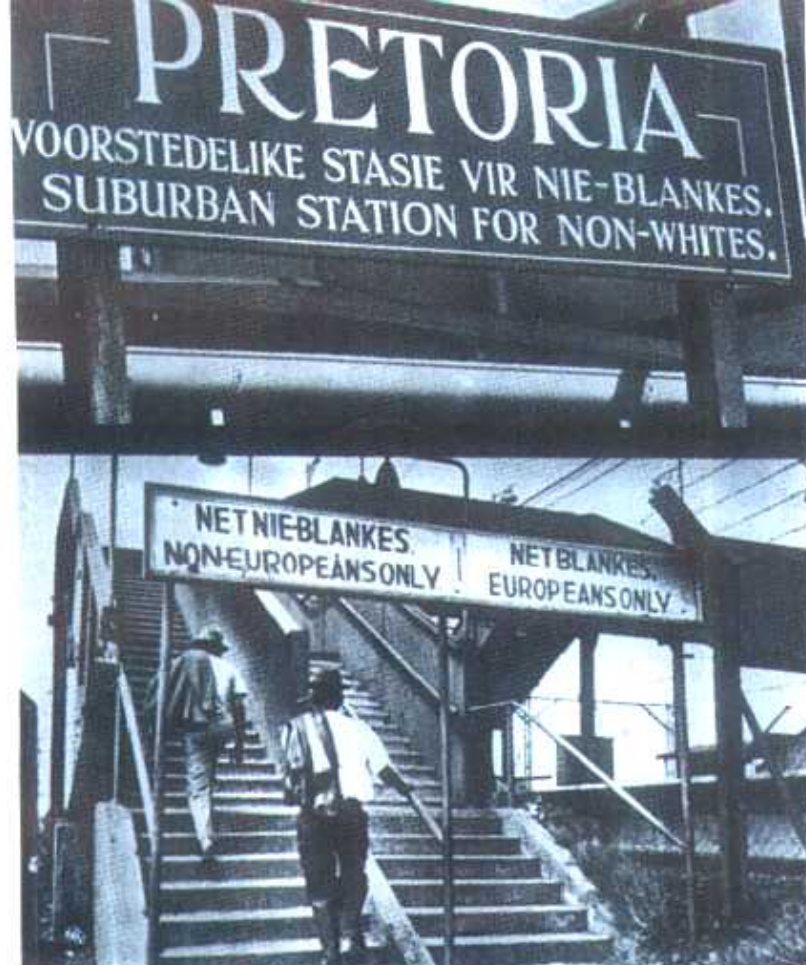
北京盼润得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6 5 插页 2 字数 138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定价：8.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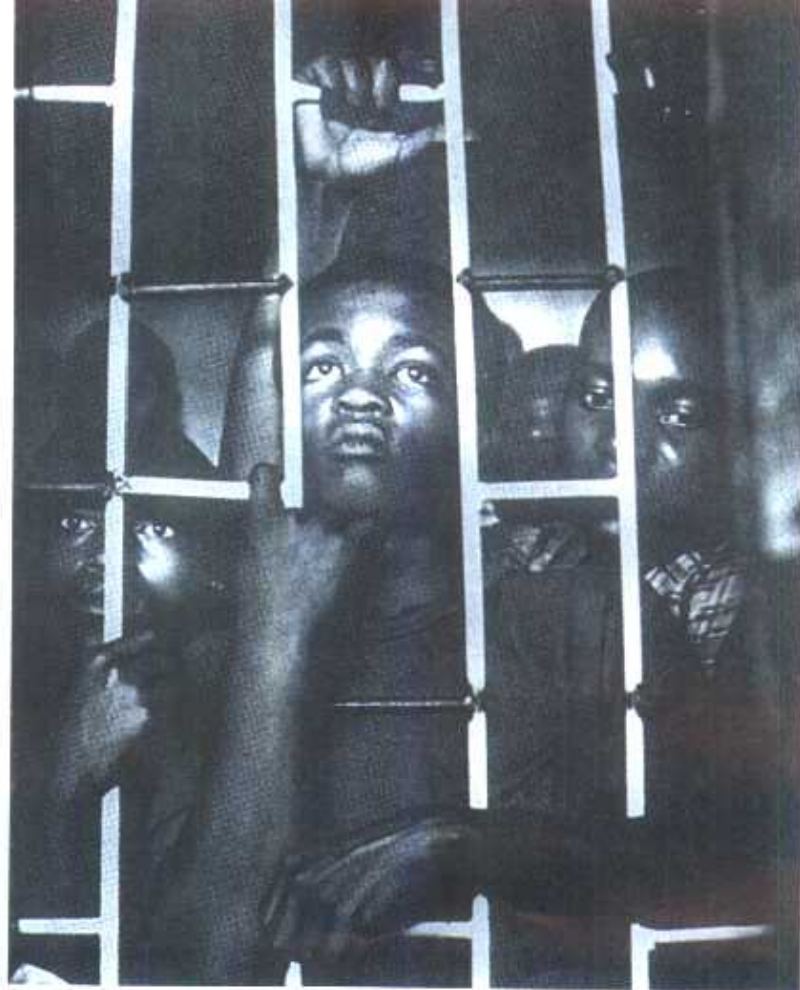


黑白之间，泾渭分明（左边为非欧洲人通道）

黑人去白人区域工作，要有印上指纹的官方证明



黑人孩子因踏入白人地区而被拘捕



白人警察肆意殴打黑人



南非警察残酷镇压黑人的民主运动



黑人领袖曼德拉被监禁在狱中达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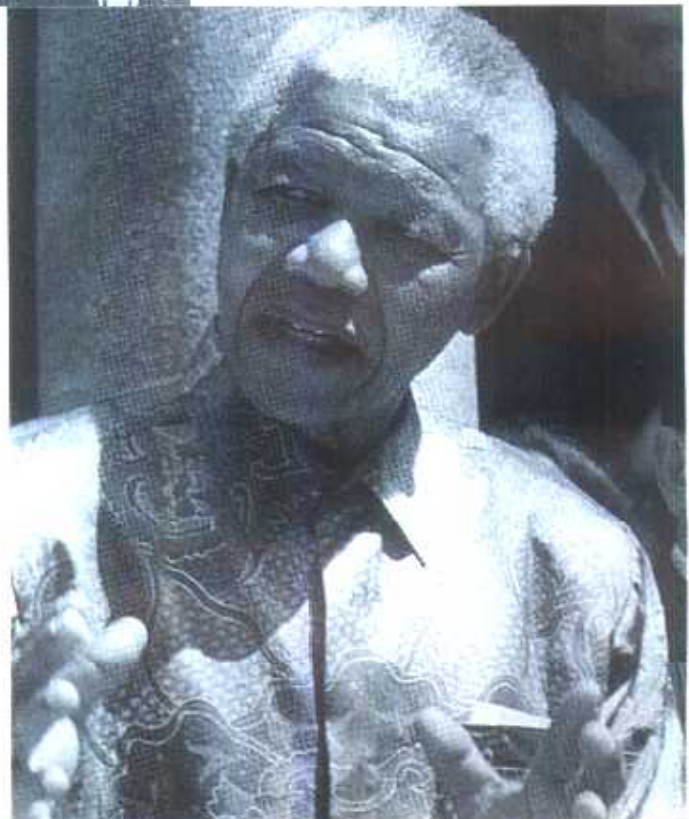


1990年2月，曼德拉出
狱时受到成千上万人欢迎



迫于形
势与黑人领袖接触
原南非总统德克勒克

黑人在大选中获胜，曼德拉
于1994年5月当选南非总统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血迹斑斑的历史

● 南非的土著黑人	3
● 荷兰人来了	8
● 后来者居上	14
● 殖民者的贪婪	20
● 英布战争	25

第二章 带来苦难的黑皮肤

● 从保留地到黑人家园	34
● 让黑人挤在角落里	41
● 可恶的通行证	48

- 黑白分明的“职业保留” 53
- 无处不在的肤色歧视 59

第三章 追求种族平等

- 反种族主义者组织起来 70
- 血气方刚曼德拉 77
- 蔑视不公正法运动 83
- M—计划与《自由宪章》 89

第四章 曲折的斗争道路

- “叛国罪审判” 97
- 他属于温妮，更属于人民 106
- 放弃非暴力主义 115
- “历史将做出判决” 123
- 高大滚滚寒流急 134

第五章 行将就木的种族主义

- 无力回天的博塔政府 144
- 愿把牢底坐穿 150
- “释放曼德拉” 158
- 国际社会的愤怒 164

第六章 扬起六色国旗

● 审时度势的德克勒克	174
● 布满荆棘的改革之路	180
● 制宪谈判扬帆起航	186
● 新南非的诞生	192
 尾 声	 196

引 言

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共和国，美丽而富饶。它的东、南、西三面为印度洋和大西洋所环抱，长约 2500 公里的漫长海岸线给南非带来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历史上曾以其特有的神秘色彩，吸引着一批批探险者舍命前往；今天，又以其海之角、天之涯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各国的旅游者纷至沓来。在拥有 122 万平方公里的南非国土上，德拉肯斯山脉和朗厄山将全境一分为二，形成内陆高原和沿海平原两部分。内陆高原一望无垠的天然牧场，绿草如茵，牛羊遍野，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一副如诗如画的景象。在雨量充足的沿海地区，一片片蔗园和蔬菜水果园将大地装点得色彩斑斓，生机盎然。

尤其使南非人感到幸运的是，上苍赐予南非丰富的金矿，使其黄金蕴藏量高居世界第一位。然而上百年来，这笔巨大的财富给南非带来的不仅仅是喜，也有悲。它使南非这片土地充满诱人的魅力，白人蜂拥而至，掠夺、厮杀和战争接踵而来。南非土地上再也寻不到一丝宁静，早已受到西方殖民者不公平待遇的南非黑人，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白人与黑人、侵略与反侵略、统治与反统治、种族隔离与反种族隔离，构成近、现代南非历史发展的主角和主线。

在南非共和国 3400 万人口当中，黑人占 70% 左右，其次为白人和有色人。占人口主体的黑人，长期以来却不能成为

国土上的主人，他们饱受白人移民及其后裔的役使、欺辱，在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挣扎、抗争。他们的遭遇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在黑人以血和泪汇合成的反抗浪潮的推动下，在时代向前迈进的脚步声中，南非黑人终于在 21 世纪的大门即将敞开之前，敲响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丧钟。

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制度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它在南非黑人心中刻下的累累伤痕，却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历史越是不堪回首，就越发难以忘却，它留给人们的不光是心酸和苦涩，悲痛和愤怒，还有深深的思考……

第 一 章

血迹斑斑的历史

● 南非的土著黑人

早在欧洲白人到来之前，南非广阔的土地上就休养生息着土著黑人，他们是科伊萨人和班图人。科伊萨人又可细分为萨恩人和科伊人。早期的白人移民分别称他们为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这本是白人对他们的蔑称，前者的意思是“森林中的矮人”，后者的意思是“愚笨的人”，以后逐渐成为习惯上的称呼。

大约 8000 年以前，也就是石器时代晚期，布须曼人就占据了南部非洲。他们身材矮小，男子的平均身高不过 1.5 米左右，头发又短又黑，并且像螺旋球似的卷曲在一起，被人们称为“胡椒粒”状的头发。布须曼人前额很低，鼻子很宽，眼睛塌凹呈线状，手、脚都不大，四肢也显得不够粗壮。

直到 17 世纪中叶第一批白人移民到来时，布须曼人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男人狩猎、女人采集是他们生活的基本内容。每天，男人们携带着自制的最简陋的工具外出捕获野兽和鸟类，女人们则出去采集野生植物和各种昆虫和爬虫。蝗虫和白蚁是他们很喜欢吃的东西，逮到后用火烧一烧，便嚼咽下肚。由于食物来源的特点，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当猎物

和可食植物在居住地附近明显减少时，他们就迁居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他们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他们的住所往往以一棵挺拔粗壮的大树为支柱，周围用树枝编搭成一个圆形的遮风帐，或者搭成一个半圆形的茅草屋。

布须曼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确十分低下，但是却也过得很安逸，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天与大自然打交道，与月亮和太阳相伴随。在现代人的眼里，这种原始生活自然是无法忍受的，顶多作为旅游项目尝试一下，调节调节紧张乏味的城市生活也就可以了。但是在原始人看来，只要食物来源充足就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布须曼人留下的岩石画中，人们可以清楚地辨析出许多布须曼人欢快起舞的场面。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布须曼人，崇拜的也是自然界中的某种物体。特别是对月亮和其他天体，他们最为崇拜，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方面的许多神话传说。在他们眼中，人间的一切都在这些具有超自然力量、有灵性的东西的控制之下，所以布须曼人虔诚地祈求它们保佑自己丰衣足食，人人平安，不得疾病。在北部地区，布须曼人常常谈起一个叫“高阿”的崇拜物，相传他与死者的灵魂相识，能够决定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是最令人恐惧的。为了部落的平安，布须曼人要祈求他施予关怀，尽量减少他们的灾难。

霍屯督人起源于东非地区，在人种学上同布须曼人是“近亲”，一般认为是由布须曼人和早期进入东非的闪米特人混血而成。大约在1500年至2000年前迁到南非地区。

霍屯督人在肤色、体形、头发、脸形等方面与布须曼人都很相似，只是个子稍高些，眉骨更高一点。

霍屯督人虽然也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懂得饲养牛、羊等家畜。不过他们很少宰杀家

畜，只在举行重要仪式的时候才开杀戒，他们饲养的目的是为了喝牛、羊奶。

家畜的饲养更加促使霍屯督人逐水草而居。当他们感到居住地附近土地变得贫瘠，自然环境恶化了的时候，就会寻找并迁往水草茂盛之地。他们往往在居住地把房屋搭成圆锥形，屋子和屋子之间基本不留空地，有序地一个挨一个地围成圆形。中间留出的一片空场就成为夜间圈牛羊的地方。

霍屯督人的部落比起布须曼人来要大得多。布须曼人的部落一般不超过 80 人，而霍屯督人的部落人数众多，大约在 500 到 2500 人之间。部落中似乎已经有了贫富之分，穷人给富人放牧，富人以牛羊奶或幼畜作为他们的报酬。各部落酋长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享有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但是他却不能独断专行，处理部落内部一些重大的事情时，必须在各氏族首领组成的部落委员会上商议讨论，然后做出裁决。

霍屯督人也崇拜月亮，常常祈祷月亮赐予他们食物和雨露。在关于霍屯督人的神话传说中，时常提到赫齐·埃伊比布。相传他和他的家人有着各种奇妙的遭遇，他死后的坟墓形成一个个巨大的石头堆，霍屯督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见到这样的石堆。每当经过石堆时，他们总要加块石头或插根树枝，默默祈祷，据说这样能够求得生活中一切如意。霍屯督人还普遍崇拜萃高布，畏惧高纳布。他们把前者视为救世主，能给人间带来富裕和昌盛，保佑他们年年风调雨顺、牛羊满圈；他们把后者看作魔鬼之王，是疾病和死亡之祸根，人们死后的鬼魂都要被他召走，很像我们所说的“阎王爷”。

班图人的黑肤色较浅，他们的发源地在刚果和喀麦隆热带森林地区，大约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他们经过东非草原向南迁徙。在迁徙过程中，他们或是将当地土著人排挤走，或

是逐渐将当地人同化。由于班图人的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黑人部落，他们很快向南推进并繁衍开来，并将自己的生产技术传播到东部和南部非洲地区。这就是非洲历史上著名的班图人大迁徙。

在西方人到来之前，班图人早已落户南非地区，并成为当地黑色人种的主体。他们懂得了农业耕作，主要种植高粱、玉米、南瓜、花生和豆类作物。他们用五谷杂粮煮粥、酿酒，有时也生吃。显然，班图人已经比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进步多了。耕作方式采用锄耕，最早是木锄或骨锄，掌握了冶铁技术后，又有了铁锄。在班图人部落中，农业耕作主要由妇女承担，男人们负责畜牧业，有时也帮着做些平整土地这样的重活。

冶铁技术的掌握使班图人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他们用铁制作工具和武器，也制作饰物。不过，家里大部分生活用品还是木制品、皮革制品和骨制品，人们的衣服都是用兽皮做成的。这样，也就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取其他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与此同时，也满足了部落成员对手工业品的需要。不仅如此，班图人还同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进行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他们用铁制的矛头、箭头、刀、斧子，铜制的手镯、耳环、项圈等从布须曼人那换来兽皮，从霍屯督人那里换来牲畜。

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需要，使得班图人不再四处流动，他们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定居下来，形成一个个小村落。村落和村落之间挨得很近，每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来来往往，也显得挺热闹、红火。

一夫多妻制在班图人中十分盛行，一般情况下，一个男人有2个到3个妻子，富有的人娶4个到6个妻子，甚至更

多。班图部落有着童年订婚的风俗，订婚时，男方向女方家里送上几头牛就可以了。结婚后，妻子就成了丈夫的奴仆，按班图人自己的话讲就是：“她必须劳动，因为她是丈夫用钱买来的，她是丈夫的牛。”

白人踏上南非土地之前，班图人大大小小的部落分布各处。各部落是独立的，部落酋长由人们公认为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平时他领导部落内部的经济活动，有权分配宅基地和耕地，组织集体狩猎；战时，成为战斗的指挥者。部落成员要向酋长缴纳一定的物品，供酋长吃穿用，而酋长则有责任救济贫困者，帮助有了灾难的部落成员。

在班图人中，盛行祖先神灵崇拜。每个父系大家族都崇拜自己的祖先，求祖先神灵保佑子孙们一生平安，全家每日有饭吃，有奶喝。遇有家人结婚、生子等喜事，班图人绝对忘不了膜拜祖先神灵，感谢神灵的恩典。

班图人迷信所谓“先兆”，认为无论好事坏事在发生之前都有各种先兆。为了避邪免灾，人们普遍佩戴护身符。猎人、战士、牧人的脖子上都挂着木制或骨制的珠子，或者是从巫师那里求来的饰物，他们相信，这些东西都有灵性，可以抵御危险和疾病，祛除鬼魔缠身。

在南非数百年、上千年的变迁中，科伊萨人和班图人共同生活、繁衍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以他们特有的抗争力，从自然界获取衣食。相互之间有争斗，有厮杀，但更多的是争斗后的相安无事，专心劳作，他们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过着安宁、自由的日子。

然而，这种虽然是落后的、但却是安宁的生活，终于随着白人的到来结束了。

● 荷兰人来了

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南非海岸的白人。其实，葡萄牙人的本意并非是寻找南非海岸，他们当时对这里不感兴趣，他们一门心思、不顾一切地要寻找的是通往东方的航路。14、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传播，里面向欧洲人介绍了大量他们闻所未闻、令他们感到难以置信的东西，使欧洲人大开眼界。其中，最让欧洲人激动不已的是东方的黄金珠宝、珍禽异兽、奇花异草。一时间，欧洲出现了“黄金热”，商人、航海家、封建主纷纷在“黄金热”的驱使下冒险远航，仿佛中国、印度等东方古国黄金遍地，俯首可拾。他们带着发财的美梦，争先恐后，生怕让别人捷足先登，自己错过发财之良机。

15世纪初，葡萄牙人已到达非洲西北海岸。以后又沿着非洲海岸向南推进。经过一次次的探航，到15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踏上了佛得角。在以后的二三十年中，葡萄牙人先后到达几内亚、加纳等地，他们在所到之处，采掘金矿，掳掠奴隶，贩卖象牙和香料。

1487年，探险家巴托罗缪·迪亚士率领船队，从里斯本出发，又一次踏上远航的路途。途中，他们遇上了一场大风暴，船队被吹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等到风暴过去，他们已经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了。他们试探着向前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中寻找着陆地。最后，他们终于惊喜地发现，船队已经绕过了非洲最南端。这时，船员们已经疲惫之极，不愿继续航

行了，纷纷要求返航。当他们在返航途中，重新经过好望角时，据说迪亚士大发感慨，把这个几乎让风暴将他们吞没的地方称为“风暴之角”。回到国内后，他向国王作了汇报，葡萄牙国王自有高见。国王认为，这里是非洲海岸由向南延伸改为向东而去的转折点，它使人们增添了寻找东方航线的信心和希望，是向东行驶的新的起点，所以不如称之为“好望角”。从此，“好望角”的美称便留传下来。时至今日，只要人们一提到好望角，就会不由地想起“开辟新航路”的昨天。

在15世纪的欧洲各国中，葡萄牙是积极推动航海探险的国家之一。葡萄牙国王为了扩大统治范围，获取更多的财富，支持远航冒险活动，为远航船队提供各种装备。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都成为“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和最初王室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等到欧洲其他国家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远落其后了。

继迪亚士之后，探险活动如同汹涌的大西洋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南非沿海就成了探险家们的必经之地。1497年7月，瓦斯科·达伽马在葡萄牙国王的支持下，率领船队，出征远航。这只船队由170名水手、4艘船只组成。他们于11月下旬到达好望角。达伽马这次接受了10年前迪亚士的教训，令船只避开激流，绕道向西南方向行驶一段后，平安地绕过了好望角，驶入印度洋。船队沿着南非东海岸而上，于1498年3月到达了莫桑比克。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善长海上贸易的阿拉伯人，热情的阿拉伯人主动为他们领航，使他们成功地到达印度，实现了葡萄牙人多年来的愿望。船队从印度运回了大量香料、丝绸、象牙、宝石等，纯获利高达此次航行费用的60倍！

通往印度的航路开辟之后，往来于南非海岸的商船更加

频繁。船队经常靠岸停留，补充给养，与南非当地黑人自然少不了打打交道。1510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德·阿尔梅达从印度回国，在好望角背风处的桌湾停留，不想手下人胡作非为，与科伊人发生冲突。科伊人面对这些白皮肤的外来客毫不示弱，用自制的毒箭打败了葡萄牙人。阿尔梅达和75名卫队队员都中了毒箭，一命呜呼。这一远航史上的黑色插曲，加上从迪亚士起就对南非沿海气候的坏印象，葡萄牙人竟然再也没有想过要在南非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他们宁愿去征服安哥拉、莫桑比克那些看起来更加安全、富饶的地方，在那里寻找金矿、贩卖黑奴，并且使它们成为葡萄牙人去远东途中的重要给养补充地。

葡萄牙人没有选中的地方，17世纪中叶被荷兰人看中了。从此，南非开始了被侵占和殖民的历史，南非再也没有了黑人自己的一统天下。

17世纪初，荷兰海上贸易发展迅速，其船只遍航世界各地，为此有“海上马车夫”之称。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告成立，它竭力排挤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势力，称霸印度洋海面之上。荷兰人为了彻底打击葡萄牙人的海上贸易，曾经想占领莫桑比克，但是被防卫森严的葡萄牙人赶走了。最后，好望角成了荷兰人插足非洲的突破口。

164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艘货船在返航回国的路上遇上风暴，在好望角触礁搁浅。船上的人只好上岸。科伊人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提供牛羊，允许他们耕耘种地。荷兰人直到这时才发现，好望角地区真是块宝地。这里阳光和煦，土地肥沃，清泉爽口，气候宜人，是一片地中海式的农业耕种区，非常适合欧洲人的拓殖和发展。一年以后，这批荷兰人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回到了国内，把他们的所见所闻

大大宣传了一番，并且建议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建立船舶供应站。

1652年4月，范·里贝克率领90名公司派出的士兵和水手，携带妻子和家人，到达了桌湾。范·里贝克十分精明强干，很有商人头脑，所以公司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便决定由他率队前往名叫开普的地方建立据点。临行之前，他领受的任务是：为公司的船只提供淡水、肉类、草药以及其他食品；抵达目的地后，建立一个设防要塞；开辟土地，种植蔬菜。范·里贝克喜欢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他感到自己可以在开普大显身手了。不过，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一行90人踏上好望角的那一时刻起，南非历史的发展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也作为在南非定居下来的第一批欧洲白人被载入非洲史册。

非洲大陆上的第一块殖民地就这样诞生了。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于少招惹是非的考虑，规定本公司派出的人员必须与当地土著居民搞好关系，违者处罚。荷兰人在非洲初来乍到，又有公司的规定制约，自然十分小心。为了防御土著居民的袭击，他们甚至自己主动建筑篱笆围墙，把自己的生活空间同当地人隔离开来。这道圈了6000英亩土地的篱笆围墙，也就成了南非第一个种族隔离的象征。不过，这时的种族隔离还不是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种族隔离，因为它没有压迫和被压迫的意义，说得确切些，应该是“种族隔阂”。

然而，这一局面维持的时间不长。随着白人移民的不断增多，随着他们占有欲望的膨胀，白人很快打破了篱笆墙，向土著人的领地扩展地盘。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日趋频繁，科伊萨人反抗殖民占领的斗争开始了。可他们的武器装备毕竟太落后了，只有标枪、弓箭的科伊萨人在几次大规模的、持

续性的反荷斗争中，都遭到了失败。许多黑人被屠杀了，天花病的流行又使几乎一半科伊萨人丧生。剩下的科伊萨人有的在开普殖民地沦为奴隶；有的越过奥兰治河，以后又迁往纳米比亚；还有的躲进了森林，以免再遭不幸。

荷兰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东印度公司对移民的管制和约束也不断调整。实际上，公司的某些决定鼓励了移民对土地的强占行为。按照规定，他们只要向公司缴付 5 英镑费用，就可获得 6000 英亩到 1 万英亩的土地。划地的方法很简单：在选好土地上，骑马向四周跑出半个小时，所跑过的范围内的土地就都归属缴纳了费用的人了。据说，当时各户人家之间相距得挺远，彼此看不见对方烟囱里冒出的炊烟。

土地倒是多了，可这样一来，种地的劳动力就不够了。为了补充南非土著奴隶的不足，荷兰人不得不从外面运来奴隶。范·里贝克解释说：“我们不可能没有奴隶。因为，如果殖民者都置身于劳动中，那么对我们来说，要想保卫开普这个要塞免遭可能的进攻，人力就显得不够了。”他们首先从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西非海岸运来奴隶，接着又从东南亚地区运来大批的亚洲人做奴隶，仅 1658 年，就从马来亚运来奴隶 400 名。

有人种地干活了，还得让荷兰移民有长久定居的打算。为了鼓励他们在南非安家立业，使荷兰永久占领这块土地，东印度公司作出这样的决定：向南非移民点补充女人。因为最初来到开普的白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妇女极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普殖民议会还于 1656 年通过一项有重大原则意义的决议：不阻止荷兰人同有肤色的妇女及女奴通婚；如果未婚妻是女奴，她的未婚夫要向她的主人赎身。看来，最早登上南非海岸的欧洲人并没有把同当地人、或者同运入南

非的女奴通婚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南非混血人种。直到今天，大部分混血居民仍然聚居在开普省，操着一口南非荷兰语——最早的荷兰移民后裔所讲的以荷兰语为基础的语言。

考虑到不同人种、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会影响荷兰白人的“纯洁性”，当时有关婚姻的议会决议上附加了一个条件，即未婚妻要懂得荷兰语，要皈依基督教。不过在那种特有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规定常常无法兑现。有这样两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1656年4月26日，有一个叫杨·乌捷斯忠的人娶了一个来自本格里亚的女奴安东尼娅为妻，安东尼娅不大懂荷兰语，更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

同年9月29日，一位叫安东尼·缪列尔的人娶了一位孟加拉族的女奴，她叫多明戈·埃尔雯，她对荷兰语和基督教更是一无所知。

荷兰移民更加不顾一切地在开普创造着自己的家业。他们的领地在扩大，财产在增多。早期的移民非常勤奋，但勤奋中透着贪婪；他们吃尽创业之苦，但背后是填充不满的欲念。这一点他们自己说得很清楚，17世纪末的开普总督范·德·斯坦尔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整个非洲也不足以容纳他们和满足他们。”

继荷兰人之后，德意志人、法国人也相继加入了移民的队伍。他们不顾路途遥远和海上风高浪险，也来到开普这个诱人的地方。当时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为了躲避国内的宗教政治迫害，一些人便结伴而行，逃到南非。不过从数量上看，他们只是南非白人移民的极少数，其绝大多数还是荷兰人。这支以荷兰人为主的白人移民队伍逐渐地发展，他们的后裔历

史上称为布尔人。“布尔”一词是荷兰语“农民”的意思，以后在南非殖民地成为“农场主”的同义语。

布尔人开南非殖民统治制度之先河。他们在开普设立了一套殖民统治的行政机构，用来维护布尔人的“至尊”地位，压迫有色人种。1682年，开普的布尔人为663人，随着其地位的确立，人数也在直线上升。1694年将近千人，1750年增加到5000人，1790年已达14600人，共拥有奴隶制农场1974个。

正当布尔人充满自信、充满优越感地在南非土地上勾划着自己未来时，英国人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美梦。

● 后来者居上

比起葡萄牙、西班牙甚至荷兰来，英国的海外扩张行动迟缓了一步。但是它爆发力强，后劲又足，很快便于17世纪取得了海上优势。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先后败在英国手下，不是丢掉了殖民地，就是失去了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权，荷兰经过17世纪50到70年代同英国的3次战争，干脆丧失了海上强国的地位。英国在击败了一个个海上劲敌之后，眼光便瞄准了非洲地区。

1806年，英国军队进占好望角，大摇大摆地、堂而皇之地占领了开普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苦心经营了150多年的开普殖民地，从此成了英国人的天下。

拿破仑一世战败后，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正式确认由英国接管开普殖民地，英国政府向开普委任的总督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首领。紧接着英国又在这里设立了法院、立法委

员会等各种机构。英国移民纷至沓来。1820年，英国把4000移民送到了开普东海岸，20年后，仅开普首府——开普敦的人口，就已达到了2万。

英国人的到来，令布尔人忐忑不安，他们不清楚今后是祸是福？他们以十分敏感的态度观察着英国人的一举一动。不久，他们的担心被证明并非是多余的。

英国人首先搞币制改革。此时已感到自己在海上是战无不胜的英国人，怎么能在新占领的土地上使用他国的旧币？1825年，英国正式宣布以英镑取代荷兰盾。布尔人手里的荷兰旧币一下子变得不值钱了，他们经过几代人攒下的一笔钱在兑换英镑时大为贬值，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他们痛心疾首。

接着，英国又宣布废除奴隶制。早在维也纳会议上，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奴隶贸易是罪恶的贸易，应当废除。因为按照英国资产阶级的看法，19世纪初期奴隶贸易已经无利可图。所以英国人先在开普宣布禁止贩卖奴隶。1828年，又颁布了《关于改善霍屯督人及开普其他自由有色人种处境》的法令，被布尔人欺辱、赶杀得四处躲藏的霍屯督人，这下子有了购买土地的权力和自由迁居的权力。布尔人要想把他们变为奴隶使用是不可能的了。英国人的行动到此还没有结束，最让布尔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834年12月，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各殖民地奴隶制的法案在开普生效！这对布尔人来讲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他们无法接受，也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奴隶劳动为布尔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的农场是靠奴隶们的双手和汗水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废除了奴隶制，今后的农场经济该如何发展和扩大？布尔人不敢想象。

此外，英国人还设置了巡回法庭，每年到各地巡回审理

当地的案件和纠纷。布尔人开始受制于英国的司法权。科伊人以为英国人要为他们主持公道了，纷纷前来告状，倾诉冤屈。其实，英国人不过是为了全面实施殖民地的统治，通过对当地人的安抚，达到其控制当地人的目的罢了。但是布尔人对这一做法愤怒之极。100多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对当地人为所欲为的做法，如今，原来只有做他们的仆人和奴隶资格的科伊人竟然要起诉控告他们了！于是，有人不接受传讯，拒绝前往法庭受审，其结果自然是自找倒霉，在和英国人派出的警察部队发生冲突后，被当场打死。

英国人到来后的统治方式，在布尔人中不断引起骚动，甚至是轩然大波。他们似乎明白了当初他们的祖辈踏上南非土地后，给当地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不安、恐惧和愤怒，布尔人该是怎样遭到当地人的诅咒，就像他们现在诅咒英国人一样。

在英国人势力的扩张和排挤下，1836年到1854年间，布尔人大规模地向内陆地区迁徙。他们在安德里斯·波特吉特、彼得·雷提夫等领袖人物的率领下，离开了已经休养生息了6代人的土地，几十人一组，上百人一队，舍家弃业踏上征程。临行前，雷提夫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阐释大迁徙的原因和目的，希望英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将来不受外来干涉，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并表示了今后同英国人分道扬镳的意图。布尔人的壮年男子骑马携枪走在迁徙队伍的前后左右，妇女和儿童乘坐牛拉的大篷车一路颠簸地向前赶路。他们分三路进入内地：一路向北走，渡过瓦尔河进入德兰士瓦；一路向东行，越过德拉肯斯山脉进入纳塔尔；还有一路走到奥兰治一带便停下来安营扎寨了。

在大迁徙过程中，布尔人遇到了班图人各支的顽强抵抗，

使布尔人为逃避英国人统治的迁徙行动付出了血的代价。而对班图人来讲，布尔人的大规模迁移无异于一场大的灾难，他们的领地陆续被来犯者占领，他们的亲人大批地死于白人的枪炮之下。

武器装备上明显劣于布尔人的班图族人，渐渐学会发挥人多的优势，四处伏击小股的迁徙者。他们能打则打，打不赢便跑。其中力量相对强一些的是祖鲁人。

祖鲁人最初只是一个仅有 2000 人的部族，后来他们征伐四邻，先后兼并了 30 多个部族，力量日益壮大。祖鲁王国第一位统治者名叫恰卡。1819 年，他率领骁勇的部下，经过 3 天苦战，打败最后一个部族，完成了祖鲁人的统一大业。相传战斗结束后，部下问他说：“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的王国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好呢？”恰卡一时感到为难。他来回踱步，低头不语。正在这时，西边乌云遮天，紧接着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不多时，又雨过天晴，一道彩虹跨越天穹，山川、原野、树木、庄稼，罩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恰卡抬头凝视这一美景，脸上不禁泛起笑容。他兴奋地喊起来：“就叫祖鲁吧！我们的民族就是阿马祖鲁。”在班图语中，“祖鲁”就是“天堂”的意思，“阿马祖鲁”就是“天堂里的居民”。

就这样，祖鲁王国诞生了。迁徙的布尔人来到这里时，王国的年龄还不满 20 岁。一次，一支 70 人左右的布尔人迁徙队伍闯入班图族祖鲁人的领地，祖鲁国王丁干佯装友好接待了他们，然后在布尔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将他们全部抓获，用木棒击碎脑壳的办法把他们一个个处死。

1838 年，雷提夫率领布尔人来到了丁干的王国，他想以签约的办法获得祖鲁王国北部的土地，结果在前往签约时，他和他的随从被祖鲁人全部打死。布尔人果断地开始了报复行

动。1838年12月，布尔人以安德里斯·比勒陀利乌斯为首，组织起一支464人的民团，来到恩康姆河畔。他们选择了有利的地形，摆下了所谓“牛车阵”。这是布尔人在迁徙中对付土著居民的特有战术。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交通工具——牛车，一遇情况便将它们排成环形，作为射击时的掩体和屏障，然后用火力把敌人控制在一定距离之外，这样来打败那些人多势众、但无任何枪支弹药的土著人，达到以少胜多的目的。这一回，布尔人更是做好了充分准备，枪支火炮一应俱全。16日凌晨，1万多名祖鲁人在丁干的率领下向布尔人发起进攻，他们使用人海战术向布尔人的阵地冲击。一排人倒下了，另一排人又补上来，继续向前冲击。这种战术固然原始了一些，却也给人以气壮山河之感。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最终以祖鲁人的大败而告结束。这一战役，使3000多名祖鲁人死于布尔人的枪炮之下，他们的鲜血把恩康姆河的河水都染红了。从此，人们把这条河称为“血河”，这场战役也以“血河之役”而著称。

后来，南非黑人把12月16日这一天称作“丁干日”，用以纪念为反抗欧洲殖民者而捐躯的黑人同胞们。布尔人也把这一天定为纪念日，他们称之为“契约日”，因为布尔人曾在战前向上帝祈祷，按他们自己的解释则是与上帝订立了契约，如上帝保佑布尔人获胜，布尔人就要在今后每年的这一天为上帝而欢呼庆祝。实际上，他们把12月16日看作是自己民族的胜利纪念日。

“血河之役”决定了布尔人对纳塔尔的占领。1839年，纳塔利亚共和国建立。布尔人希望英国对共和国给予承认，以实现对其地区祖鲁人的统治。但是英国人的做法令布尔人大失所望。英国殖民者认为，纳塔利亚共和国的存在对他

们的统治是潜在的危險，于是在1842年出兵纳塔尔，次年7月宣布兼并该地区。纳塔尔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

布尔人欲哭无泪，他们感到自己成了英国人的开路先锋。或者说他们栽树，倒让英国人乘了凉。虽说不甘心如此，却无对付之良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英国人轻而易举地摘了桃子。

此后，布尔人纷纷离开了纳塔尔，先后集中到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地区。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布尔人终于在1854年2月，和英方签订了公约，英国承认奥兰治地区的布尔人独立，组成“奥兰治自由邦”。1856年12月，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也建立起自己的“南非共和国”，英国人也承认了它的独立地位，以显示自己的宽宏。至此，南非土地上出现了英、布殖民统治并存的局面。两个英国殖民地：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和南非共和国，双方经过长期的较量和争斗，达成了暂时的妥协。

布尔人终于在英国人统治的夹缝中争取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在奥兰治和德兰士瓦重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农牧场，并且依然使用奴隶劳动。他们认为这里是布尔人的天下，英国人的话可听可不听。布尔人还在其共和国内实行赤裸裸的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政策。如在德兰士瓦，布尔人先后做出以下规定：

1853年宣布，黑人的土地可以随意占领；

1854年宣布，禁止黑人拥有武器、子弹或马匹；

1870年，建立“通行证制度”，没有白人主人或布尔官方签署的通行证，非洲黑人不得自由行动；

1888年规定，禁止黑人在夜间9点后上街行走，非黑人奴隶必须在特定的“保留地”居住，向布尔人政府交纳捐税并服徭役。

在奥兰治自由邦，欲壑难填的布尔人并不以占领奥兰治的全部土地为满足，他们希望将更多的土地归为己有。19世纪60年代，自由邦政府两次出兵打败了巴苏陀人，侵占了他们的大片土地。

在布尔人看来，尽管在征服南非的过程中也有挫折，也遇到更强的对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天生的主人，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而非洲黑人是劣等种族，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无可指责的。

● 殖民者的贪婪

英国殖民者同布尔殖民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具有疯狂的扩张欲和占有欲。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实力更强，并且更善于伪装和粉饰自己。对待土著居民，布尔人公开地、赤裸裸地采取了鄙夷、奴役的态度和做法；而英国人则很绅士风度地表现出自己的“人道主义”和“公正不倚”精神，然后再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说，布尔人如同举着块牌子，上面写着粗话“黑鬼滚开”；那么英国人则挥着彩旗，柔声地说“这里是我们的”。

当英国殖民者无止境地扩展土地的时候，土著黑人也像当年对付布尔人那样，同英国人进行了一番较量。

科萨人是班图族的一支，世代居住在开普一带，白人移民的领土扩张直接威胁了他们的生存。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在18世纪就开始了和布尔人的战争，经过3次大规模的战争，阻止了当时布尔人向东扩展的打算。

英国人来到开普后，科萨人继续用最原始的武器不断袭

击这些前来抢夺地盘的人，同英国人共进行了 6 次战争。这样，科萨人抗击欧洲白人的战争前后共延续了上百年之久。

科萨人在战争中几次攻入英国人占领的地盘，他们焚毁农场，赶走白人，搅得英国人不得安宁。但是，装备的落后，军队素质的悬殊，使得科萨人最终败在英国人手下，向东退去。科萨人曾经求助于神灵的保佑，他们听信了祭司的话，遵照“神灵的旨意”，杀死饲养的牲畜，烧掉生长的庄稼，相信这样就可以借助神的力量把白人赶入大海，他们自己则会获得更多的谷物和牛羊。结果，神没有显灵，奇迹没有发生，科萨人倒由于饥饿死亡数千人，其锐气严重受挫。对神的崇拜加速了科萨人的失败。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人在南非的扩张也激起了祖鲁人的强烈反抗。

当时的祖鲁国王恩芝瓦约意识到先进武器装备的重要性，派人去莫桑比克向葡萄牙人买来一些枪支弹药。很快，一支由几百条步枪装备起来的 4 万人的军队成立了。

1878 年 12 月，英国殖民者出动 6 个营的兵力，开往祖鲁王国的边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祖鲁人 30 天内解散军队，并且接受开普殖民地英国总督的管辖。这些要求遭到恩芝瓦约的断然拒绝。

一个月后，一支 6000 多人的英国军队在 200 英里长的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入侵祖鲁王国。祖鲁人在恩芝瓦约的亲自指挥下，佯装撤退，诱敌深入。英军连续搜索了 10 天，始终不见祖鲁人的踪影。英军中有人开始发牢骚，加上战线过长，物资供应紧张，士气有些低落。1879 年 1 月 22 日，一支英军来到一座山脚下安营扎寨，等候补充军需品。天色渐晚，疲惫不堪的官兵来不及修筑任何工事，连弹药箱也没打开，倒

头便睡。夜幕完全降临后，几千名祖鲁战士在国王的率领下，兵分两路，悄悄避开英军巡逻队，向敌营左右迅速包抄过去。随着一声哨响，祖鲁军队一齐冲向敌营。睡眼惺忪的英国人大惊失色，四处逃窜。祖鲁人用长矛和英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杀声、哀嚎声交织在一起，月光下刀光剑影在闪烁。祖鲁人奋勇杀敌，英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几乎全部丧命。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祖鲁人打死打伤英军 1700 多人，并且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英国人对此也很感叹。英国的战地记者是这样描述的：“祖鲁人像潮水般地迅速向前推进，一分钟也不停留，悄悄地把我们全部包围，这时，他们就一声呐喊，向军营猛扑过来。5 分钟后，我们就连一个活人也没有留下。”对于祖鲁人的顽强抵抗，当时欧洲许多国家都给予关注和评论，恩格斯也不无赞赏地说，祖鲁人“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

此后，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的英国人重整兵力，卷土重来。他们调集了 2 万大军，配备了 5000 支步枪和 36 门大炮，再次进犯祖鲁王国。1879 年 7 月 4 日，祖鲁军队与英国军队在乌伦迪附近决战。英国人在几百米宽的地带上，使用了新式武器。祖鲁军队损失惨重，被迫撤退。英国人攻下了首府乌伦迪，国王恩芝瓦约也被俘并被押送英国。1887 年，祖鲁王国被正式并入英国纳塔尔殖民地。

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英国殖民者时时刻刻祈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和金钱。南非钻石产地和黄金产地的发现，使得英国人由坐立不安，到拼命去争夺，最后终于同布尔人爆发了战争。

1867年，在奥兰治河与瓦尔河汇流处的西格里夸兰地区，发现了第一块钻石。当时是一个小女孩在玩耍时偶然捡到的。不久，人们又在这里发现了第二块、第三块……。1871年，在瓦尔河南岸发现了原生钻石床，其储量之丰富为世界所罕见。接着，又在德兰士瓦北部发现了金矿。欧洲随即沸腾了，出现了“钻石狂”和“黄金潮”，成千上万的欧洲淘金者和冒险家涌进了南非。只见商人们关上了店铺，士兵们离开了军队，水手们抛弃了船只，职员们走出了办公室，农场主抛弃了土地和牲口，他们全都不顾一切地奔向了钻石和金矿发现地，想在那里圆了自己的发财梦。开采者们聚集的村落金伯利和约翰内斯堡，此前不久还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转眼间便熙熙攘攘，变成了相当繁荣的城市。1886年，约翰内斯堡已经有了10万人，90年代末，达到了16万人。

钻石和黄金使英国人和布尔人的矛盾尖锐起来，他们都希望采矿权永远属于自己。

1867年，钻石矿一发现，奥兰治的布尔人就急急忙忙地声明，产地在奥兰治境内，是奥兰治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他们希望由此切断英国人的欲念，垄断采矿权。

英国人岂肯就此罢休？1871年，英国人索性吞并了西格里夸兰这一人们眼中的聚宝盆，把它归入开普殖民地。为了给布尔人一点安慰，表示一下英国人办事的周到，他们甩给了布尔人9万英镑作为补偿。奥兰治的布尔人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财富被英国人强行占有，心中怒火难平。

而英国人并不以此为满足。德兰士瓦发现了金矿后，英国人后悔极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南非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就该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布尔人把黄金安安稳稳地塞入囊中。英国人伺机行动。机会终

于来了，1876年，德兰士瓦东部地区的巴苏陀族人起义，反抗布尔人的统治。开普的英国总督得知此讯，兴奋之极，马上以仲裁者的面目进行干涉，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了德兰士瓦首都比勒陀利亚。1877年4月，英国人急不可耐地撕下了面纱，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英国总督宣布，兼并德兰士瓦！

英国人强占了钻石黄金产地，英国的资产阶级眉开眼笑，大发横财。1882年，英国开采钻石价值2600万英镑。黄金开采量增长显著，1887年在德兰士瓦采金1200公斤，8年以后的1895年，产量增加了51倍，也就是说达到了62000公斤，在世界采金量中所占份额为1/5强。英国在南非的垄断巨头塞西尔·罗得斯所办的矿业公司，在采矿业中获得巨额利润。1888年，获利为365570英镑，到1898年——仅10年的时间，竟达到4717000英镑。罗得斯成了“钻石热”中最大的发迹者，也是当时令无数欧洲人眼红的人物。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得意，为了说明自己是一个最有眼光、最有头脑的实业家，他挥动手臂叫到：“扩张就是一切！”他说：“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南非问题的实质在于把开普殖民地扩大到赞比西河。”一语道出了英国殖民者扩张、贪婪的本性。赞比西河在莫桑比克境内，因此，要达到罗得斯所说的这一点，就必须扫清北上的道路，吞并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自然就成了不可缺少的步骤。对这位有影响、有实力的“淘金者”所说的一番话，英国殖民当局很是赞赏，罗得斯简直是在为英国的扩张、吞并行动摇旗呐喊。后来，罗得斯干脆直接参与政治，当上了开普殖民地的总督，积极投入到英国的扩张活动中。他成了19世纪末，英国殖民地上既有钱又有权的一位显赫人物。列宁曾经对他有过这样一句评价：罗得斯是“百万富翁、

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

面对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布尔人是不肯俯首就范的。1880年底，布尔人召开“人民会议”，决定武装反抗英国统治。12月14日，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开始行动了。他们高举南非共和国的旗帜，向英军发动进攻。英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损失200多人，布尔人乘胜进军纳塔尔。南非境内的布尔人感到欢欣鼓舞，纷纷表示声援，向英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1881年2月，在马朱巴山战役中，布尔人又一次击溃英军，英国总督也被打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只好又一次承认德兰士瓦为独立的共和国，但是同时又规定：英国保留对外交权的控制，未经英国同意，德兰士瓦不得同奥兰治共和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签订条约，更不允许向东、西方向扩展边界。

英布战火暂时止熄了。这次英布之间的战争，布尔人称之为独立战争，英国人在历史称之为第一次英布战争。

战争虽然停止了，但是矛盾并未解决。布尔人无法忍受英国附加的种种条件，盼望着早一天摆脱束缚，而英国人也没有就此放弃吞并两个布尔共和国的打算。更激烈的冲突和战争还在后面。

● 英布战争

19世纪90年代，是欧洲大国疯狂瓜分非洲的年代。老的、新的殖民国家，早来的、晚来的殖民者，都想得到尽量多的一块土地、一份利益。南非地区的富有，更使其无法摆脱被争来夺去的厄运。

经历了数百年战争与分裂的历史，直到70年代才实现统

一的德意志帝国，本无一块殖民地，但它自诞生之日起，便像一头狮子一样，四处寻找着猎物。80年代中期，它已成功地插足非洲，强占了多哥、喀麦隆，以及西南非和东非的一部分，摇身成为非洲的殖民大国。如果把非洲殖民地的面积与德国本土的面积相比较一下的话，前者已大于后者5倍。即使如此，德国的饥饿感还远未消除，它梦想着把德属东非和西南非洲连成一片，从而在非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从印度洋到大西洋的殖民帝国大厦。这样一来，它就必须控制两个布尔共和国。

德国人为了打击英国人在南非的势力，挖空心思向布尔人表示友好。他们首先从感情上进行笼络，声称日耳曼人和布尔人都属于条顿种族，鉴于这种亲密的血统关系，当然义不容辞地要对“亲兄弟”加以保护。然后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布尔人国家进行猛烈渗透。

布尔人也积极向德国人靠拢。不管德国人究竟是不是布尔人的“亲兄弟”、“最忠实的捍卫者”，起码他们可以利用德国人来抵挡一下英国人的压力，甚至在夹缝中实现领土的进一步扩展。

这样，英国人、德国人、布尔人三股殖民势力，便各怀野心、难以说清道明地在南非土地上摆开了较量的阵势。

1893年到1894年，布尔人准许德国承担修筑德兰士瓦境内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比勒陀利亚一直通向迪拉果阿湾的洛伦索—马贵斯。这条铁路通车后，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便有了一条直接通向印度洋的道路，英国人就更难控制德兰士瓦了。英国总督罗得斯本想把修筑权抓到手，以便控制布尔人，但是没有成功。德国自然很是得意，为了强调修筑铁路之重要，在竣工的时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专门拍来了

贺电。由于德国横插一脚，长期存在的英布矛盾更加复杂化了。

德国在德兰士瓦的活动使英国人坐卧不安，本想通过外交途径给德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但是非但不起作用，还招得德国皇帝一个劲地表示抗议。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一看英德相互较劲，乘机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指令置若罔闻。为了防备英国侵吞自己的国家，进一步采取了亲德的方针。

罗得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可是有德国人撑腰，对布尔人又能如何摆布？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以极端手段推翻布尔政府。

1895年12月29日，在罗得斯的精心策划下，南非公司经理詹姆森率领着一支800人的队伍，携带4门大炮和6挺机枪，从西面悄悄侵入德兰士瓦，企图一举拿下克鲁格政府。他们首先进军约翰内斯堡，本想从这里继续北上，直捣比勒陀利亚。不想，布尔人早已加强了防范，时刻警惕英国人的来犯。英军踏入德兰士瓦不久，克鲁格便接到消息，他立即派出一支600人的部队，由克龙杰将军指挥，前往迎战。布尔人利用对地理环境的熟悉这一有利条件，将英军引诱、包围在一个小山谷中。当詹姆森发觉情况异常，想撤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只听一声呐喊，山谷中杀声响起，布尔人猛烈袭击来犯者。英国军队好似瓮中之鳖，只有束手就擒了。这一仗，英军被打死134人。

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英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搞得十分被动。

德国人不失时机地站出来，主持“正义”。1896年1月2日，德国政府向英国政府发出照会，坚决抗议袭击德兰士

瓦的阴谋活动，表示德方不愿看到对德兰士瓦的现状作任何改变。

与此同时，德皇威廉二世向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发出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祝贺他“依靠本国的人民而不求助于友邦，成功地粉碎了武装匪徒的入侵”。克鲁格收到电报，高兴的心情不需言表。其实，他也很明白德国人的意图，这封电报与其说是打给他的，不如说是给英国人看的。英国认为，威廉二世发出的电报简直是对英国的挑衅行动，于是派出海军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了一番示威。

由于罗得斯的“詹姆森袭击”计划搞得实在糟糕，英国惨败不说，还受到了欧洲舆论的谴责，所以罗得斯被迫于1897年辞去了开普殖民地总督的职务。

对于英国来讲，吞并布尔共和国，只是迟早的事情。之所以遭受了挫折，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已。此时，英国在非洲的殖民计划，即所谓“C—C计划”正在实施之中。C—C计划是“开罗—开普敦计划”的英文缩写。根据该计划，英国要在非洲从北至南修建一条纵贯非洲的大铁路，从而建立一个英属非洲殖民大帝国。吞并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是实现该计划的重要步骤。罗得斯在位的时候，就以威胁、欺骗、镇压等手段侵占了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已经处于英国殖民势力的包围之中，如同一个孤岛。但是这个孤岛有德国做其靠山，因此，欲铲平孤岛，必须先清除德国这个严重障碍。为此，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以争取德国放弃对布尔共和国的支持。一旦实现了这一点，英国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对布尔人开战了。

善于玩弄外交手腕的英国政府，迎合德国的扩张心理，于1898年同德国签署了瓜分葡属非洲殖民地的协定。德国认为

既然已经得到了好处，得让且让吧，于是同意不再给布尔人以支持。德国哪里知道，英德协定墨迹未干，英国就又在背地里与葡萄牙签订了一份密约，表示英国要保护葡萄牙殖民地的领土安全，调整了英葡关系，使得英德协定对德国的许诺化为乌有。

一切准备就绪，就差有个合适的机会了。从 1899 年春天开始，英国就不断进行挑衅，公开干涉德兰士瓦政府的内政。5 月底 6 月初，英国开普殖民地总督米尔纳同南非共和国总统克鲁格举行谈判，讨论德兰士瓦外国侨民的选举权问题，其中包括英国移民在内。按照德兰士瓦原有规定，外国人在本地居住时间满 14 年，才享有选举权。米尔纳提出应当修改选举法，改 14 年为 7 年。克鲁格经过慎重考虑，点点头答应了。米尔纳见状又逼一步，提出缩短到 5 年为宜，不想克鲁格又同意了。于是米尔纳又提出了更多的、令对方无法接受的政治性要求并预料会遭到拒绝。克鲁格看清楚了米尔纳的用意，便不愿再同他啰嗦，谈判终于破裂。英国以此为借口，在德兰士瓦边境集结了大量军队。

战争一触即发。克鲁格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索性于 10 月 9 日向英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军从德兰士瓦边境撤离。11 日，英国政府断然拒绝接受。于是，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于当日向英国宣战！英布战争爆发了。

英布战争从 1899 年 10 月 11 日一直打到 1902 年 5 月 31 日。

战争初期，布尔人明显占据优势。他们集中起 6 万人的军队，从数量上看，是南非英军的 2.4 倍；从士气上讲，他们同仇敌忾，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从作战能力上分析，他们熟悉地形，适应环境，并且善于骑射，具有非凡的马上射

击技术。而英国人依仗优越的武器装备，自恃军队素质高，一开始就没有把布尔人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同布尔人作战，不如说是去镇压乡下人造反。由于思想准备不足，英军连吃败仗。

布尔人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分三路出击。一路向东南方向进军，由儒贝尔将军率领；一路向西进发，由“詹姆森袭击”事件的得胜将军克龙杰率领；还有一路向南推进，由德·拉·雷伊将军指挥。

东南方面军越过德拉肯斯山脉，在累迪史密斯城将英军主力部队团团围住，然后发起进攻。布尔人作战勇猛，敢打敢冲，打得英军无招架之力。布尔军队迅速向前推进，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纳塔尔北部地区。

克龙杰将军率领的西路军，很快进入贝专纳境内，包围了马弗京重镇，之后挥师南下，直捣钻石矿业中心金伯利。布尔军队遇到英军一个族的兵力，双方展开激战。这时，倒是布尔人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了。他们一鼓作气，拼杀到底，使英军几乎全军覆没。

南路军则强渡奥兰治河，把战火烧到开普殖民地境内。英国人没想到布尔人竟然打到了家门口。在英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布尔军队迅速占领了开普东北部地区。

英军节节败退，慌乱之中，赶紧调兵遣将。1900年春天，英国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调来大批增援部队，英军数量激增到25万人，超过了布尔军好几倍。英国还派来了极富作战经验的罗伯茨将军。而此时的布尔人，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忙着把刚刚占领的地区并入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共和国的版图。布尔殖民政府甚至考虑，要建立一个包括博茨瓦纳、纳塔尔、津巴布韦和其他地区在内

的庞大的“布尔非洲帝国”。

战争局势开始向有利于英军的方向转变。英军集中优势兵力，运来新型大炮，在罗伯茨将军的指挥下向布尔人发起反攻。布尔人这时才意识到形势不妙。前线越来越吃紧，后方偏偏又起了火。布尔殖民者统治下的非洲土著居民趁着布尔军队出征作战的机会纷纷起义，弄得布尔人狼狈不堪，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本来应当从后方调遣部队增援前线，结果不但抽不出增援力量，甚至还要把部分兵力从前线撤回后方，用来镇压土著居民的起义。

英军很快在东南战线上挫败了布尔人的军队，把他们赶出了纳塔尔。西线英军由罗伯茨亲自指挥，收复了金伯利这一矿业重镇，并且把克龙杰将军率领的布尔军队围困起来。经过9天9夜的较量，布尔军队损失惨重，被迫投降。南线战场上的布尔人虽然作战勇敢，但是力量过于悬殊，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只好撤军。

战场迅速推向布尔共和国境内。1900年3月初，面对像潮水般涌入境内的英国军队，布尔共和国提出停战要求，但是遭到拒绝。英军已是胜利在望，岂有此时罢手的道理？3月中旬，奥兰治首都布隆方丹失陷。不久，英国宣布兼并奥兰治自由邦。英军乘胜前进，于6月初攻下了南非共和国首都比勒陀利亚。英国大获全胜，3个月后正式宣布兼并德兰士瓦。

布尔人又一次丧失了独立，可他们不愿屈服，在暗中继续进行打击英国人的抵抗活动。一部分布尔人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拉出人马，上山打游击。他们不断骚扰英军驻地，切断英国人的交通线，袭击小股英军部队，整日神出鬼没，令英国人大伤脑筋。

为了给布尔人致命的打击，英军指挥部决定：彻底摧毁布尔游击队赖以活动和生存的农场。他们毁掉大片大片的庄稼地，杀死牛羊，把布尔人的妻子儿女赶出家园。英国人还用铁丝网圈起一个个集中营，把成千上万布尔人赶入集中营，虐待他们。许多人由于饥饿和患病死去，死亡率超过30%，其中儿童的死亡率最高。在铁路沿线，英军修筑了许多碉堡，但凡有人走近铁路，举枪便射。

虽说都是白人殖民者，但是在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上，他们却是不共戴天的，不拼个你死我活是不肯罢手的。

第二次英布战争共延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英国战费支出2.5亿英镑，投入兵力44万人，战争中伤亡6万多人。可谓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本钱了。

布尔人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除了战死沙场的布尔人以外，大量妇女儿童无辜受害，农场几乎全部被毁。最令布尔人痛心的则是布尔共和国丧失了独立。

1902年4月，布尔人已经弹尽粮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与英国人举行和谈。5月31日，双方在比勒陀利亚签署和约，又称《韦雷尼京条约》。和约规定：布尔军队立即投降，承认英国的宗主权；作为补偿，英政府拨款300万英镑，帮助布尔人的战后重建工作。从此，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完全丧失了独立，被划入了英国的殖民地范围。英国政府对布尔人实行了较宽容的政策，不久便承认他们具有内部自治的权力。

英布战争对南非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布两大白人集团在黑人的土地上经过激烈地争夺、角逐、火并，不仅决出了胜负，并且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牢固地建立了白人殖民者的统治地位。1910年5月31日，经英国议会批准，南

非白人统治者正式建立“南非联邦”，它由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等4块殖民地联合组成，并且成为它所拥有的4个省，但是在称呼上奥兰治仍为“自由邦”。南非联邦是作为英联邦自治领土而存在的，首都定在比勒陀利亚——原德兰士瓦的首都；议会在开普敦——原开普殖民地首都；最高法院设在布隆方丹——原奥兰治自由邦的首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三权分立制度下的3家机构，分别设在了3个省，以求各地之间权力的平衡。剩下了一个纳塔尔，它可在货物运输方面得到某种利益上的补偿。

南非联邦的建立，标志着英、布殖民者在霸占和统治南非的道路上最终实现了联合。他们在争夺殖民地时，是仇敌，是对手；战争结束后在对付广大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方面，他们又成了伙伴、合作者。

因此，随着南非联邦的建立，南非白人政权便开始了对黑人的更加野蛮的种族主义统治，黑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殆尽。南非从此成了世界上种族隔离制度最严酷、最令人发指的国家。

第二章

带来苦难的黑皮肤

● 从保留地到黑人家园

自从白人来到了南非，黑人的厄运也就开始了。这些“外来客”从未把自己当作外来人，他们以南非主人的面目，赶走黑人、占领土地，甚至建立了白人统一政权。南非联邦诞生后，为了使占人口极少数的白人永远成为广大黑人的主宰，一项项的种族隔离法确立了。白人政权就像是在搞一项重大而有趣的发明试验，玩着一个外人变主人，主人变奴仆的游戏。他们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变换着手法，发明了史无前例的南非特有的种族隔离制度，竟然把一种荒唐的游戏变为南非 20 世纪中活生生的现实。

在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中，最基本的是领土上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对黑人土地的剥夺，是白人在其他领域中对黑人剥夺的基础。在早期的殖民征服中，白人是靠枪炮实现对土地占有的。南非联邦成立后，对黑人继续进行土地剥夺，但在方式已有了改变，主要是通过实行保留地制度和班图斯坦制度来实现的。

这时的布尔人，已经越来越多地称呼自己为“阿非里卡”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非洲人，认为南非天经地

义是他们的祖国，荷兰对他们而言已是另一个国度了。

无论是阿非里卡人，还是英裔白人，他们都自欺欺人地说，在他们的祖先占有南非这块土地之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南非宪法开宗明义地讲道：“全能的上帝世代地引导着他们，奇迹般地把他们从困窘危险的境界中解救出来，从许许多多的国家把我们的祖先集合在一起，然后把这片土地赐给他们，归他们所有。”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可是在种族隔离政策下，南非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它作为史实讲授给白人的后代。既然是上帝赐予的土地，那么也就足以说明这片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非白人莫属了。

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可使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这就是黑人始终占据了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使长期以来他们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但他们至今占到南非人口的75%以上。如果他们不是自古以来生息繁衍在这里，如果像白人说的那样，白人到来之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那么这么多的黑人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为什么“首先踏上”南非土地的白人，拼命鼓励生育，可人口比例只有13%呢？

早在白人涌入南非之前，土著黑人不仅分布在气候良好、土壤肥沃的平原地带，就是山区高原地带，也生活着许多土著黑人。当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总督曾经派出一个远征队，队长史密斯博士经过实地考察，回来后详细地报告了奥兰治高原地带的情况。他说那里有许多个子不大的人种组成的居民群，他们的统治者曼塔提西是一位有很高声望的酋长的遗孀，并说她是“一个异常聪敏、美丽和富有政治才干的女人”。可是大约一个世纪后的白人，却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毫不知晓当年白人与土著居民接触和交往、冲突和战争的那段历史。

随着南非宪法的生效，南非联邦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建立“保留地”的法令。

1913年，南非联邦政府颁布了《土著人土地法》。这项法案划出了890万公顷的土地作为非洲黑人的保留地。另外，个别黑人通过各种形式，从白人农场主那里取得了85.8万公顷有耕种权的土地，由于这些土地是零星的地块，夹在白人大片土地中间，所以被叫做“黑点”。这样，当时全国400多万非洲黑人，仅占有全国土地面积的8.5%；而100万白人却占有90%以上的土地。《土著人土地法》禁止黑人以购买、租借或其他方式在保留地以外获得土地，保留地成为黑人唯一可以合法居住生活的地区。

黑人就这样被“圈”了起来，失去了迁徙的自由。他们“分得的”土地都是些贫脊的不毛之地。要么是干旱区，常年缺少雨水，人和牲畜的饮用水极为缺乏；要么是沼泽地，不具备农耕的条件；再有就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保留地由于土质太差，一般只能种玉米、高粱和豆类，亩产很低，仅仅几十斤。每年打下的粮食人均口粮不足3个月。人不能坐等着活活饿死，许多青壮年劳力跑到矿山去打工，他们极为廉价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的只是有一口饭吃，能够活下去。

从领土上把黑人与白人隔离开的做法，在罗得斯任开普殖民地总督的时候就提出过，他当时宣称：“我的想法是：土著应该留在‘土著保留地’，根本不能同白人混在一起。”南非白人政权把殖民者的“美好想法”付诸实施了。一位白人大农场主在保留地制度实行后，带着几分得意，同时又带着明显的仇视的心理说：“这是白人的国家，不允许土著人购买或租用土地。如果土著人想靠土地生活，那么他们只能

当雇农。”

黑人并不像白人想象的那样“听话”，他们经过努力和不懈的斗争，迫使白人政权在1936年4月又通过一项《土著赎购土地法》，把黑人的保留地的面积又扩大了6.2万平方公里。这样，就使保留地从原来的9.2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5.4万平方公里，占到全国总面积的12.4%。这一次的土地划分，成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最终的土地划分，尽管以后黑人的人口增加了好几倍，达到2900万以上，但是保留地的面积却再也没有增加。

保留地制度对于黑人是极不公平的，是对他们生存权力的一种剥夺。但是对于白人来讲，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按照白人的说法，建立保留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黑人自古以来所占有的土地不被白人占有，也就是说，要把历史上属于黑人的土地永久地保留给黑人。这样一来，其他土地，即白人占据的土地，就被说成是历史上的无主土地了。白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又是那样节制自己，专门制定了保留地制度对自己实行约束，生怕侵犯黑人的利益，谁还能说白人对黑人不公道呢？

白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占有了黑人的土地，同时又达到了他们对黑人实行有效统治并赚取黑人廉价劳动力的目的：不许黑人购买白人的土地，就使得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黑点”和保留地永远不能连成一片，黑人的力量被分散了，白人的统治也就得到了维护；黑人的土地少得可怜，难以靠土地为生，便不得不背井离乡，去白人的厂矿和农场当劳工，这就为白人提供了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好机会。

可见，保留地制度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讲，都是有利于白人统治者的。一位南非白人高级官员说过这样一

句话：“只要我们成功地做到这一步——把土著保持在保留地里，白人的南非将会得到维护。”

既然地域上的种族隔离如此重要，白人便想进一步强化这一做法。1959年6月，《班图自治法》问世。法案规定，把保留地按部落区分为10个单位，每个单位都要建立自治政府，成为“自治”的班图人单位：班图斯坦。1964年，特兰斯凯成为南非共和国范围内的第一个“自治地区”，即第一个班图斯坦，设立了议会和政府。之后，从1968年到1975年，又相继建立了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夸夸、夏赞库鲁、莱博瓦、文达、坎格瓦内、夸祖鲁、夸恩德贝莱等9个班图斯坦。

按照南非白人当局的想法，建立“自治”的班图斯坦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至此他们只不过刚刚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要紧跟着迈出去，才能达到目的。这第二步就是变“自治”的班图斯坦为“独立”的国家：“黑人家园”。

最早提出在黑人地区建立“独立国家”设想的是白人政府总理维沃尔德。1960年他就表示：黑人地区可以发展成为单独的班图人管理的自治省，甚至可以使其具有更为全面的独立。第二年，他的想法更加明确了，他宣称：“迫于南非所受到的外部压力，政府应当把班图斯坦的政治演变一直引导到最后的独立。”对此他又解释了一番：“这种使南非变成好多个国家的支离破碎的局面，倘使我们力所能及的话，我们显然是愿意避免的。然而，为了白人在这个归他们所有的国家里，换取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和权利，允许黑人独立是唯一的办法。”

此番话给人的印象是，白人必须给黑人以独立，必须向黑人作出让步和妥协，这是他们保障自身基本利益的唯一出

路。也就是说，建立独立的“黑人家园”只是做了一件让黑人高兴和满意的事情，白人则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了。

其实，从保留地演化成班图斯坦，从“自治”的班图斯坦又变成“独立”的“黑人家园”，是白人统治者对黑人实行彻底的地域种族隔离，使南非完全成为白人的国家的三部曲，这是他们的根本意图所在。三部曲实施的效果，当然是掩人耳目，既缓和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欺骗了广大黑人民众，与此同时实现了他们建立“白人南非”的目的。

这是因为，不管叫作保留地，还是叫做班图斯坦，进而叫作“黑人家园”，法律规定归黑人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是一成不变的，原来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土地位置的划分也是不变的，原先是分散的、互不相连的，贫脊狭小、缺乏资源的，现在也仍然如此。所不同的是，“保留地”时期，黑人的居住地还是南非国土的组成部分，黑人当然是南非的国民；到了“黑人家园”出现时，黑人占据的土地成了“独立”的地域，占南非人口75%以上的黑人也就成了“外国人”，完全被排斥在南非国家的大门之外。

白人以“丧失”12.4%的国土为代价，换取的哪里是什么基本自由和权利，他们换取的是整个南非！

1976年，第一个黑人家园特兰斯凯宣布独立。南非白人政权热情地为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制定了第一部宪法。根据宪法，特兰斯凯黑人不再具有南非国籍，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特兰斯凯人！

特兰斯凯说是从班图斯坦变成了独立国家，可那里的一切，包括国防、外交、公安、司法、邮电、铁路、税收等等，还是要由南非政府管理，就连立法权也要经过南非政府的批

准方可确立。所以，新的“独立”国家一直得不到国际上任何国家的承认。“旁观者清”，人们知道特兰斯凯政权不过是南非白人控制下的政权，充其量来说，不过是名义上脱离了南非政权，但又依附于南非的一块殖民地。

尽管国际上没有人承认“黑人家园”的独立，南非政府自己却是煞有介事地在那里设立了“大使馆”，和“黑人家园”搞起外交关系来了。

南非白人的三部曲奏响了，按照设想，其他9个班图斯坦早晚也要“脱离”南非而“独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把南非建成一个只属于白人的国家。

如果真像维沃尔德所说的那样，白人政府这样做是“迫于南非所受到的外部压力”，那么有一点可能也是事实，这就是60年代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使南非政府心惊胆战。从60年代初开始，非洲大陆上的国家纷纷赢得了政治独立，殖民主义的枷锁被打碎。这一形势，促使南非白人殖民者及早为自己今后的出路着想，以便在革命浪潮席卷南非之前，就把黑人彻底制服。于是，他们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从“自治”到“独立”的万全之策。把黑人牢固地束缚在零七八碎的地块上，如果黑人觉醒了，起来要求做国家的主人，那你们就独立好了，白人非但不反对，而且顺应历史潮流，支持黑人“独立”。别说“黑人家园”从政治上到经济上根本独立不了，即使真正独立了，对占有南非国土87.6%的白人政府来讲，也没有丝毫影响。

对此，一些黑人政治家看得很清楚。在特兰斯凯宣布独立前夕，有6个班图斯坦政府的首席部长联合发表了一项声明，反对班图斯坦“独立”。他们在声明中讲道：“我们拒绝放弃我们生为南非人的权利。我们将要求分享主要是由我们

创造的经济财富和财产。”

继特兰斯凯之后，在白人政府的积极操持下，博普塔茨瓦纳、文达、西斯凯等也先后宣布独立。

● 让黑人挤在角落里

南非联邦成立后，除了忙着在全国范围内划定地界，确立保留地制度外，在城市地区，也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确立了“集团住区”制度，从而使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更加严密，体系更加完整。

“集团住区”又称作“特定住区”、“种族分区居住”。前面所说的“保留地”、“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等，是在领土方面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具体体现；“集团住区”则是在城市住区方面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产物，它主要是用来限制和约束进入“白人地区”，特别是进入城镇的黑人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工矿业的急速发展，黑人成批地涌入城市。城市黑人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白人殖民者又喜又忧。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大城市、工矿区、铁路区、商贸区的发展，需要不断增加劳动人手，把农村的劳动力升入城镇，黑人的到来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白人殖民者对利润的贪求。而另一方面，白人政权又担心白人会被淹没在迅速城市化的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使白人的城市很快变成黑人的城市。也就是说，白人离不开黑人，需要黑人给他们干活，为他们创造财富；但白人又不愿同黑人生活在一个空间，不愿让黑人和他们共享城市中的一切。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为了使两

方面都能实现，能够较为和谐地统一起来，于是，城市中的居住隔离制度在白人殖民者的手中诞生了。

当然，对于南非白人政府来讲，实施城市住区隔离政策也是一项“创新”。所以，也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

1922年，南非史末资政府做出一项规定，明确说明了让黑人进入城市的目的：“白人建立的、专有的城市，黑人只有在他们准备为白人服务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留在那里，而在完成任务以后应该让他们离开。”这一规定，为集团住区制度确定了基本的调子。也就是在“白人地区”居住的黑人，只能是流动人口、临时住户，他们为白人卖力气是他们得以进入“白人地区”的基本条件。一旦这个条件不具备了，他们就必须离开。因此，黑人必须具有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素质”。在白人面前，白人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不过是奴仆。主人想雇佣你了，你就可以留下，不需要你了，你就走人，就这么简单！

1923年，白人政权又通过了《土著市区法》，法案规定，到城市谋生的黑人只能居住在专门为他们划定的城市郊区——“特居区”，否则要受法律制裁。对从农村迁往“特居区”的黑人，要根据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加以限制。结果，在大工业中心、白人城区周围，出现了一批黑人住区。黑人们白天跑出去为白人干活，晚上回到被指定的狭小拥挤的住处。

白的白、黑的黑，分得一清二楚，真可谓“黑白分明”。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白人又感到受不了了。

在战火纷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经济发展很快，用“突飞猛进”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黑人流入城市的速度

随之加快，到大战结束时，在居住方面，黑白混杂的现象已很普遍了。在矿业中心兰德地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从战前的 65 万增加到了战争结束时的 90 万，到 1950 年，又增加到 100 万人以上。黑人人口在城区的迅猛增长，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原来保持的黑白分明的局面。

于是，大战刚一结束，南非白人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城市住区大加整顿，以期改变眼前这种黑白杂居的情况。

1950 年颁布的《集团住区法》在城市住区方面进行了彻底的种族隔离。法案规定：白人、黑人、有色人等各个种族都要分区居住；一个种族集团的住区只能由规定的种族居住，其他种族必须从那里迁走；一个种族的人不得在其他种族居住区内保有财产。法案生效后，南非政府立即行动，强迫黑人向城市外面搬迁。

市中心地区、繁华地区、城郊好地都划给了白人，搬迁的结果是使白人完全占有了这些条件便利的地区，独自享受市区的生活。有的地段在划分之前，并非白人人口居多数，如开普敦市中心第六区，原来有 6.1 万名有色人居住在那里，而白人只有 800 名。但是在落实《集团住区法》时，因那里地段好，是寸金之地，便当然地划给了白人。有色人只好搬家，6 万多人搬到了政府指定的远离市中心的荒凉地区。有色人在迁居中受到了很大的财产损失，特别是以经商为业的印度人，由于被赶到同一个居住区里，一下子失去了广阔市场，许多人因此而破产。

黑人受害更大了，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迁到更远的地方去住，那里的条件还不如有色人居住区。没有交通设施，没有商业区，没有电，有的区甚至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黑人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铁皮、废的集装箱和旧木箱拼搭而

成。在城里有份工作的黑人本来是令人羡慕的，但是要把这份工作做下去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黑人居住的地区一般被划在了离市区几十公里远的地方，这对生活本来就很贫困的黑人家庭来讲是咬着牙也要做下去的。有的黑人每天往返奔波十来个小时，为了家人他们苦苦地挣扎着。

几年后，南非政府又给《集团住区法》来了个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的种族隔离范围。新的规定是这样的：某一种族集团的人，不得在其他种族集团居住区里、或其他种族人的房屋里长时间停留，不得出入那里的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分享人家的饮食以及去任何俱乐部作客。

法令从各个生活方面，把黑人与白人彻底分割开了。虽然白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黑人，他们衣食住行全需要黑人来侍奉，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建设需要黑人的双手，但是他们却从骨子里鄙视黑人，教育黑人说：除了干活，不许有任何“奢望”，不许越雷池一步。

以后，南非政府又进一步规定，黑人只有在得到劳工局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进入某个集团住区，才能受到雇佣。如果劳工局认为某个黑人不符合受雇的条件，比如身体不好、懒惰、打架闹事等，就可拒绝他的求职申请，或者撤销已经签订的合同，不许他在集团住区生活下去，立即把他遣送回他所在的班图斯坦。

白人政府高级官员对他们所采取的近乎荒唐的城市住区种族隔离政策解释得明明白白。1968年他们宣称：“问题的中心是我们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给我们干活的……但是，为了使他们给我们干活，就永远不应当给予他们索取政治权利的合法资格。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否已经让他们在这里长住。”

两年后，土著事务部长博塔重申：“不管是在哪些方面，任何社会平等，都是与白人地区的黑人毫不相干的：他们在政府里没有发言权，他们既没有产业所有权，也不能从同样的职业中得到好处。”

可见，所谓集团住区制度，就是在“白人地区”里，只允许黑人出卖劳动力，不允许他们建立任何巩固的立足点，不允许他们享有任何起码的权利。黑人劳工甚至不能自由地选择雇主、选择更有利的条件去出卖劳动力。

到 60 年代初期，集团住区制度在南非全面建立了起来。仔细想来，它的中心内容不外乎这样几方面：

一是所有城市黑人在“白人地区”的居住都是临时性的，住区隔离政策不允许他们在那里永久居住，南非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把他们作为南非正式公民来对待，即使他们在“白人地区”已经居住了二三代人。在白人看来，黑人永久的家在班图斯坦，在黑人家园，他们迟早应当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区去。

二是禁止黑人在种族集团的住区内购置土地，更不允许他们在白人居住地区购买一块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权。严禁黑人在集团住区里从事比较重要的商业活动，或者从事其他独立的经济活动。

三是集团住区里的黑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长住居民”，另一类是“流动劳工”。二者的区别在于：长住居民可以同家人一起生活在集团住区里；而流动劳工只能住在单身宿舍里，不能携带家属，也不准妻儿来探望。流动劳工要想取得长住居民的身份，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不间断地为同一个雇主工作 10 年以上，或者不间断地在城里居住满 15 年以上，并且在此期间，从来没有被判处过 100 兰德以上的罚

款，或者判处半年以上的监禁。1970 年南非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统计上来的城市黑人中，持有“长住居民”证书的为 320 万人，属于“流动劳工”的有 190 万人。

四是一旦某个黑人不能继续为白人干活了，他在集团住区里的居住权也就丧失了。根据规定，凡是被班图事务官员宣布为“怠惰者”和“不受欢迎者”的黑人，都将失去居住权，他和他的家人都要被强行遣送回班图斯坦。什么人会被定为“怠惰者”和“不受欢迎者”呢？南非有关法案规定，凡是拒绝劳工局提供的职业的黑人、凡是因“品行不端”在上工之后的头一个月里就丢掉了饭碗的黑人、凡是在一年里面被雇主辞退超过 3 次的黑人，都是怠惰者。而那些“危害南非和平与秩序”的黑人和“冒犯”班图行政官员的黑人，都是不受欢迎者。

其实，黑人劳工即使做得再好，即使有了在黑人集团住区的居住权，即使成了长住居民，按照南非政府的设想，有朝一日所有班图斯坦都宣布独立了，那么，所有进入城市工作的黑人，也就都成了“外籍劳工”了。那时，白人就可以视南非黑人为“异邦人”，以更低廉的报酬，在更恶劣的条件下使用黑人劳动力了。

地域上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带来了白人和黑人生存条件和环境上的巨大差异。

在白人居住区，笔直宽阔的公路四通八达，道路两旁草坪如茵，花坛似锦，浮雕、喷泉美丽典雅，电讯交通系统极为发达，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私人住宅豪华别致。每当夜幕降临后，到处灯火辉煌，在月光的衬映下，城市的景色显得更加动人。无论是宁静优雅的比勒陀利亚，还是气势不凡的约翰内斯堡，抑或是风景美丽的开普敦，处处给人以干净整

洁，繁华发达的印象，充分显示着南非经济的富有和现代化水平。

可是，这里只能是白人的乐园，黑人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白人的居住条件是一流的。比如，在约翰内斯堡，绿荫环抱的豪华住宅楼比比皆是，白人家庭的庭院大得小汽车绕半天才能走出院墙。就连最普通的白人家庭，也是独门独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一般来讲都有宽阔的庭院、花坛、草坪、车库、游泳池、网球场等。并且要雇黑人当用人，操持管理这个大院落里的一切活计，白人自己是极少动手的。白人早已养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殖民早期的布尔人当中就已经形成了，这就是体力活、动手的活是黑人干的，白人是只动脑、动嘴的指挥者。

在黑人住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里虽然也算是城镇的一部分，但是居住环境之恶劣同白人住区的奢华形成了强烈反差，真可谓“天壤之别”！

这里见不到花坛、草坪，缺电少水，道路肮脏，垃圾成堆。破烂不堪的贫民窟里，成千上万的黑人挤在一起，有的地区集中了数十万黑人。由于没有游玩、活动的场地，孩子们便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玩耍。白天，大人们披星戴月地跑上十几里，几十里路去白人城镇里干活；晚上又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地回到住处。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一间紧挨着一间的、破破烂烂的木板棚和铁皮筒。

黑、白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 可恶的通行证

在南非这个最不人道的国度里，黑人处处受歧视、被隔离，他们不仅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力，也丧失了做人的起码尊严。通行证制度又一次剥夺了黑人应有的权利——行动自由。

通行证制度由来已久，它是南非殖民者很早就开始实行的一项隔离制度，往前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者进占好望角的时候。1806年，开普殖民政府实施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项关于通行证的法律，当时，英国人是用它来控制“流浪者”和“偷牲畜者”的。1870年，布尔人在他们所建立的共和国里实行通行证制度，规定：没有布尔官方或主人签署的通行证，非洲黑人不得自由行动。对黑人行动自由的剥夺由此开始了。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得到白人殖民者的普遍认可。19世纪末英国派驻南非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就坚持认为，实行通行证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根据通行证，“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座群魔殿。到了南非联邦成立之前，两个英国殖民地和两个布尔人共和国，都已颁布了有关通行证的规定。

统一的白人政权建立后，通行证制度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更加完备了。

20年代中期，赫尔佐格上台后，不久便颁布了《土著登记和保护法》，进一步扩大了通行证制度的实施范围。到了30年代，各种规定越来越多，证件也就不断增加。城市黑人只要出门，随身必须携带12种通行证和许可证等，即宵禁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计日工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

行证、旅行通行证、访亲通行证、计日特别通行证，以及身份证、居住许可证、特别豁免证和人头税收据等。

名目繁多的通行证搞得黑人时时处于紧张状态，稍有不慎，遗失或者忘记携带某一个证件，就会受到处罚。据统计，1931年，南非城市黑人中，光是没有按规定带“宵禁特别通行证”的，就有4万人之多，他们为此都受到了惩处。

以后，南非政府变本加厉，花样翻新，黑人必须携带的证件越来越多，40年代的时候已经增加到60多种。不论春夏秋冬，不管穿多穿少，一大堆证件必须随时随地带在身上，给黑人的行动带来许多不便。今天在旁人看来，这种做法近乎滑稽可笑，可当时却成了黑人的一大负担，特别是精神负担。对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黑人们是说什么也笑不出来的，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哀怨。

1950年，南非政府又搞了一个《人口登记法》，想在人口清查登记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实行种族主义管理。这项法案规定，凡年满16岁的南非居民，必须接受检查，以确定他到底属于哪个种族。在调查中，居民被划分为4个种族集团：白人，即布尔人和英国人的后裔；亚裔人，即印度人、华人、马来人；有色人，即混血人，他们是早期殖民者和土著妇女、亚洲妇女混血的后代；黑人，主要是班图族人，他们也被称作土著人和非洲人。其他黑种人有的在早期殖民征服中逃入别的国境，还有的被其他种族所同化，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基本特征。不同的种族，其社会地位大不一样，因此，确定每个人所属的种族成了南非政府的一件大事。尽管兴师动众，手续繁杂地搞了一番，但是结果却在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比如，有的混血人经过几代人以后，肤色与白人已没有什么不同，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也和白人一样，这时，到底是划

为白人，还是划为有色人，就很难办了。但是只要查出其祖上有混血的历史，一般就要被划为有色人了，为此，他必须离开白人住区，丢掉干了多年的、但只有白人才有资格干的那份工作。在人口登记中，还出现了一个家庭成员被划分为不同种族的情况，结果他们受到不同的待遇，一家人被强行分开，分别居住到所划种族集团的住区。

由于一些有色人与白人难以区分，据说白人便以脸上长雀斑为荣，因为有色人肤色再白，脸上都不会像白人那样长出一脸雀斑。白人处处高人一等，雀斑居然也成了一种高贵的象征。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女孩子，在白人小学读书，她聪明好学，功课优秀，备受老师们的喜爱。结果引起别的学生和家长们的忌恨。从哪儿下手来排挤这个女孩子呢？经过观察，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个女孩子脸上没有长雀斑！于是以此为突破口，家长们又煞费苦心调查，终于查出她的家族谱上曾经有过混血的历史。家长们的目的达到了：小女孩被赶出白人学校的大门，举家迁出白人住区。

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充分说明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残酷无情。一个人一旦被划归某个种族，他的一生的命运，甚至他的子孙的命运也就被确定了。

人口登记过程中，政府在调查之后发给每个人一张卡片，上面写明本人的种族和外貌特征。黑人必须随身携带，作为接受检查他的通行证件的一部分。

经过按种族分类的人口登记，南非政府于1952年又颁布了新的《通行证法》。新的法令规定，每个年满16岁以上的黑人，包括妇女在内，必须随身携带新发给的“身份证书”。人手一册的身份证书厚达100页左右，里边除了照片和上面所说的种族登记卡以外，还包括登记编号、居住许可证、纳

税收据、劳工局批准参加工作的许可证、房租交纳情况、其雇主的名字和住址、雇主每个月的签字、过去的违章记录，等等。总而言之，内容繁杂，数不胜数。

南非警察无论白天和黑夜，随时随地可对黑人进行检查。黑人受到盘查时，必须立即出示全部证件，否则就要受到罚款和监禁。遇到蛮横的警察，动作稍微慢了点或回答问题不合其意，还要挨一顿拳脚。

黑人为此受尽了屈辱和迫害。据统计，《通行证法》颁布后，每年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黑人因违反法令而遭到逮捕和监禁。平均每4个16岁以上的黑人中，每年就有一个受到刑事追究。1973年至1974年，黑人因违反通行证法而被处罚的人数比上一年度明显减少，但是平均每天仍有1400人受审。也就是说，1天24小时里，差不多每分钟有1个人被逮捕。

著名的南非黑人领袖、今天的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

《通行证法》是非洲人最痛恨的立法之一，它使得任何一个非洲人都会随时受到警察的监视。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男人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由于《通行证法》而被投入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的调查：因为违反通行证法被捕的黑人一般处以30到90兰特的罚款，或者30到90天的监禁，最重的罚款250兰特，或者250天监禁。此外，南非当局还有一种处罚手段，就是把被拘捕的黑人送往白人农场和

矿山，为农场主和矿主做苦工。在劳动力缺乏的地区，这种“犯人”劳动力很受欢迎，司法部门和农场主、矿主全都从使用“犯人”中得到了好处。

在南非，许多黑人认为，种族隔离制度中，对黑人最为残酷的、最不人道的，当属通行证制度。由于它太繁琐、太复杂，即使黑人想“遵纪守法”，也是很难不打折扣地做到的。南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1984年举行马拉松赛跑时，要求一位黑人选手按照规定，把通行证带在身上参加赛跑。可是通行证厚厚的一本，带着它太不方便了。为了不影响成绩，又不违反规定，最后采取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办法，就是把通行证的封面复印下来，然后别到了这位黑人选手的运动服上。

通行证法让黑人们吃尽了苦头，1959年到1960年，黑人组织“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了“反对通行证法”运动，该组织的领导人把反对通行证法作为黑人争取自由，赢得自由的第一步。1960年3月21日，黑人们响应号召，纷纷把通行证放在家里，然后涌向街头，聚集到警察局门前，示威者自愿被捕，以表示抗议和不满。在黑人城镇沙佩维尔，上万人将警察局团团围住。警察向人群施放催泪弹，但不见效果。于是，这些恼羞成怒的白人警察便举枪向人群射击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惨案发生了！随着一阵疯狂的扫射，示威的黑人们一个个倒下了，来不及散开，来不及跑掉。有的人在向外跑时，还被警察从背后瞄准射中。鲜血染红了街道，白人警察共打死黑人69名，打伤176名。沙佩维尔惨案激起了更多的黑人的愤怒和反抗，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酋长当众烧掉了自己的通行证，号召黑人们在3月28日不要去上班，哀悼黑人死难者。这一天，许

多大城市发生了大罢工和示威游行，使工业区的生产和港口码头的运输陷于瘫痪。联合国安理会于4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南非当局在种族平等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缓和种族冲突。安理会对南非政府给予了谴责，这在联合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但是南非政府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以血腥手段，扑灭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通行证法”运动。黑人继续在失去行动自由的屈辱中忍受着、在白人的控制和监视下煎熬着，同时也在哀怨和愤怒之中寻找着抗争之路。

● 黑白分明的“职业保留”

在就业者的队伍中，肤色决定了他们的工种好坏，薪水的高低。一道不可逾越的“肤色壁垒”，把黑人限制在了工作最累、条件最差、待遇最低的工种上。这就是南非种族隔离的又一大“特色”：“职业保留制度”，也叫做“有色人种差别待遇”。

在南非联邦成立后的第二年，政府就颁布了《矿业劳动法》，规定工矿企业要按照种族录用工人，不准非白人从事熟练工种，开创了南非政府依肤色定员定编的先例。根据这个法令，工矿企业中的机械师、电工、钻工、司机、司炉工、爆破工等，都要由白人充当，其他种族均不得染指。据估计，这一法令为白人保留了32个职业，保护了7000多名白人就业。

但是，事情总有个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三年里，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南非经济也由于世界金融

市场的金价下跌而遇到了严重困难。英裔白人资本家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减少经济上的损失，他们降低工人工资，包括白种工人工资，职业上的肤色限制也开始松动了，白人资本家愿意雇佣更廉价、更愿意卖力气的黑人劳动力。而几乎与此同时，大量破产的荷裔小农场主涌入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不懂技术，一无所有地来到城市，人们习惯上称他们为“穷白人”。这些“穷白人”自早期殖民时期以来，一直鄙视体力劳动，以自己的白色皮肤为自豪，长期过着农场上使唤黑人劳动、家里让黑人伺候的生活。他们的种族主义思想之浓厚，种族歧视观念之严重，俱在英裔白人之上。如今，虽然已经沦落到了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仍然从骨子里蔑视黑人和黑人工种，宁可失业，也决不愿与黑人为伍，从事一份他们认为只属于黑人的工作。

这样一来，便产生了白人资本家与白种工人之间的矛盾，因为白人资本家可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钱袋，去照顾什么白人种族的利益。让那些什么都不懂的“穷白人”去担任他们难以胜任的技术性职业，白白享受高工资，简直是天方夜谭。虽说黑人受教育程度极低，也不懂技术，但毕竟便宜得多，于是为了渡过经济难关，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资本家扩大了雇佣工人的范围。白种工人忍受不了了，他们组织起来，于1922年1月发动了著名的兰德矿区大罢工。数万名白种工人，学习过去布尔人的做法，组织战斗小组，包围警察局，强烈抗议资方松动职业肤色限制的决定。罢工斗争持续了数周。白人的罢工惊动了南非政府，政府于3月10日颁布紧急状态法，罢工又演变成了武装起义，上万名白种工人携带枪支控制了几处金矿。政府出动飞机、大炮、坦克前往镇压，总理史末资亲自指挥镇压行动，终于将这次大罢工淹没在血泊

之中。

史末资虽然镇压取得成功，但是他所领导的南非党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批白人社会的支持力量，阿非里卡人抛弃了史末资政府，1924年大选中，代表英裔资产阶级利益的南非党惨遭失败。

国民党—工党政府取而代之。国民党成立于1914年，参加者多数是阿非里卡人，主要代表农业资本家的利益。当时许多由“穷白人”而来的阿非里卡工人是它的忠实信徒。国民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奉行极端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新上台的赫尔佐格政府，正是以“有色人种差别待遇”为号召，赢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

赫尔佐格上台后，把以前已有的种族主义法令继承了下来，但这样还远远不够，他要把过去被削弱了的种族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强，从来没有过的，他要创新。他开始宣传“黑色危险”，告诉白人，如不采取措施，黑人将淹没白人，白人的文明将被毁灭。所以，他的政策之一就是确认白种工人的特权，使他们不用再担心会同黑人劳工进行公平竞争。

1924年到1926年，各项种族主义措施都以法律形式端了出来。《工业调停法》、《工资法》、《矿业劳动法修正案》，一个接着一个登台亮相，为白人享有择业特权呐喊，为设置肤色壁垒助威。这些法案要求各行各业把黑人调离熟练工作岗位，让白人取代之。也就是在一切经济生活领域中，由白人垄断高报酬的职业。黑人只能干粗活、重活、脏活，领取很低的工资报酬。为了防止黑人的不满，法案还规定，黑人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白人工会也不接受黑人入会。这样，没有了组织的黑人自然形不成气候。但是白人政府还不放心，又规定黑人工人无权与雇主谈判，如果采取辞工、缺勤、罢工

的方式进行反抗，即以刑事罪论处。

1948年，国民党终于如愿以偿，单独执政了。它进一步采取法律和行政措施，强化职业保留制度。国内的各种职业都有具体规定，各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也都有细致到家的规章。比如，在开普敦，只有白人才能当司机、护士和消防队员，警察中要保证白人的比例占82%。在布隆方丹、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连电梯由谁来开都有明文规定：凡建筑业、保险业、银行、财政、商业、医院、收容所、教育机关、报社、矿山等行业和单位的电梯，一律由白人来开，其中运送黑人的电梯、运货电梯可由黑人来开。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省，规定在建筑业中，黑人只能干挖地基、和灰泥、露天砌墙的活，其余全部工种都留给了白人。

职业保留制度使白人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们不用再担心因为没有技术，没有本领而找不到工作。“穷白人”都有了工作，受过教育的白人，有技术的白人都有一份报酬可观的职业。白人的确实现了充分就业，他们十分轻松地抱上了有政府法律保障的铁饭碗。

但是白人的铁饭碗都是以牺牲、打碎多少个黑人的泥饭碗换来的。为了保证白人的就业，成千上万名黑人被解雇，一些有经验的老工人也难以幸免。为了支付“穷白人”的工资，政府在一些国营企业中把黑人的工资削减了1/4—1/2。

黑人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了。他们无处去申诉，只能接受眼前这一罪恶的现实，把熟练工种、半熟练工种的位置让给白人，去干白人不愿干的职业，去干白人干不过来的活。职业保留制度使黑人失去了提级晋升的机会，一辈子给固定在了劳动强度最大，工资最低的岗位上。

有人曾对南非的就业人员情况做过调查，发现白人在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工、推销销售人员中所占比例很高，分别达到 97%、89%、78%、78%；而黑人仅占 1%、6%、3%、13%。但是在运输人员中，白人仅占 7%，干纯笨重体力劳动的白人比例几乎为零；相反黑人比例却在 70—80% 以上。

由于就业机会不同，白人与黑人的工资差别也大得让人难以相信。比如在矿区，1936 年白人的平均工资是黑人的 10.7 倍；到 1960 年，竟扩大到了 17.5 倍；10 年后，工资差别进一步拉大，白人平均工资已是黑人的 20.3 倍。黑人矿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难以养家糊口。黑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始了接连不断的罢工。团结就是力量，罢工迫使资本家忍痛为黑人提高工资。黑人矿工的待遇总算有了一些改善，不过和白人矿工相比，他们的平均工资还仅仅是白人的 1/12。

除了在各个生产部门、国有和私有的公司和企业中干活的黑人以外，南非还有一大批专为白人家庭服务的黑人仆人，他们的工资就更低了，主人的意愿决定了他们的一切。如果稍微表示不满，就有丢掉工作的危险，因为白人是不愁找不到黑人给他干活的。所以，仆人的工资更无保障。

在南非的各项立法中，只有关于限制黑人最高工资的立法，以及对白人最低工资的规定，而没有对黑人最低工资的保障。这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找到的极端种族主义制度，决定了广大黑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命运。

曼德拉曾经做了这样一个调查统计：“城市非洲人中收入最高、最富裕的在约翰内斯堡。但是他们的实际处境仍极其恶劣。1964 年 3 月 25 日约翰内斯堡非欧洲人事务部负责

人卡尔先生提供了最新的数字，约翰内斯堡非洲人家庭平均生活水平的贫困线是每月 42.84 兰特。卡尔先生的数字表明，在整个约翰内斯堡的非洲人家庭中，有 46% 的家庭入不敷出。”

他认为，影响黑人经济地位提高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工业中的肤色歧视。“工业中所有较好的工作都只为白人保留。此外，那些得到向他们开放的非技术性或非技术工作的非洲人也不允许组织工会。这是《工业调停法》所承认的。这意味着非洲人工人的罢工是非法的，他们被剥夺了参加集体谈判的权利，而收入比他们高的白人工人有这样的权利。历届南非政府对非洲人工人的歧视表现在所谓的‘文明劳动政策’。在这个政策下，那些在工业中不能取得成功的白人，可以在政府部门找到非技术性的室内的工作，而他们所得到的工资大大高于在工业中就业的非洲人的平均收入。”

曼德拉斥责这种职业上的肤色歧视政策，他说：“造成非洲人没有人的尊严的直接原因是白人至上政策。白人至上意味着黑人低下，旨在保护白人特权的立法使这种概念更加牢固。在南非，卑下的工作一律由非洲人干。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找一个非洲人来替他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出于这种态度，白人倾向于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不把非洲人看成有自己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情感——他们也像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那样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想挣足够的钱以使他们的家庭能适当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可哪一个家庭仆人、庭院花工或劳工能有这样的希望呢？”

人与人之间本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在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之间，根本无平等可言。白人是高贵的、富有的，黑人是卑

微的、贫穷的；白人是南非财富的享有者，黑人则只能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所以国外的一位学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南非这个盛产黄金的国家里，真正的财富“不是黄色的，而是黑色的”。此番话说得实在精辟。白人统治者、资本家，正是靠取之不尽的黑人廉价劳动力发财致富的。

● 无处不在的肤色歧视

在南非，黑与白之间的强烈反差处处可见，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就像一股恶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50年代初期，南非政府通过立法，规定在一切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于是，“白人专用”、“非洲人不许入内”、“供土著和狗使用”等字样的牌子，出现在各种公共场所。一时间，黑、白两分明。黑人与白人不仅在实质上有着天壤之别的地位，而且在现象上，也完全被隔离开来。黑人乘车、就餐、理发、邮寄、看戏、就医、去图书馆、上公园、进商场、甚至上厕所、死后埋葬等，都要与白人隔离。专供白人乘坐的公共汽车是绝不拉黑人的，黑人只能乘坐专载黑人的公共汽车；在商场里，见不到黑人与白人共同购物；在大街上，白人一出现，黑人就应当马上回避；在公园里，供白人休息的长椅，黑人是不能坐下来歇歇脚的；给白人看病的医院，对黑人从来是见死不救，否则会招来白人的指责；甚至教堂也要分为白人教堂和黑人教堂，看来在上帝面前也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了。

当年，温妮·曼德拉被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个边远小镇子上，她深刻感受到了种族隔离政策对这里的影响。这

个小镇子叫布兰福特，是阿非里卡人的王国，虽然白人只占镇上人口的 1/4，但是却以一个典型的“白人镇”而闻名。镇上有“白人区”，驱车穿过“白人区”再走几百米，柏油路就到了尽头，接下去是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小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黑人居住区。温妮就被安置在那里。近千所小屋，像一个个小盒子，死气沉沉地排列在那儿。没有电灯，没有柏油路，到处是灰尘。一场大雨过后，路就无法通行。入夜，整个居住区被笼罩在呛人的烟雾之中：人们在露天里生火做饭，靠点燃煤油灯照明。黑人如果去镇上，一切都要按“规矩”办事，处处都要与白人保持距离。比如，邮局为黑人和白人分别设立了入口处，黑人绝不能走错了地方；人行道上——有白人出现，黑人必须立即躲开。

但是，温妮却无视这样的“规矩”，她说：“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她的到来打破了布兰福特的宁静，引起当地白人的恐惧。南非当局原想让温妮在这个充满种族歧视气息的镇上受到禁锢、松懈她的斗志，没想到却使小镇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变化。

温妮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兴奋：

我闯进了阿非里卡人的王国，置身于白人中间……在警察局，我穿过那些专供白人通行的大门。有时候，警察局里挤满了农场主，我一出现，他们便自动让路——倒不是因为对我多么恭敬，而是因为要使我离开，就必须先放我过去。

在邮局，我站到只供白人使用的柜台前。

在超级市场里，总有一些个子高大、说南非荷兰语的女顾客。一见到我，她们便会跑到商店外面去呆着，

一直等到我买完东西才进去。“班图人”本来是不能进超级市场的，他们只能通过那小小的窗口购买东西。经我这么一带头，黑人也到超级市场来了。以后，我故意在店里逗留上一个小时左右，尽管我要买的也许只是一块肥皂。看到那些白人妇女等在外面，我很开心。

由于温妮是个特殊人物，白人对她只有反感、不满，却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他们要求政府早一天把温妮这个危险人物迁走，以恢复镇上原有的秩序。

温妮成了黑人的榜样。黑人们学着她的样子，开始出入专供白人使用的公共场所的大门，也不再站到小窗户前买东西了。一些白人店主忍受不了，宁肯关门停业，也不接受眼前的变化。

布兰福特的阿非里卡人的头脑是保守的，他们要固守镇上的种族隔离制度；而黑人眼中的精神化身温妮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对种族隔离制度形成强烈冲击。

1977年温妮刚来到布兰福特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温妮带着女儿去镇上唯一的一家时装店——佛西尼时装店买衣服。按照以往的“规矩”，黑人买服装只能站在店门口，指着看中的衣服对售货员说：“我能看看那件衣服吗？”售货员便从货架上取下衣服，拿到门口让黑人顾客看看。可温妮不管这些，她领着女儿就往店里走。白人女售货员马上跟过来，要求她们赶快出去。那里的人无法想象，让黑人进入店里直接选购衣服，特别是让黑人摸过、甚至试穿过的衣服，再让后面想买衣服的白人去摸、去穿！售货员大声呵道：“你们必须站到外面去！”“不，我们要买这件衣服。”温妮和她争辩起来。

镇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由于温妮的到来而发生了。人们纷纷围拢过来，当温妮母女俩离开时装店的时候，外面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警察也赶来了，而且是从奥兰治自由邦的首府——布隆方丹调来的。他们如临大敌，认为温妮的举动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

这件事在布兰福特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像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在白人和黑人心中引起震撼。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在接着而来的日子里，绝大多数黑人都不再去佛西尼时装店买东西了，形成了抵制购物的自觉行动。时装店为此遭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为了不影响生意，时装店终于接受了黑人都可以进店选购衣服、试穿衣服的要求。温妮以后再去那里时，甚至可以一次拿上五六件衣服回家去试，走时还忘不了说一声：“如果我女儿不喜欢，我再把衣服退回来。”

布兰福特镇上的风波，只是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一个缩影。由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意识根深蒂固，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因此，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随时可见，随处可见。但是在森严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的反抗只能暂时稍微改变一下处境，却无法彻底改变自己的低下地位。

黑人的低下地位，除了表现在上述各个方面以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受教育方面。为了把黑人永远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让他们永远无法与白人平起平坐，南非政府在教育方面也不折不扣地贯彻了种族主义政策。

对此，南非当局是下了番“苦心”的。曼德拉就曾经揭露说：“现政府一直试图阻挠非洲人受教育。他们上台之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停止非洲人学校的伙食补助。很多非洲

人孩子上学是靠这个补充他们的饭食。这是个很残酷的做法。”

在经费方面，当局的做法也是极不公平的，政策完全向白人学生倾斜。“所有的白人孩子都受到义务教育而不花费父母的开支，无论他们是穷是富。对非洲人孩子不提供同样的条件，虽然有一些得到这样的帮助。一般说来，非洲人孩子上学要比白人花费更多的钱。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 1963 年的刊物所引用的数字，7—14 岁的非洲人儿童中有 40% 不上学。那些上学的孩子所受到的教育远远比不上白人儿童。1960—1961 年政府对国家资助学校中的非洲人学生提供的经费约为人均 12.46 兰特。同期，开普省白人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 144.57 兰特。”曼德拉说：“虽然我手头没有数字，但是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得到 144.57 兰特教育经费的所有白人孩子的家庭，都比得到 12.46 兰特的非洲人孩子的家庭富裕得多。”

到了 70 年代，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不平等待遇更加明显。1975—1976 年财政年度，政府向白人学生提供的教育经费人均 644 兰特，而给黑人学生的费用，人均仅有 41.80 兰特，二者为 15 : 1。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同在一个国度里，受教育的条件却如此之悬殊，恐怕这也是南非的一大“特色”了。

进入 80 年代，二者间的差距似乎有所缩小。1982—1983 年度，白人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增加到 1385 兰特，黑人学生的经费也加到 115.19 兰特，二者之比为 12 : 1。从比例上看，差距确实缩小了，可是如果从绝对数字上看，70 年代中期，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的人均费用相差 602.2 兰特，可到了 80 年代初期，已经相差 1269.81 兰特了，是 70 年代中期二者差额

的 2 倍以上。

由于黑人学校经费少，所以各方面条件远比不上白人学校。从师资的数量、质量到学校的教学设施，甚至比不上亚裔人学校和有色人学校。黑人学生的升学率低得可怜。70 年代中期有过一次调查，其结果是在全国黑人适龄青少年总数中，读初中的占 6%，读高中的占 1.8%，高中毕业的仅占 0.1%。黑人中能够上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普通黑人家庭对此是想都不敢想的。种族主义政策剥夺了黑人青少年应有的受教育权力。

难怪曼德拉曾经针对黑人学生的受教育状况极为不满地指责道：“教育质量也不同。据《班图教育杂志》的数字，1962 年在整个南非只有 5660 个非洲人孩子取得了中学毕业证书，同年，只有 362 人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这大概与今天的政府总理（指维沃尔德）在 1953 年所说班图教育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他当年在《班图教育法》的辩论中说：‘当我控制土著人教育的时候，我要加以改造，以教育土著人从儿童时代起就认识到与欧洲人的平等不是给他们准备的。信仰平等的人不适于做土著人的教员。当我的教育部控制土著人教育时，它知道土著人将适合于什么等级的高等教育，以及土著人是否有幸运用他的知识’”。

这就是说，南非政府早就在法律上确定了黑人学生与白种人的不平等地位，法律甚至不允许他们有平等的思想。曼德拉认为，黑人要提高收入、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要有正规的教育；第二条是工人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技术，由此提高工资。但是，对黑人来说，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因为都已通过立法而被有意识地堵死了。

教育制度中的种族歧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

南非政府还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自南非联邦成立后，英语和荷兰语便都成了官方语言。1925年，南非议会通过决议，以阿非里卡语取代荷兰语作为南非官方语言之一。1948年，代表荷兰裔白人利益的国民党单独执政后，更强调使用阿非里卡语的重要性。到了70年代，政府进而规定，在黑人中、小学校里，要使用阿非里卡语授课。这种规定引起了黑人学生和家长的极大反感，他们强烈反对白人政府的强制奴化教育。1975年，一些地区的黑人学校举行了抗议活动，到1976年上半年，抗议活动已遍及所有黑人学校。

更猛烈的暴风雨还在后面。

1976年6月16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三的上午，令白人当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的黑人城镇——索韦托，黑人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了大规模暴动。两万名学生采取罢课行动，他们挥舞着拳头走上街头，稚嫩的脸上饱含着愤怒，大声地喊着口号：“打倒阿非里卡语！”“阿非里卡语是压迫者的语言！”游行队伍中打出了醒目的标语：“我们不是布尔人！”“如果让我们学阿非里卡语，沃斯特必须学祖鲁语！”

警车开来了，警察并未把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放在眼里，他们向学生队伍中扔掷催泪弹。没想到这些孩子们学着他们父辈的样子，面对纷纷赶到的大批警察毫不畏惧。他们好像没有看到警察已是全副武装，没有一点要散去的意思。有的学生向警察愤怒地叫喊着，有的在嘲笑这些充做当局打手的警察。不知如何是好的警察使出了最后一招，他们举枪向孩子们开火了。

黑人学生们拣起了石块，拿垃圾桶盖子当盾牌，迎着机关枪冒出的火舌继续向前冲。一批孩子倒下了，躺在血泊之

中，其他孩子仍然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孩子们的举动使广大黑人感到振奋，警察们的暴行又激起了黑人的无比愤怒。黑人群众开始焚烧白人办公大楼、警察局和汽车。全国各地的黑人学校都给予声援，举行罢课。索韦托的学生家长们还自动成立了“黑人家长协会”，站出来为孩子们说话，并组织募捐安葬那些死在警察枪口下的孩子们。

发生索韦托暴动的当天，温妮目睹了一切。她说：“我生活在他们之中，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孩子们意志如钢，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准备用石块去对付机关枪。这就是当你想要打碎压迫的枷锁时会发生的事情。除此而外的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

“这次暴动中死了多少人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南非种族关系学院估计的数字是死亡 618 人，受伤 1500 人——绝大多数是学生。从报纸上的报道看，死伤数字比这要高得多。”

“到 1977 年 6 月，被指控犯有公开使用暴力、参加骚乱、颠覆、破坏、煽动和纵火等罪行的有 21534 人，其中 13533 人被判刑，他们之中有将近 5000 人在 18 岁以下。”

一大批幼小年轻的生命在争取自由，维护自尊的斗争中被杀害了。但是，南非各地由此而掀起的反种族主义压迫的浪潮，迫使当局宣布取消在黑人中小学校里使用阿非里卡语授课的决定。这是用孩子们的鲜血换来的成果。以后，6 月 16 日被定为索韦托死难者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南非黑人都要举行悼念活动。

在南非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种族隔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建立、发展、完善的过程。各种条条框框越来越多，对黑人的束缚和制约越来越紧，在广大黑人痛苦的挣扎中，白人牢

固地确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白人生来至高至尊，黑人天生愚笨卑微，这就是南非白人政府长期以来向每一位公民灌输的思想。为此，白人统治者甚至在《圣经》中找到了根据。他们说黑人是含姆的子孙，含姆因为偷看诺亚的裸体而被贬为奴仆，所以，黑人世代要作白人的奴仆。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像一座大山，压得黑人喘不过气来；又像一张巨网，越收越紧，使得黑人丧失了最起码的自由。

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使南非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典型的殖民地社会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度之中，发达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看似相互对立却又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种族主义制度下南非所特有的现象。而世代生存在这里的黑人，却为白人统治者人为制造的这种现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无论男女老幼，黑人从生到死，一生中的衣食住行，无一不在种族主义的桎梏之下。曼德拉曾经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指出黑人正忍受着的种种苦难，他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非洲人希望得到能够糊口的工资；

非洲人希望从事他们能做的工作，而不是做政府认为他们能做的工作；

非洲人希望他们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居住，而不是被迫离开不是他们出生地的地区；

非洲人希望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有权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永远也不能成为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非洲人希望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限制在他们居住的黑人区；

非洲男人希望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愿被迫住到男人单身宿舍去过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生活；

非洲妇女希望和她们的男人住在一起，而不愿长期留在保留地寡居；

非洲人希望有在晚上 11 点钟以后出门的权利，而不是像小孩子那样被禁闭在家里；

非洲人要求准许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旅行，在他们愿意的地方找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指定的地方去；

非洲人要求在整个南非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要求在社会中享有安全保障和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它，我们将永远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这句话，是以多少事实为根据而得出的结论。黑人因此而遭受的苦难是不胜枚举的。伴随政治权利的被剥夺，是经济上的一贫如洗。仅以 70 年代末的布兰福特黑人居住区为例。许多黑人家庭一无所有。孩子们整天挨饿，白天空着肚子去上学，晚上回到家中只能吃上一盘玉米糊和一些煮熟的卷心菜。有的家庭连这样的饭也吃不上，只能在盐水中盛上一点玉米糊搅一搅，喝下去骗骗肚子。黑人孩子普遍患有营养不良症，婴儿的死亡率极高，居住区每周要为死去的孩子举行 3—6 次葬礼。

由于黑人住区肮脏、拥挤，肺结核、麻疹、霍乱等传染病肆虐。而黑人的医疗条件又极差，他们有病往往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根据南非议会宣布的数字，南非平均每 330 名白人有 1 名医生，而黑人平均每 12000 名才能有一名医生。即

使这样，南非学术界仍认为对黑人的情况估计过高，事实上远达不到这一水平。据他们的统计，平均每 17.4 万黑人才有一名医生。

黑人的处境之悲惨已经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为了争得做人的权利，为了子孙后代，他们奋起抗争了！不怕挫折，不怕流血，他们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总有一天，要把种族主义制度彻底摧毁。

第三章

追求种族平等

● 反种族主义者组织起来

对于野蛮的、落后的种族主义制度，非洲人民早就开始了反抗活动。从零星的、分散的活动，到经常性的、有组织的斗争，搅得白人政府不得安生。

1912年1月8日，是南非黑人至今难以忘却的日子。这一天，在黑人律师皮克斯利·塞姆的召集下，一些黑人律师、教师、牧师，以及部落酋长来到了布隆方丹，他们会聚一堂，共商大计，希望通过合法手段解救黑人脱离苦难。

塞姆出生于一个被祖鲁族人征服的小部落里。他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时受到美国牧师的赏识，于是先后被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英国法学协会学习。回国后，他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干起了律师职业。在国外他广开眼界，接受了很多西方的社会观念和教育思想，回国后的工作又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阶层人士，更深刻地了解了南非种族压迫的黑暗，于是，逐渐萌发了建立一个黑人反种族主义组织的念头。经过多方面努力，成立大会终于如期举行。

会场上庄严肃穆，会议开始后，宣读了祈祷文，然后唱

起了《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这是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谱写的赞美诗。这首歌后来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歌和南非黑人的国歌。

参加会议的人们来自南非各地以及英属贝专纳、巴苏陀兰和斯威士兰，他们克服了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克服了农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阂，要求实现民族团结。塞姆在会上激动地说：部族倾轧是造成一切灾难、落后和愚昧的原因，我们必须着眼于大的方面，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到会者都十分激动，兴奋。他们中许多人是受过教育的，或者是有一定地位的黑人上层人物。他们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必须组织起来改变南非黑人的悲惨命运。

在塞姆的提议下经过讨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正式诞生了！这是南非第一个黑种人民族主义组织。教育家约翰·杜比当选为主席。他也曾去美国学习过，考察了那里的黑人运动。回国后他在纳塔尔办起了祖鲁人基督教工业学校，专门培训黑人，使他们能够掌握一门技术。大会还选出了所罗门·普拉吉为总书记，他只读过几年小学，是个自学成材的报社编辑和小说家。塞姆则当上了司库。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具有明显的美英议会制度影响的痕迹，实际上是以美国国会为模式，又含有英国议会结构的某种因素。该组织机构有两院制议会，即由酋长们组成的上院，以及平民组成的下院，两院各设有一名议长。首任上院议长是巴苏陀人最高酋长莱特西二世，他曾率领本部族全力抵抗布尔人的扩张。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成立，在南非黑人反种族主义斗争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黑人的反抗斗争已经打破了部族和地域的界限，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塞姆是这样说的：“当人们学会不仅是同他的亲戚朋友，而是与世上所

有的人合作，就会取得最伟大的成就。”黑人在斗争中变得成熟起来了。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后，为了宣传自己的宗旨、方针，把广大黑人动员起来，还办起了一份报纸——《人民报》。塞姆亲自主管这项工作，使《人民报》成为组织的喉舌。在塞姆的积极争取下，斯威士兰和摄政皇后欣然同意在财政上支持办报，这真是令土著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高兴的一件事情。报纸发行很快步入正轨，并且以英语和3种土著语言出版。报纸办得挺有特色，版面活跃，文章具有感染力，它成为第一家有影响的黑人民族报纸。

随着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土著人国民大会的领导者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1913年的《土著人土地法》上面。这个法案对黑人的打击太大了，全国400多万黑人被赶到了土地贫脊、面积狭小的保留地上。白人政府以立法形式保护了殖民者对黑人土地的掠夺成果，彻底断绝了黑人收复土地的念头。土著人国民大会对白人政府的做法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要站出来为黑人同胞说话，难道白人政府连黑人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给吗？土著人国民大会决定派出代表团，到伦敦去请愿，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出面，对土著人的土地权利给予一定保护。代表团为请愿活动做了一番准备。普拉吉四处奔走，深入黑人群众，广泛调查《土著人土地法》对黑人生活的影响，了解黑人的情绪、意愿。他奋笔疾书，在综合整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饱含黑人辛酸的《南非土著人的生活》一书。他希望这本书能够打动英国政府和所有的读者。

代表团以杜比为团长，带着南非黑人的心愿和祈盼，启程了。到达伦敦后，代表团成员寻找一切机会游说，发表演

说，在英国民间博得了广泛同情和支持。但是英国政府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代表团的陈述无动于衷。不论杜比一行人如何努力，如何恳切地要求英政府对南非联邦给予制约，英政府总是摆出一副冷淡的面孔，表现出对此毫无兴趣的样子。

代表团在无奈的情况下，两手空空地回到南非。他们在布隆方丹举行了一次会议，将此行的结果向各方面人士做了汇报。

请愿失败了，却不意味着土著人国民大会就此认输了。他们天生一股不屈的精神，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另一条。无论如何，也要唤起黑人民众的反抗意识，唤起国际社会对南非黑人的关注和同情。

经过百般周折，普拉吉终于在英国出版了他的那本《南非土著人的生活》，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南非黑暗的一幕。接着，普拉吉在英国继续活动，四处奔走，哪怕还有一线的希望他也不愿放弃。两年多过去了，仍然毫无结果，普拉吉只好返回南非。以后，他又再次前往英国活动，并且去了美国、加拿大，为争取南非黑人的土地权利、政治权利，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南非联邦统治下的黑人的悲惨处境给予关注。

土著人国民大会的领导者们怀着一颗热爱南非国土，热爱土著同胞的赤诚之心，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为南非黑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在领导者中，普遍对英政府抱有幻想，甚至幻想南非政府也有慈悲之心，因此相信有朝一日通过非暴力的、合法斗争的方式，会促使南非政府改变政策，实现黑人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平等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屡遭挫折，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预期

的目的。

1923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正式改名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或“ANC”。在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漫长岁月中，非国大发挥了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20世纪的20到30年代里，除了非国大以外，还有一些组织在积极地领导黑人运动。“工商业职工工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如果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在成立之初还是一个黑人上层的组织，那么工商业职工工会则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黑人无产者的组织。它成立于1919年，最初是作为码头工人工会在开普敦建立起来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克莱门茨·卡达利的职员。

工会成立后，按照卡达利的的话讲，它“像草原烈火”一样，在南非迅速发展起来。它首先向东伦敦和伊丽莎白港等附近港口发展，接着扩展到整个开普、奥兰治自由邦、纳塔尔以及德兰士瓦等地。它甚至越过南非联邦的疆界，在西南非洲、巴苏陀兰、贝专纳、南罗得西亚、莫桑比克和卡达利的家乡尼亚萨兰建立了分会。

工商业职工工会最初只拥有24名会员，经过10年的发展，到1928年，会员人数已增加到25万人。

卡达利精力旺盛，工会在他的领导下显得生气勃勃。工会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提高黑人工人的物质待遇，规定黑人的最低工资。黑人工人在工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抛开部族间的分歧，作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一支队伍，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

1919年年底，工会在开普敦码头组织发动了第一次大罢

工。黑人工人向白人工人发出呼吁，要求他们给予支持和援助，以争取首次罢工斗争的成功。然而，种族的隔阂与偏见实在太深了，白人工人不愿站在黑人一边共同对付白人资本家，他们拒绝伸出援助之手。没有经验的黑人工人显得势孤力单。警察来了，军队也来了，罢工的领导人受到迫害，参加罢工的黑人工人被驱逐出港。罢工斗争坚持了3个星期之后被镇压下去了。

但这毕竟是工人们的第一次尝试，第一次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采取的共同行动。罢工虽然失败了，可黑人工人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当他们宣布罢工的时候，一向趾高气扬的白人厂主显得那么惊慌、那么六神无主、手足无措，因为他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从来被他们不放在眼里的黑人，居然起来造反了！

以后，工商业职工工会又组织了多次不同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1920年10月的一天，黑人工人聚集在伊丽莎白港的巴肯街，他们准备向当局施加压力，释放被捕的工会领导人马萨巴拉。马萨巴拉是因为发动工人罢工而被捕入狱的，他提出黑人每天最低工资不得少于10先令的要求。这一关系黑人切身利益的呼吁对黑人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黑人工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罢工斗争，当局盛怒之下将马萨巴拉投入监狱。为营救马萨巴拉的人们涌向了警察局，他们大声呼喊，要求放人。警察局马上行动起来，下令警察向示威者开枪。结果，当场打死24人，另有50人受伤。

1925年，在布隆方丹地区，警察以同样的手段，镇压了工商业职工工会组织的抗议活动，有5名黑人被打死，25人受伤。

黑人工人以鲜血和生命与白人政府、资本家进行抗争。他们手无寸铁，但每每面对荷枪实弹的镇压者却显得毫无惧色。一名黑人工人倒下了，更多的工人又加入了反抗白人统治的队伍。卡达利看到工人运动的发展十分高兴，高兴之中也显露出几分得意。他于1926年发表演说时讲道：“我只要从船厂到工厂去走一趟，说一声‘停工’，白人就得损失金钱了，铁路公司一天要损失200多万镑，而在罢工的过程中，我将被当作一个总理。”

卡达利的话并非言过其实。当时工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白人厂主、企业主普遍把工商业职工工会视为对他们的一大威胁力量，因为尽管他们能够依靠白人政府将黑人的反抗行动镇压下去，但是也免不了要伤筋动骨，为此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黑人组织外，“南非共产党”也于1921年成立后展开了积极活动。这是一个由白人创立、建党初期仅有白人工人参加的组织。随着白人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西德尼·邦廷逐渐对黑人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浓厚兴趣。他通过与黑人的广泛接触，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个国家实现种族平等、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真正希望。1924年，邦廷当选为南非共产党总书记之后，开始注意在黑人中发展党员，他想使共产党成为能够吸引并团结广大黑人群众的政党。于是，邦廷积极与工商业职工工会建立联系，希望从组织上实现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之间的勾涌与合作。

但是，邦廷想得太简单了。由于种族间的隔阂，卡达利等人对邦廷的举动产生怀疑，担心南非共产党这一以白人为主的政党，将来控制他们。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1927年，工商业职工工会做出决定：禁止其成员加入共产党。

邦廷的构想是美好的，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而破灭。尽管如此，他毕竟为南非共产党吸收黑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敞开了大门，使共产党成为南非第一个主张种族平等并吸收各种族成员的政党。到了30年代初，黑人成员已经在南非共产党内占有多数了。

邦廷的一生是很不得志的，他本人甚至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被当作“右翼异端分子”清除出党。不过，在以后南非反种族主义压迫的艰难路程中，人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将他遗忘，就连南非黑人对他也有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因为正如泛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乔治·帕德莫尔所评价的那样，邦廷是“为黑人而战斗的第一个欧洲人”。

● 血气方刚曼德拉

在30年代的岁月中，非国大继续高举会旗，采用非暴力的、温和的斗争方式，反对南非政府的不公正行为。非国大的旗帜是由三色组成的：黑、绿、金黄。黑色代表着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着南非富饶的资源。

在南非政府强制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日子，非国大领导人的斗争策略显得过于软弱、被动了。他们固守“合法”的阵地，组织示威游行、演说集会、上书请愿，换来的却是政府更加残酷的镇压和种族主义统治的强化。黑人群众感到失望了，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在思考，在探索，在寻求一条振兴非国大的道路！

40年代初，非国大内部聚集了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魄力，有才华，敢想敢干。他们对以往的斗争

方式感到不满、憋气，迫切希望改变非国大现状。

共同的心愿使他们聚集到一起。1944年4月复活节那一天，杰出的黑人领袖奥利弗·坦博、沃尔特·西苏鲁、罗伯特·索布克韦、A·M·伦贝迪、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市伊伦夫街的班图人社会中心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年联盟”。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有240多名非国大的青年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发表了《青年联盟宣言》，发出了振兴非国大，实现黑人的民族解放的共同心声。

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公开打出了“非洲民族主义”的旗号，批评老一代非国大领导人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不坦率的态度，认为他们不是完全的民族主义者。青年联盟表示，将拒绝一切形式的白人统治，为非洲人取得完全的公民权而斗争！

大会开得朝气蓬勃，十分热烈。大会选出伦贝迪为青年联盟首任主席。博学多才的伦贝迪出生于祖鲁族一个农业工人的家庭。由于生活贫困，从小体弱多病，但是他聪明好学。凭着家长节衣缩食的支持和个人的努力，在函授学习中获得了文学士和法学士两个学位。他曾经在海尔布龙中学任教，拿到学位之后，他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在非国大创始人塞姆的律师事务所当上了实习员。著名的南非白人女作家玛丽·本森（曾出版《纳尔逊·曼德拉传》）对伦贝迪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还有一种嘲弄他自己的不平凡才能。他虽然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有时还有口吃，但他时而用教师的口吻，时而用煽动的语调，讲起话来很迷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疾病和劳累过早地夺去了这位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家的年轻生命。1947年，他抛下了他为之全

力工作的青年联盟，去世了，此时才 33 岁。然而，他的思想却一直鼓舞和激励着他的伙伴和拥护者，他们更加勤奋地工作着。

青年联盟中的中坚人物沃尔特·西苏鲁和纳尔逊·曼德拉就是两位舍生忘死，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黑人民族解放事业的杰出代表。

西苏鲁出身贫苦家庭，当过矿工、用人。他于 1940 年加入非国大，很快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他年长曼德拉 6 岁，结识曼德拉后，他像兄长一样关心、帮助曼德拉，并和曼德拉携手并肩，同舟共济，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艰难历程。

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如今已响彻全球。他是新南非的缔造者，是南非黑人的骄傲。他历经磨难，饱经沧桑，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有着超人的胆略和智慧。今天他已是 78 岁的高龄，他那浓密的灰白色的头发，他那宽阔的额头上的道道皱纹，记载了他所走过的道路，他所经历的岁月，向人们诉说着他的过去与今天。

这位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于 1918 年 7 月 18 日生于南非东部的特兰斯凯。他的父亲是科萨人滕布部落的一个酋长，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性。曼德拉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他很小就跟着姐姐上山放牧牛羊，下田犁地。少年时期的他最喜欢听老人们讲部落中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每当夜幕降临，熊熊的篝火燃起后，部落里的长者们便聚在一起，拈着长须，慢慢地讲述白人到来之前的美好日子。小曼德拉常常听得入了神。当老人们满怀激情，回忆当年土著人反抗白人殖民侵略的战斗场面时，他深受鼓舞，他被前辈们英勇顽强的精神所打动。多少年以后，当他回想起少年时代在篝火旁度过的一

个个夜晚，还十分感慨：

那时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王及其大臣们的民主统治下过着和平的生活，自由地、自信地在国内各处行动毫无障碍。那时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拥有土地、森林和河流；我们开采地下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土的一切富饶资源。我们设立并执掌自己的政府，我们管理自己的军队，我们组织自己的贸易和商业。

长老们常讲述我们的祖先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战争，还讲述在那些战斗岁月里将军们和士兵们所表现的英勇行为。祖鲁人中间的丁干和本巴塔，科萨人中间的欣查、马卡纳、恩德拉姆比，以及北方的塞库库尼等人，这些名字人们提起来时被当作整个非洲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曼德拉12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父亲临终之前将他托付给大酋长大卫·达林戴波，他交代说：“我可以说他的志向是做有益于民族的事。我希望您照您的愿望来培养他，让他受教育，他会学习您的榜样的。”

以后，大酋长一有机会，就让曼德拉跟着他去审判庭旁听。当时，南非政府已经把许多黑人酋长降到了领取政府薪金的普通官员的地位，但是达林戴波大酋长在部族里还保有某些权力和威望。时间一长，曼德拉耳濡目染，从小就梦想着将来当一名律师。

在大酋长的关心下，1938年曼德拉考入了黑尔堡大学。这是南非第一所黑人高等学校，位于开普省东部。它创办于1916年，从这里走出了许多未来的黑人领袖人物，他们不仅

活跃在南非土地上，还出现在东非和中非地区。

在大学里，曼德拉攻读文学专业，他有幸结识了在这里正攻读理科学位的奥利弗·坦博。坦博年长他1岁，也来自特兰斯凯。他们俩谈话很投机，在频繁的往来中，他们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在一起谈论学校、社会、黑人、白人，他们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保持着一种政治上的敏感。曼德拉处于萌芽状态的非洲民族主义意识，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强烈了。

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曼德拉已经是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了。由于领导学生运动，他被校方勒令停学。他回到家乡，大酋长要他接受黑尔堡大学校方提出的条件，放弃罢课，继续学业，但是他拒绝了。他决定离家出走，促成出走的原因还有一个，这就是大酋长正在为他操办婚事，并且想通过包办婚姻在内的各种安排，让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曼德拉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主意已定，就不再迟疑。1941年，23岁的曼德拉只身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初来乍到，他感到一切都很新奇，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宽阔的大街两旁高楼林立，人来车往熙熙攘攘，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这同他的家乡那种群山起伏、河水湍急、茅屋毗邻、绿草成茵的景色相比，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但是，曼德拉很快从大城市繁荣的外表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来。他在城市郊区看到了与白人住区有着天壤之别的黑人棚户区。那里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没有柏油马路，没有电灯电话，还不断受到警察的查抄。曼德拉这位出生部落贵族家庭的青年，一下子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按肤色来划分的，人们只区分黑与白，而没有人再理睬他的贵族出身。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必须先找一份工作。他身材高大，

体格健壮，经人介绍，很快在一家矿上当上了一名矿区保安员。不久，他结识了也来自特兰斯凯的“老乡”西苏鲁。在西苏鲁的热心帮助下，他进入房地产介绍所工作，每月领取2英镑薪金，外加些补贴。

他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可他还是忘不了完成自己的学业，以实现当律师的梦想。西苏鲁了解到这些后，便在经济上帮助他，使他于1942年在南非大学修完以前的专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接着，他又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开始学习法律，并在西苏鲁的介绍下来到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见习。

曼德拉以旺盛的精力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天奔波往返，虽然很苦、很累，但他的抱负和信心激励着他，使他不知疲倦地努力着，奋斗着。

在短短几年接触社会的经历中，曼德拉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种族歧视下黑人处境的艰难。白人的高傲和偏见时时处处表现出来，触动着他的敏感神经。他觉得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滕布人，更是一个非洲人，一名非洲民族主义者。

这时，像兄长一般待他的西苏鲁，领他迈进了政治斗争的大门。1944年，作为非国大骨干成员的西苏鲁介绍他加入了非国大，曼德拉从此迈出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他思维敏捷，口才出众，又具有大将风度和谦逊的气质，在非国大内一批卓越的青年人当中，不久便脱颖而出。1948年，曼德拉被选为刚刚成立4年的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两年后，又当选为联盟主席。从此，他有了更多的施展才干的机会，他认准了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 蔑视不公正法运动

1948年，南非举行大选。在有着强硬种族主义立场和反英情绪的阿非里卡人的支持下，马兰博士领导下的国民党大获成功。阿非里卡人欢欣鼓舞，国民党人士更是欣喜异常。

二战期间，史末资政府积极参加英国一方出兵作战。大量白人加入了南非志愿军，造成国内劳动力紧张。城镇、厂矿不得不录用黑人来填补白人走后留下的空缺。进入城市的黑人迅速增加，到二战结束时，已接近当时南非白人的口总数。

与此同时，以青年联盟为代表的新一代黑人民族主义者正在兴起，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所有这些，在白人引起不安，特别是阿非里卡人要求强化南非白人的统治地位，对黑人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迎合了阿非里卡人的“恐黑”心理，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维护白种人的纯洁性、保证白人特权等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内容。他们说，如果史末资政府继续执政的话，那么黑人很快不再是野蛮人了，这意味着他们将因此而拥有选举权。在白人眼里，黑人像汪洋大海一样可怕，他们在人口上占有无法改变的绝对优势，所以一旦让黑人拥有选举权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国民党在宣传中向白人选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决定你们孩子们的前途，在为欧洲人（指白人）制订立法，在决定如何使用你们的税款时，你们愿意让土著人也有发言权吗？”他们还带着一种恐吓的面目为白人选民指

出两条道路，何去何从，任其选择：一条是“取消隔离，全民族自杀”，另一条是“种族隔离，保护白人种族的纯洁”。

在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面前，阿非里卡人纷纷向国民党投出了选票，从此，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发展史上，开始了最黑暗的一页。

一项又一项的种族隔离法案出笼了。《禁止婚姻法》、《不道德法》、《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广大黑人彻底陷入了遭受歧视、隔离、奴役、迫害的境地，没有政治权利，毫无社会地位。随着种族隔离的制度和立法化，就连亚裔人和有色人的地位也急剧恶化，他们先后于1948年和1951年被剥夺了选举权。

非洲人国民大会积极领导广大黑人的反抗斗争，使50年代的南非出现了第一次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高潮。

1950年的“五·一”节，由非国大、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号召约翰内斯堡黑人举行大罢工，工人们纷纷响应，有半数工人参加了罢工队伍。政府派出2000名警察前往镇压，共开枪打死了18名示威者，有30多人受伤，其中还包括3名儿童。

青年联盟的领导者们对这次罢工中黑人群众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感到震惊，他们为之鼓舞和振奋。曼德拉激动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了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

1950年6月26日，非国大组织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大罢工。印度人对这次罢工给予了很大支持，特别是在德班，那里有上千名印度工人被白人解雇了，他们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虽然这次罢工情况并不理想，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区，工

人反应冷淡，在开普敦也只实现了部分工人的罢工，但是，这毕竟是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组织者们从中积累了经验，找出了不足，他们甚至来不及休整一下，便又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

1952年，南非黑人展开了大规模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把反种族隔离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这时的曼德拉，已是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以自己的忠诚、热情和才干，成为“蔑视不公正法运动”的卓越组织者，他的正式头衔是“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为了把运动广泛开展起来，曼德拉奔波于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等地，在黑人居住区内走家串户，和黑人们促膝谈心，让他们尽快行动起来，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有时，奥利弗·坦博陪同曼德拉一道深入黑人群众，他们忘却了疲倦，常常忙到深夜。遇到有的胆小的黑人，他们会被拒之门外，但更多的人对这两位未曾见过面的黑人运动领导人，则给予了热情的欢迎。

这一年年初时，非国大由西苏鲁等人出面向马兰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废除6个最令人憎恨的不公正法案：《通行证法》、《班图权力法》、《集团住区法》、《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及《限制牲畜数量法》，并且指出，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法律，将于4月6日举行示威游行，作为蔑视不公正法的第一次行动。

选择4月6日这一天，是因为它是荷兰人在开普登陆300周年纪念日，白人要在这天举行庆祝活动。

马兰总理的私人秘书代表政府给他们回话了，内容令人失望。他说，政府不能取消那些法律，因为那些法律只具有防范性，而不是压迫性的。如果非国大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运用手中的机器制止任何形式的动乱，并处置那些搞破坏

活动的人。

非国大开始行动了。4月6日，当白人聚集到一起，举行欢庆活动的时候，黑人在非国大的组织下也来到各个城镇中心，与白人对台唱戏，举行反种族压迫的宣誓祈祷活动。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伊丽莎白港、德班、东开普等地，黑人群众和平示威，让人们记住这“悲痛、罪恶和屈辱的300年”。

这一天的黑人活动为蔑视运动的全面展开做了一次演习，由此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6月26日，是非国大组织全国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非国大再次选定了这个日子。全国各地的黑人在同一天里呼啦啦地举起了蔑视不公正法运动的大旗，向种族隔离制度发起公开的挑战！

当天清晨，一批斗志旺盛的志愿者首先出现在伊丽莎白港。6月的南非，正值寒冬季节。人们冒着嗖嗖的寒风，佩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声呼喊口号，雄赳赳地迈开步伐，开始了计划中的行动。队伍来到了火车站，一边喊着“我的祖国，非洲！”一边穿过标明“白人专用”的入口处，一列黑人车厢中发出了喝彩声。车站的警察迅速将这批志愿者逮捕，他们分别被判处15—30天监禁。

在约翰内斯堡附近，西苏鲁带领着50多名蔑视运动志愿者，进入了只有白人才能往来活动的地区。这种公然蔑视政府法律的做法使白人感到惊恐，警察迅速赶赴现场，将所有人逮捕监禁。

在全国其他地方，黑人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他们旁若无人地穿入平时只准白人进出的地方，坐上白人乘坐的汽车，走进白人专用的邮局、商场。一时间，黑色的潮水涌向政府

设立的种族隔离的道道围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浪。一些对黑人抱有同情态度的白人和对现状不满的有色人、印度人也卷入到这股浪潮之中，大大方方地走进了黑人住区。

这天晚上，曼德拉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召集会议。按政府规定，晚上 11 点以后是宵禁时间，黑人必须要经过特别许可方能外出。曼德拉等人的会议超过了时间，违反了禁令，于是，警察又出动了，他们就像嗅觉灵敏的警犬，警惕地注视着黑人的一举一动，为政府效尽犬马之劳。在警察的拳打脚踢之下，曼德拉等人被塞入车中，直接送往监狱。这是他第一次被关押起来。

被捕的人在不断增加，但是参加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蔑视种族歧视的法律，也蔑视当局的逮捕和关押行为。自由之歌在南非大地上回响着：“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自己的土地哭泣。他们夺走了它，他们夺走了它，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的国家自由！”志愿者们还唱道：“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是志愿者！”

曼德拉被关押一周后释放出来，但是 7 月底，他又再次和非国大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入狱。被捕那天，警察展开了大规模逮捕行动，他们的办公室、住所遭到突然袭击，他们被指控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而投入狱中。

蔑视运动并没有因为这些领导人的被捕而停止，参加运动的志愿者们严格遵守着组织者提出的纪律：不采取暴力行动。国内外许多人士对此表示赞赏。联合国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种族隔离现状，这是国际组织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反应。非国大为此感到欣慰和鼓舞。

到这年 10 月份，被捕人数已经增加到了 2354 人，到 12 月为止，竟有 8500 人因为蔑视法律的行为而被投入监狱。曼

德拉和西苏鲁等运动的领导人经法庭审判，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另外，当局对曼德拉宣布了禁令：在6个月内不得参加任何集会，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很清楚南非当局宣布禁令的意图何在，他们不愿看到这种反抗运动的再次兴起，不愿让他没有任何阻碍地继续发挥作用和影响。他说：“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

这场轰轰烈烈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最终被南非当局镇压下去。运动的结果没有达到迫使政府取消种族主义法律的目的，但是，它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却是巨大的。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参加者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是以往黑人政治运动史上所罕见的。黑人群众在运动中受到了教育，经受了锻炼，非国大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52年底，非国大成员已从运动初期的7000人猛增到10万人。所以，非国大领导人在被迫宣布停止蔑视运动的同时，又欢呼他们取得了胜利。

玛丽·本森也把这场运动看作是“一次惊人的胜利”，她对运动做了如下概括：

在响应号召的1万名志愿者中，有8500多人不顾警察暴行的威吓，不顾雇主的开除，也不顾大量报刊和无线电广播的恶意宣传，甘愿坐监牢。有些教师过去一向是不活动的，也丢掉了职业起来参加反抗。联合国已经受到感动，讨论种族隔离问题。世界舆论对非白种人的反压迫运动也予以前所未有的认真关注。甚至南非政府也不谈“白人统治”而开始谈起“班图斯坦”和班图人的自治问题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威信提高了，会员

人数成倍地增加到 10 万人以上。

这场运动中，非国大领导人一改过去合法的斗争方式，公然与政府的法律相对抗，使国民党政权受到冲击。曼德拉也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干和他对黑人解放事业的勇敢与忠诚，受到群众的爱戴。就在这一年，他被选为非国大德兰士瓦省主席，接着，又当选为非国大全国副主席。

与他同时当选为非国大全国主席的是艾伯特·卢图利酋长，西苏鲁再度出任秘书长。卢图利当过 17 年的乡村酋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很善于和群众打交道，甚至还结交了很多白人朋友。他当选全国主席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前往伊丽莎白港考察，在那里他受到了 3.5 万人的欢迎。不久，卢图利也同曼德拉一样，被政府施以禁令，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然而禁令并不能真正束缚住他们的手脚，只是使他们变得更机敏、更坚定了，他们在更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工作着。

● M—计划与《自由宪章》

50 年代初，曼德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取得了律师资格。1952 年他和老同学坦博合伙，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创办了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他们希望能为黑人提供法律帮助。

他们的事务所设在“大法官邸”的二层，办公室门上的铜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栋楼房是属于印度人的，也是这里仅有的几座能供黑人租用的楼房之一。

律师事务所的创立在当地黑人中引起不小的轰动，特别是在特兰斯凯，滕布人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他们欢呼道：曼德拉和坦博是在我们土地上长大的律师！

这两位来自特兰斯凯的青年人过去是黑尔堡大学的同窗学友，现在是非国大中志同道合的战友，眼下又一起创办了律师事务所，在旁人眼里，在他们自己看来，都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们两人同样疾恶如仇，但性格各异：曼德拉性格奔放，感情外露；坦博则性格沉稳，办事老成。二人相辅相成。

在做律师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深切体会到南非社会的许多不平之事，不是靠法律所能解决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万恶之源。

十几年后，坦博为曼德拉的演讲集《自由之路无坦途》作序时写道：

每天一早纳尔逊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从耐心等待的人们中穿过，他们从等候室坐椅处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能自夸是世界上拥有在押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里挤满了被关押着的非洲人。有犯重罪的——暴力罪行在种族隔离的社会里有增无减。但是也有轻微触犯法律条文的犯人，这在任何真正的文明社会里都不会受到关押的处罚。

失业就是犯法，因为非洲人如不携带经官方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执照，就难逃被捕的命运。没有土地也是犯法。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那些由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织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

说他们是怎样被从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制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这种酒或是用卖这种酒赚来的钱补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那些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金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也可能是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被公布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的地区——对非洲人来说也是违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将无以计数的无辜者打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传播了仇恨与绝望的种子。本该上学念书或学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东游西逛，成帮结伙，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这个社会上。正是这个社会把他们逼上犯罪与贫困的绝路上去。我们办公室里那些浅黄色卷宗里装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事例。如果说当我们开始合伙时我们还不是种族隔离的叛逆者的话，那么我们在办公室的这些经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社会集团中升到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案例，每一次去狱中探访委托人，都让我们记起我们的人民正忍受着屈辱和苦难的煎熬。

曼德拉和坦博每天要处理许多案子，但他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在南非这个特殊的国家里，要想为无辜的黑人辩护，从法律上给他们以帮助实在太难了。曼德拉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黑人而言，良知与法律之间都会产生矛盾和对抗，因为这种法律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并且是无法容忍的。

也许是曼德拉的律师事务所政治味道太浓了，也许是曼德拉的非国大领袖身份太碍眼，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南非最高法院请愿，要求剥夺曼德拉的律师资格，理由是

他作为一名律师，却领导了蔑视运动。为此，曼德拉请到了著名律师沃尔特·波洛克为他出庭辩护，身为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的波洛克据理力争，伸张正义。结果，辩护成功，德兰士瓦法律协会被判处赔偿罚金。

然而，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1953年9月，曼德拉再次被施以禁令：两年之内不得参加集会，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必须退出非国大和所有其他组织。这时，正逢德兰士瓦省非国大召开年会，他被禁止出席会议。于是，他把发言稿交给了执行主席在大会上宣读，这样既能够保证大会不受干扰地正常召开，又使曼德拉的观点和主张得到宣传和贯彻。

他的发言稿是以“主席致词”的名义在会上宣读的。他指出，蔑视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唤醒了群众，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力量，对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但是，政府发起反动的镇压攻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使非国大、印度人大会和各种工会组织的领导人、积极分子的行动，都受到了限制。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认识到，这些做法所造成的严重形势是1952年6月发动运动之初所没有的……我们必须分析所面临的危险，制订良策和新的政治斗争计划。一个政治运动必须时刻从实际和普遍存在的条件出发。长篇演讲、挥动拳头、拍桌子以及措词强烈的决议，如果脱离了客观实际，都不能唤起群众运动，而只会给我们的组织和斗争带来危害。我们深知，群众必须为新形式的斗争做好准备。我们必须重新积蓄我们的力量，为向敌人发动一次更为强大的进攻而集聚我们的队伍。不顾已经发生的变化而盲目向前将是愚蠢的自杀……以往那些通过公开的群众集会来发动群众运动，以发表声明和散发传单来号召人民采取行动的方法已

经变得极其困难，并且难以奏效。”

为此，曼德拉提出了新的行动计划，即“M—计划”，M是曼德拉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鉴于在公共场所举办活动、召集会议已越来越困难，曼德拉设计出了一套新的组织方案，即以街道为基层组织，在此基础上，逐级建立起各级组织机构，由此改变非国大过去的领导和组织方式，从松散变为严密，从公开转为秘密。曼德拉要求非国大会员“通过艰苦紧张的工作，通过各个地区一家一户地发动，来发展会员和加强组织”。他说：“从现在起，大会成员的活动不能仅限于发表演讲和通过决议。你们的活动必须在广泛的群众工作中表现出来，这些工作将使你们与劳动人民最大可能地建立联系……如果不允许你们公开集会，那么你们应当在工厂的机器旁，在回家的火车和汽车上举行会议。你们应当在村里和棚户区召集会议。你们必须使我们人民居住的每一个住宅、每一个床位和每一个泥土屋成为工会运动的一个分部。你们必须永不屈服。”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非国大决定掀起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时，黑人马修斯教授具体提出了召开南非各种族参加的“人民大会”的设想。马修斯曾于30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并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黑尔堡大学任系主任，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教授。马修斯教授积极投身于黑人解放事业，他加入了非国大并担任开普省非国大主席职务。此时，他刚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完成了在纽约联盟神学院的工作，返回国内出席1953年开普省非国大年会。在大会上他阐述了召开“人民大会”的主张：非国大应当考虑举行一次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未来民主南非的自由宪章。非国大全国主席卢图利对这一主张表示赞赏和支持。

非国大积极筹备起来。为了使大会能够真正代表各种族的利益，非国大联合了其他3家组织作为“人民大会”的共同发起单位。它们是：“印度人大会”、“有色人人民组织”（后改称“有色人大会”）、“民主人士大会”。民主人士大会拥有数百名白人会员，他们代表了南非一些进步人士的主张。曼德拉对他们评价是：“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作人，并且当作平等地位的人来对待。为了使非洲人在社会上得到政治权利和利益，他们准备与我们吃在一起、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非国大与上述3家组织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组成了“大会联盟”，以便协调行动，并成立了一个8人“全国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工作，卢图利大酋长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大会联盟号召各省成立相应的行动委员会，组织发动群众支持这次人民大会的召开。

会前，组织者们做了广泛调查和动员工作。他们深入城镇、农村、黑人居住区散发传单和问卷，召集各种小型会议。大会联盟在一份宣传品中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咱们谈谈这辽阔的土地
和我们耕耘的狭田。
咱们谈谈没有土地的兄弟们
和没有学上的孩子们。
咱们谈谈赋税，
谈谈牲畜，谈谈饥荒。
咱们谈谈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

煤田上、金矿上、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咱们谈谈黑暗的矿井
和远离家人的宿舍的冰凉。

这些话语深深打动着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的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为大会的即将召开感到欣喜和激动。

1955年6月25日，星期六，人民大会的代表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克里普敦的一块草地上，这里距约翰内斯堡几英里，是一个居住着黑人和部分有色人、印度人的村庄。到会代表共2884名，其中有2222名黑人，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和112名白人。他们是冲破重重阻力来到这里的，南非当局曾给予各种刁难，但是终究没能禁止大会的召开。

不同肤色的人们走到了一起，工人、农民、牧师、医生、用人坐到了一块，他们情绪高昂，兴奋异常，好像是来出席一个重大喜庆节日的庆祝会。卢图利酋长高兴地说，这次大会是南非联邦成立以来，第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会议。一位前来参加会议的英国记者将眼前发生的一切一一记录下来：“身材高大的非洲老奶奶，穿着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标志的裙子、上衣、包头，提着行李在转悠；年轻的印度妇女，穿着艳丽的莎丽，披着绣有非洲人国民大会字样的三色披肩；白发苍苍的非洲老人，拄着拐杖，带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袖箍，来自约翰内斯堡的年轻城市工人戴着宽边帽，结着鲜明的美式领带，穿着紧身裤；服装裁剪得体、举止温文尔雅的印度律师和商人充满自信地在人群中走动。”人群中有人高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获得自由，斗争万岁！”

大会按照预定程序一项项地进行着。大会的日程为两天。26日，人民大会先后用英语、索托语和科萨语向代表们宣读

《自由宪章》。宪章的宗旨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种族集团享有同等权利；人民共同享有国家的财富，共同使用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平等的人权；人人都有工作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人们将拥有住房和安全保障，将有和平与友谊。《自由宪章》呼吁平等，要求自由，它在一开始就写道，我们南非人民向国内外宣告：南非属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全体人民，不分黑人还是白人。

《自由宪章》提出的主张受到大会代表们的热烈拥护，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就在大会准备结束的那天下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武装警察包围了会场，对代表们进行搜查，标语、文件和发言稿都被搜走。大会主席面对这一预料之中的突发事件，十分镇定，他要求代表们保持肃静。大会在庄严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在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代表们全体起立，放声高唱《上帝赐福非洲》。在乐队奏响的《自由之歌》的乐曲声中，人民大会落下了帷幕。这是一次难忘的盛会。

第 四 章

曲折的斗争道路

● “叛国罪审判”

任何要求种族平等的运动都是白人政权所不能容忍的。3个月后，南非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警察搜捕行动开始了。当局出动了上千名警察，发疯似地闯入人们的住所和办公室，搜走了所有他们认为可以构成叛国罪、煽动共产主义罪、组织暴乱性集会罪的“罪证”。

对曼德拉的禁令即将到期的时候，当局的特别行动人员又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向他宣布了为期不再是两年、而是5年的禁令！长期的限制、软禁以及经常性的搜查、审讯，给曼德拉的婚姻造成了不利影响。在他还读大学的时候，他同一位漂亮的护士结了婚，她名叫伊威林·梅思。这时，他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动荡的生活使他的家庭出现裂痕，梅思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惊吓和担心的生活，同他分手了。然而，曼德拉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怎么能够为了个人的安逸而就此罢休呢？

警方的搜查活动还在进行，人民大会之后，突然袭击式的搜查已经多得数不胜数，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的手稿和其他各种文件、资料，都成了重点搜查、清理的内容。1956

年12月5日凌晨，正在奥兰多家中休息的曼德拉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这时等待他的是又一次逮捕！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南非警察在全国各地一共逮捕了156人，他们是“人民大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自各个方面，其中有105名黑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和7名有色人。非国大的著名领袖人物——全国主席卢图利、开普省主席马修斯、还有西苏鲁、坦博等，全都被逮捕。被捕的白人大多是共产党人。

所有被捕的人都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叛国罪审判”开始了。

“囚犯”们被押送到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长期受禁令管制、只能各居一方的政治家们在这里会面了，按照卢图利的话讲，现在可以无限期地交谈了。

两个星期后，预审开始了，审判在德里尔厅举行。很多人自动地聚集到德里尔厅外面，高声唱着歌曲，为被告们助威。大厅里挤满了人：听众、记者、警察，显得热闹非凡。156名被告坐着囚车来到审判庭上，他们一排排有秩序地坐下，俨然一个出席会议的庞大代表团。在一片乱轰轰的嘈杂声中，法官宣布开庭，但他马上发现麦克风出了问题，听众席上什么也听不见。不得已，第一次预审还没开始，就在一阵轰笑之中宣布休庭了。

经过以后的几次审讯，当局掌握的所谓“罪证”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一些被告被保释出来，但他们每天还要回到德里尔大厅，参加继续进行的无聊的审讯。曼德拉和坦博在预审期间没有关闭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每天一早，他们就来到这里工作，然后按时赶到法庭上耐着性子熬过一天。晚上他们又出现在事务所，办理所接的案子。

在“叛国罪审判”中，为被告担任首席辩护律师的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梅塞尔和费舍尔，他们是国际知名律师，在他们的主持下，组成了辩护律师团。国际法学专家委员会也派出观察员到场旁听，这使得“叛国罪审判”成了国际上令人关注的一件事情。一名观察员评价说：自从德国国会审判之后，除了纽伦堡审判，再没有像这样举世瞩目的了。

辩护工作进展顺利，1958年8月，经开庭审理，一批人被免于起诉，其中包括卢图利大酋长和坦博在内。曼德拉和西苏鲁等91人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国罪，不过他们并不悲观，他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责任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时，法庭设在比勒陀利亚，从约翰内斯堡到那里有40英里的路程，曼德拉和其他几名被告每次要一起开车前往。一路上，他们谈笑风生，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正在受审的“要犯”。他们谈天说地，也谈论这次审判，评论他们的辩护律师，有时干脆扯远了话题，回忆起各自的童年时代。

1959年1月，辩护律师们又一次在法庭上取得胜利，他们又使61名被告免于起诉。这样，原有的156名被告中只剩下30人还在受审，曼德拉和西苏鲁均在30人之列。

就在这时，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闭了。因为《集团住区法》已经开始实施，根据该法律，他们的事务所只能迁到黑人城镇去开业。按照曼德拉的话讲，是要他们迁到“哪也够不到的旮旯里开业”。曼德拉气愤地说：“这其实是让我们关张，不让我们为黑人服务，而我们多少年所受的训练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哪位称职的律师会轻易答应这样做。”曼德拉气愤之余，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蔑视法令的行动。只要有可能，有机会，他们就继续在当地受理案件，给黑人提供法律帮助。

这一年真是个多事之秋，“叛国罪审判”尚未了结，非国大内部又出了问题。由于曼德拉和几位高级领导人正在受审，行动不自由，非国大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受到了影响。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会员越来越强烈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自称为“非洲主义者”的会员，明确反对非国大在组织上与白人和印度人联合，认为“多种族主义”不利于唤起黑人的民族意识，反而给白人以操纵和破坏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机会。所以，他们主张黑人应团结一致自己干。“非洲主义者”的代表是罗伯特·索布克韦，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当教员，他为人耿直，才智超群，平时挺有号召力。1959年4月，非国大终于发生组织上的分裂，“非洲主义者”脱离出来，另组建“泛非主义者大会”，罗伯特·索布克韦当选为大会主席。

曼德拉对“非洲主义者”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非国大打击的是种族主义制度，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白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并不是要建立黑人种族主义；非国大的任务是要教育民众接受一种更为明智的斗争观念。

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普通黑人群众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大会提出的“非洲属于非洲人”、“帝国主义滚出非洲去”、“非洲，我们的土地”等口号，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在苦难中挣扎，对现实社会极为不满的黑人群众的心声。泛非主义者大会刚成立时，会员并不多，但是由于他们的观点很有吸引力，4个月后，便发展到了24664人。

泛非主义者大会成立以后，便立即着手发动了“反对通行证法”运动。1960年3月，索布克韦带头不携带通行证，到警察局门前自愿被捕。南非当局对这一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佩维尔惨案。

非国大领导人对这次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卢图利以其特有的地位和威望，号召人们烧毁通行证，并为惨案中的死难者举行哀悼。南非各地的黑人积极响应，罢工、游行此起彼伏。

南非政府为了稳定局势，于3月30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始了大搜捕行动，有大约2000名黑人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关押起来。4月8日，政府宣布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会。从这一天起，非国大和泛非大成了非法组织，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徒刑。

沙佩维尔惨案教育了非国大和泛非大领导人，当局取缔两大组织的决定更使他们从美好的愿望中惊醒。他们开始重新认识非暴力主义原则。

索布克韦由于发动“反通行证法”运动，被判处3年徒刑。刑满时又遇政府颁布新的法令，对政治犯可以无限期拘留，于是他被押送罗本岛，直到1969年才予以释放。

在紧急状态法实施后的大搜捕行动中，一些已释放的“叛国案”的被告再次被捕。卢图利被关押到比勒陀利亚监狱，曼德拉等30名还在审判中的“罪犯”，也被关进同一所监狱。

监狱的条件极为恶劣，每间又小又暗的牢房里关着5名黑人犯人，里边还放着一个马桶，一个饮水桶。睡铺的草席上虱子、跳蚤肆虐横行，每日的饭菜让人难以下咽。狱中规定，犯人每天可到院子里放风10分钟，每10天可洗一次澡。曼德拉代表被关押的犯人在法庭上提出抗议，他说：“用最婉转和最不夸张的语言来说，监狱给我们提供的饭菜根本不适合人类食用。”经过努力，监狱条件有所改善。

在此期间，判国罪审判案进入了为被告辩护阶段。鉴于紧急状态法的实施，被告辩护律师团宣布无法为政治案件辩

护，并退出法庭。他们一致推举曼德拉和律师诺克韦在受审期间兼任被告辩护律师。

1960年8月，曼德拉出庭答辩。法官和原告方律师不断提出尖锐问题，他不慌不忙地一一给以有力回答和反驳。

在法庭上，他头脑清晰，论据有力，对问题的阐述时而咄咄逼人，时而幽默诙谐；时而谈锋犀利，时而平缓柔和。

他对1952年的蔑视运动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运动取得了一定胜利。“它刺痛了欧洲人公众的良心，使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非洲人的遭遇和无权。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民主人士大会’的建立……还导致了联合国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讨论，我想就这一点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

对于非国大要在法律上为争取黑人的自由和平等而斗争的主张，法官发问道：“难道不是你们的自由构成了对欧洲人的直接威胁吗？”

“不，”曼德拉答道，“我们不是反对白人，我们所反对的是白人至上，在反对白人至上的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支持。”接着，他明确指出：“事实上，在我们发动蔑视运动以前写给当时的国家总理马多博士的信中，我们说将要发动的运动不是直接对准某一种族集团。这一运动所直接反对的是那些在我们看来非正义的法律，非国大曾不遗余力地对此予以解释……不言而喻，非国大一直主张种族和睦政策，而谴责种族主义，无论它是谁提出的。”

当问到人民民主能否通过统治阶级作出一系列让步来实现时，曼德拉以十分轻松的口吻回答了这个严肃的问题：

“噢，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必须首先解释，据我所知，非国大从未坐下来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要求普遍的公民权利，并准备施加压力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开

展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或者单独或者同时开展，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态和待在家里运动造成的整个局面。让我们谈判吧。’我个人认为，我会说，好吧，让我们谈判吧。”

曼德拉接着作了一种设想。他说，政府这时可能会说：“眼下白人还没有做好让非白人当政的准备，我们可以先在议会里给你们60个席位，把这个问题留待5年以后再来审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那将是一个胜利，我的先生们。那样将会使非洲人在获得普选权方面前进一大步。我们将在5年内，比如说，中止蔑视运动，不开展任何待在家中运动。”在暂时停止抗议活动的同时，要让白人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它将增进种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使种族关系更为和谐。

“不过，”曼德拉强调说，“我当然不会放弃为所有非洲人进一步争取普选权的要求……在5年结束时，我们将再与政府进行讨论，如果政府说，‘我们再给你们40个席位’，我可能说，那就足够了。我们将接受下来，并进一步要求扩大公民权利，但是在相互商定的时期内，我们将中止蔑视运动和待在家中运动。这样，我们最终能够得到我们所要求的所有东西。”

曼德拉一字一句、落地有声地说：“我们应当享有我们的人民民主，我的先生们。这就是我的观点。”

法官紧追不舍地问道：“如果政府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不做出任何政策上的松动，你将有什么打算呢？”

对此，曼德拉冷静地回答说：“非国大并不期望迫使政府改变政策的努力会一蹴而就。尽管政府要以铁腕手段统治非洲人，非国大希望经过一段时期不断地施加压力，再加上国

际舆论的推动，我们正在运用的方法最终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

说到这里，原告律师突然话锋一转，就暴力问题，向曼德拉发问：曼德拉先生，不管有没有最后的胜利，非国大不是一直认为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来对付反抗行动吗？

“是的，阁下，”曼德拉回答道，“非国大是持有那种观点。”他接着指出：“就政府方面而言，我们的确预计它将会诉诸武力；但是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始于我们这一方。”

“都有些什么预防措施？”

“例如 1952 年我们发动蔑视运动，另外，先生，你会注意到我们经常开展待在家中运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罢工’。”曼德拉解释说，通常的罢工要组织纠察队劝阻工人们不要去上工，而非国大认为组织纠察队会引起警方的暴力，所以使用了“待在家中”的提法。

对方又问，是否认为刚才提到的政府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在增长？

曼德拉斩钉截铁地说：“是的。我们觉得，政府为了恐吓非洲人不要反对政府的反动政策，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数以百计的非洲人。”

在法庭证词中，曼德拉还谈到了对共产党人的看法。当时，被告辩护律师问道：青年联盟中的一些成员是不是拥护把共产主义者从非国大中驱逐出去？

“是的，先生，”曼德拉答道，“青年联盟在非国大的会议上提出过把共产主义者从非国大中驱逐的动议。但这些动议被大多数人否决了。”

“这些动议被否决的原因是什么？”

“非国大认为，每一个年龄在 17 岁以上的人，不论其政治观点如何，都有权成为非国大成员。”

曼德拉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当时也坚决主张将共产主义者从非国大中清除出去。当被告辩护律师问他现在是否已变成一名共产主义者了，他说：“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成了共产主义者。如果你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是指共产党的一名成员，一个信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的人，并严格遵守该党的纪律，那么我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曼德拉承认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且被社会主义所深深吸引，但是还没有在这方面做过深入研究。

法庭成了曼德拉宣传自己观点和主张的场所。长期的禁令管制，使曼德拉几乎一直不能在公开的场合里演讲，而对“叛国罪”的审判给了他这个机会。他有问必答，口若悬河，语速不紧不慢，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接着，法官问到了对一党制政体的看法。曼德拉很客观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阁下，这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民主问题。如果一党制能够充分体现民主，我将十分仔细地考虑一党制建议。如果多党制能够充分体现民主，我将认真地予以考虑。在我们这个国家，目前实行的是多党体制，但是对非欧洲人来讲，这是迄今为止最邪恶的专制体制。”

法官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是否被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所吸引？”

“是的，阁下，的确如此。我认为许多罪恶皆源于阶级的存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但是……非国大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任何成形或任何形式的政策。”

在曼德拉的证词当中，当局没有抓到任何他们认为有价

值的东西。

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法，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但是判国罪审判案尚未了结。其他非国大领导人也先后出庭答辩，继而是被告律师出庭辩护。

经过4年多的调查、取证和审讯，当局仍然无法证明被告确实犯有“叛国罪”。1961年3月29日，曼德拉和其他被告都来到了比勒陀利亚，听候法庭的最后宣判。

法庭里坐满了人，但却全然不见了第一次预审时那种吵吵嚷嚷的热闹局面，气氛显得有些紧张。这时，高级法官贾斯蒂斯·朗夫宣布对本案的调查结果：非国大及其盟友正致力于用一种激进的、完全不同的体制来取代现政府；非国大的行动纲领主张使用非法手法，蔑视运动中也使用了非法手段；有些非国大领导人发表过煽动暴力的言论，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非国大奉行了暴力政策；非国大表现出反对帝国主义和亲近苏联的左翼倾向，但是尚无法证明非国大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已被共产主义者渗透。

“鉴于上述调查结果，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释放。”朗夫法官话音刚落，公众席上立即爆发出欢呼声。人们簇拥着曼德拉、西苏鲁等人走出法庭，一些人早已把首席辩护律师梅塞尔和费舍尔高高举过肩头，人们就像庆祝节日一样喊着、唱着、跳着，大地上再次回响起了《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

● 他属于温妮，更属于人民

就在“判国罪审判”刚刚开始的时候，温妮·马迪基泽拉出现在曼德拉的面前。这位年轻美丽的姑娘以她特有的魅

力，使性格刚强、身材高大的曼德拉一下子卷入了爱情的河流，并以她浓烈的爱恋和温情，支持着曼德拉走过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她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南非土地上的一位杰出的黑人女性。

“在我第一次遇到温妮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曼德拉是这样说的。

“你的爱情和支持，你身体内令人销魂的体温，你为这个家庭生育的可爱的孩子，你赢得的许多朋友，不断享受这种爱情和温暖的渴望，所有这一切对我说就是生活和幸福的意义所在。我爱着那位值得去爱和信任的人，那位以自己的爱情和坚忍的支持给了我那么多力量和希望的人……

“如果不是你的探视、你的令人感动的来信和你的爱，我会早在多年以前就支持不住了。”

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话语。

温妮是在农村长大的姑娘。她的父母都是村里的教师，父亲教历史，母亲教家政。她从小就体会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白人觉得自己比我们高贵。我能看出，与白人教师相比，我父亲的衣着显得多么不体面。”父亲的历史课是小温妮难以忘却的。父亲给孩子们讲述了班图族的科萨人为捍卫领土和自由奋起抗击白人殖民者的9次科萨战争。当时，父亲气愤地把白人政府编的课本往旁边一丢，说，书上说的不是事实，“事实是这些白人入侵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手里夺走了土地。黑人和白人之间最初的冲突是因偷牛引起的。白人偷了牛，黑人抢了回去”。孩子们瞪圆了眼睛，听得安静极了。

父亲还告诉孩子们：“当你们的父辈到矿上做工时，他们被看作‘听差的小伙计’，连白人的孩子也这样叫他们。当你

们的母亲为了供你们上学而到城里工作时，她们被称为‘小丫头’。这是白人侮辱黑人的一种方式。”

温妮父亲的讲述，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懂得了什么是恨，什么是屈辱。

课堂上，孩子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自己的部族歌曲：“我们的黑人领袖聚集在布隆方丹，那是一次盛大的黑人集会。领袖们要求黑人们团结起来，向共同的敌人开火！”

温妮在约翰内斯堡上大学的时候，和一位名叫爱蒂莱蒂的姑娘住在一起，她们俩很要好。后来，温妮能够结识曼德拉，应该说是爱蒂莱蒂无意之中给牵了红线。当时，爱蒂莱蒂正和坦博处在热恋之中，每次约会时，她总要让温妮陪她同去。说来也巧，温妮和坦博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他们来自同一村落——比扎那村，因此，大家每次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一天，温妮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没走两步，就遇到坦博和爱蒂莱蒂从后面开车过来，他们招呼温妮上了车。这时，爱蒂莱蒂开始叫唤肚子饿了，于是，坦博把车开到一家食品店旁边停了下来。可是当选好食品该付款的时候，坦博才发现自己没有带钱。正在尴尬之中，突然看到曼德拉也在这里买东西，坦博高兴地脱口大叫：“让他付钱！”温妮看见这位早就为许多黑人所熟知、所敬畏的男人爽快地替坦博付了款。当他们一起走出食品店的时候，坦博指着温妮主动向曼德拉介绍说：“这是温妮，比扎那人。”

这就是曼德拉与温妮最初的相识。当时，温妮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后等着她的，是与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的进一步交往，并从此走进了他的生活，成了他的妻子，他的精神支柱。

几天后，温妮突然接到了曼德拉打来的电话，约她星期天出去吃午饭。温妮一下子愣了，这在一般的女孩子们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温妮只是个20岁出头的普通姑娘，他不但比她大得多，而且是一位有着很高社会威望的人，温妮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放下电话后，她一整天心神不定，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她只觉得很兴奋，又有些紧张。

约好星期天派人来接她。当温妮被送到曼德拉的办公室的时候，曼德拉还在伏案工作，对他来讲，从来没有星期天的概念。

见到温妮，曼德拉赶紧停下手里的工作，站起身来与她热情地打招呼。他陪着温妮走出办公室，来到一家印度餐馆吃饭。饭里放了许多咖喱粉，温妮被辣得直要流眼泪，可曼德拉却吃得津津有味。见温妮吃得那副难受的样子，他很体贴地递过一杯水来，说：“如果你觉得太辣，喝点水就会好的。”

不断有人过来找曼德拉商量事情，要他拿主意。虽然是两个人的约会，但是温妮感到他们俩人只是在空间上在一起，而在时间上都被别人占用了。温妮就像个局外人一样从始至终看着他们谈话，她觉得有些不自在。

从餐馆出来后，几乎每走一步都有人上前与曼德拉谈话，温妮简直感到有些吃惊：这可是星期天呀，假日尚且如此，平日不知要忙成什么样子！半个小时后，他们总算坐进了曼德拉的车子里，只有这时，才有了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空间。

驱车回到办公室，又是满屋子的人。外表粗犷、内心却很细的曼德拉早就注意到温妮被冷落时的窘态，于是，他建议到城外去走走。

他们驱车来到了城外的一片开阔的田野上。在这里，他们开始了无人打扰的、面对面的交谈。一阵清风吹来，令人

感到十分惬意。他们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也是在这样宽阔的田野上，他们放牧过牛和羊。对童年时代的家乡——特兰斯凯的回忆，使温妮觉得很轻松、愉快，一下子拉近了她与曼德拉的距离。临分手前，曼德拉对她说，打电话约她出来，是想请她帮助“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会”募捐。这个基金会是民间发起成立的，在叛国罪审判刚一立案时，民间便发起了“我们与领袖站在一起”的运动。眼下，正值审判期间，曼德拉自然而然地又谈到这个话题。温妮一时间有些语塞，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也能参与这么重要的活动。

时间很快过去了，该分手了。曼德拉看着温妮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轻声说：“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他俯身吻了她。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他们以一种极特殊的方式开始了恋爱过程。曼德拉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单独和温妮呆上一会儿。他只是每天定点派人去接她，不是接到体育馆看着他大汗淋漓地锻炼身体，就是去郊外会朋友、谈工作。温妮跟着他认识了很多很多人，也懂得了许多黑人解放的道理。

在他们的恋爱史上，找不到任何浪漫的色彩，原因只有一个：没有时间。曼德拉每天马不停蹄地工作着。突然有一天他对温妮说，他认识个女裁缝，准备为她制作结婚礼服，让她赶快去找那个裁缝。接着他又问道：“你喜欢要几个女侯相？”温妮虽然感到突然，但却并不吃惊，这就是曼德拉！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甚至没有一句正式求婚的话，他就这样告知温妮他准备和她结婚了。温妮深深地爱着曼德拉，但是出于姑娘的羞涩，她从未主动吐口要求过什么，她知道，曼德拉也同样热恋着她。不用再说什么了，她只是直截了当地回问了一句：“什么时间？”

曼德拉让她回家乡走一趟，把终身大事告诉家里人。温

妮立即动身赶赴家中，她婉转地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后很吃惊，他没有想到女儿要嫁的是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他为女儿感到骄傲。不过，惊喜过后又有些担忧，作为父亲他考虑得很实际，很具体，言语之中表露出慈父对女儿的一片深情。父亲分析了3点：第一，曼德拉有3个孩子，尽管孩子们眼下全都跟母亲住在一起，但他毕竟是孩子们的父亲，温妮结婚后就成了继母，要想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二，在特兰斯凯地区，离婚这件事本身就是件不光彩的事，特别是温妮的家庭属于部落王族之列，更在乎这类事情，如果人们说三道四，温妮能承受吗？第三，目前“叛国罪审判”正在进行，曼德拉不但受审，而且是此案的要犯，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显然令人担心。

温妮深深感受到父亲对她的爱，父亲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他所说的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他在担心女儿今后吃苦！可她也知道，父亲十分崇敬曼德拉，父亲是支持曼德拉的事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有这一点也就够了，至于她本人，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她认为：“如果你了解纳尔逊，你就会成为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必定会牵动着你……他给人以信任、忠诚和无比的勇气。如果你像他那样投身于我们的事业，那就一点也不会去考虑你自己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1958年，他们结婚了。婚礼是在温妮的家乡所在地庞多兰举行的。依照传统习俗，本该去曼德拉的家里再举办一次婚礼，才能算是完成了结婚仪式，但是时间不允许。因为曼德拉禁令在身，又值叛国罪审讯期间，按规定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经申请特批了他4天婚假。婚礼一结束，他们便返回了约翰内斯堡。细心、多情的温妮，悄

悄将留下的半个结婚蛋糕一起带了回来，因为她觉得，仪式还没有完成，她希望有机会将这半个蛋糕带到曼德拉的家中，去完成另一半婚礼。她将这块蛋糕收藏起来，保留了很久，很久……

婚后的生活是不安定的。在温妮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家庭生活。她说：“我从来没有过一个年轻新娘的体验：同丈夫坐在一起，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对此，温妮没有丝毫的怨言，她对曼德拉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并付出了一般女人所难以付出的牺牲。

她是这样说的：“你不能把纳尔逊和人民分开，和斗争分开。他的献身精神是彻底的，然而他也仍然流露着一种爱。我和孩子们从他那里懂得了爱，我认为，这种爱是无法从其他任何地方找到的。他给予我们理解、忠诚和信心。甚至当这一切被全民族分享的时候，他也总让你感到，你对他来说又不同一般。我同他结婚时就知道，我是和他所从事的斗争相结合，和我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相结合。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短暂的瞬间，他心中充满了挚爱。”

“叛国罪审判”还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着。每天曼德拉都要去比勒陀利亚接受审讯，担任辩护律师后，休庭以后也不能马上回家，因为他还要和其他律师一起找被告谈话，准备辩护词。回家后，还常常要赶去参加非国大的各种会议。他几乎没有吃饭的时间，往往要温妮强迫他坐下来吃饭，可还没吃两口，电话铃又响了，不是哪位朋友就是哪位亲戚被关起来了，要他去警察局保释。

曼德拉好像生来就是为别人活着的，他生活在黑人群众之中，时时刻刻在为黑人们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确实像温妮所体会的那样，他把个人的一切早已融入了黑人大家

庭之中。

有一次，曼德拉正在街上走着，迎面遇上一个黑人招呼他进道旁的店里去看看，显然他是被雇来推销商品的，店主是个犹太人。曼德拉在那位黑人热情的招呼下不得已走入店里。店主见有人来了，马上向他兜售一条裤子，而那个黑人则拿起一顶深绿色的软边帽子想让他买下，这时，那位白人店主又向他推荐另一顶帽子。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不紧不慢地，但却是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黑人手中的那顶软边帽。黑人非常高兴，一边收钱，一边连声说“谢谢”。那位黑人哪里知道，曼德拉其实从来不戴帽子，他买下这顶帽子的原因就是为了让黑人能有碗饭吃，他知道黑人不容易！温妮事后回忆起这件事深有感触地说：“在我们的名下，连一分钱的存款也没有，原因就在这里。他回到家里，手上拿着那顶帽子，把它扔到一边。崭新的帽子，而且那么昂贵！他付了钱只是因为一个黑人央求他买。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经济上，他是我们家的灾星。他口袋里从未存过钱，如果某一天他去为两三个案子辩护，口袋里偶尔有了10个兰特，他就会带着只有两岁的女儿津妮去买件漂亮的衣裳。他也会去买成箱成箱的水果，他非常注重健康，而健康需要高蛋白和蔬菜。当然，他每天还锻炼身体。我们那一点点钱就是这样用光的。”

曼德拉从法庭上回家时，还常常带一群朋友来，他会对温妮笑着说：“亲爱的，我的朋友们来品尝你的烹调手艺了。”有时，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了，温妮急得要命，他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自己跑出去，到附近的小铺子里买些鱼罐头回来，招待客人们。“他总是这样，没有银行存款，也不可能。”

在丈夫的影响下，温妮也投身到了黑人运动中。她加入了非国大妇女联盟和多种族南非妇女联合会，并且很快当上

了这两家组织的执行委员。1958年，她们组织了反对通行证法的示威游行，全国有成百上千名妇女被捕，温妮也在其中，她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坐监牢的滋味。当时她已经怀孕了，多亏西苏鲁的夫人在狱中对她百般关照。她们在狱中被关了1个月。

这样一来，家庭生活就更没有保证了。按照温妮的话讲：“在斗争中，我们完全是同事和同志。他去开会时，用不着告诉我，我认为那很自然。执委会有时开一整夜会，他回家后找不到我，便知道我是去开自己的会去了。一天下来，我们甚至还没有互相问候一句。这就是我们家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0年圣诞节，法庭休庭，曼德拉怀着急切的心情赶回家与亲人团聚。他先回到特兰斯凯看望了生病的儿子，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约翰内斯堡。这时，他的第二个女儿津莽出世了。他在一家医院的“非欧洲人”住院部见到了疲惫不堪的温妮和可爱的小女儿。他高兴之余又很生气，因为她们在这里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于是，他决定接她们母女二人回家，好利用这短暂的节日，全家人团圆团圆，在精神上给温妮以安慰，在物质上给她们以照顾。他觉得自己欠温妮的太多了，他为自己无法当一个称职的丈夫而感到内疚。好在温妮的忍耐精神很强，对丈夫又十分理解，因此，她对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视而不见。长期生活在这种毫无安全感的环境中，要是换成另一个女人的话，早就心灰意冷，忍受不了了。曼德拉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自责的同时，又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妻子而感到幸福和骄傲。

● 放弃非暴力主义

60年代初南非当局镇压黑人运动力度的加强，使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在血的事实面前，不得不重新考虑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卢图利大酋长在谈到几十年非暴力反抗的结果时，心情沉重地说：“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大门？……过去30年间人们看到的是大量限制我们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毫无权利的地步：土地不足、牲畜减少、家无安宁、业无保障、行动无自由、夜间禁止出门、进城受到控制。总之，这些年来，我们所眼见的是不断强化对我们的统治以确保白人的权利。”这是对非国大几十年来奋斗结果的痛心的总结，良好的愿望、温和的手段带来的却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过去，非国大老一代领导人一直崇尚非暴力主义原则，习惯于公开发动群众。如今，在非国大被当局宣布取缔、成为非法组织的情况下，基层组织中对非暴力主义原则的批评越来越多了，他们呼吁，非国大已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应当重新考虑斗争原则和手段了。

曼德拉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过进行暴力反抗的建议，这时他又不失时机地指出：“如果政府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摧垮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严肃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看来，在非暴力政策问题上，旧的一章正在

结束。”他阅读了大量国外军事家和政治家关于游击战的著作，包括毛泽东的和格瓦拉的，开始考虑武装斗争的问题。他把武装斗争划分为4种类型：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公开革命。鉴于南非的具体情况，非国大认为只有“破坏活动”适合斗争实际需要，并且还要有所节制，即破坏活动的打击目标是政府的经济设施、建筑物和其他种族主义象征，而不是伤害人身。为此决定，不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袭击可恨的南非军队和警察，也不暗杀白人。他们要避免由于“不加区别对待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南非种族浴血战争。因为如果不加以限制，黑人出于对白人政权的深恶痛绝，难免出现极端行动，而白人政权又总是以大规模的镇压、枪杀黑人来进行报复的。

认识统一后，非国大领导人开始了积极的行动。他们首先精简领导机构，迅速建立起各级组织秘密联络网，将过去公开的活动转为地下斗争；接着，派坦博到国外建立代表机构，开展外交斗争；与此同时，积极筹备建立一支武装力量。

按照非国大的决定，执委会成员从27人减为7人，这7人当中，除曼德拉以外，全部转入地下，以免暴露身份。曼德拉在必要时要公开露面号召组织群众，并以一人之身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对于曼德拉，这意味要冒极大的风险，并随时准备做出最大的牺牲。时过不久，曼德拉便成了当局缉拿的要犯，通缉令发布到全国每一个角落，警察纷纷出动搜捕、追踪他。不得已曼德拉也转入地下。

为了躲避警察的视线，曼德拉需要不断地挪动地方，并乔装打扮自己。因为他早已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又身材高大，引人注目，所以稍不小心，就很难不被别人认出来。

他已经不能公开回家了，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悄悄回

来与妻子和女儿见上一面。温妮回忆这段往事时，觉得在紧张之中又很富于戏剧性：“黎明时分，我等待着那神圣的敲窗户的声音。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敲，从未约好过。开始时，根据政治形势，他常常在凌晨回家，呆上约一小时的样子。后来，警察一天 24 小时监视我，我只有先溜出封锁线，才能去找他。一旦出了封锁线，便有人前来，要我驾车跟着他。离我的住所约一公里处，换乘另一辆车，接着从这一辆再换乘下一辆，等我见到他时，差不多已经换了 10 辆车。我从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的隐藏地遍布全国各地。”

有时，温妮被安排与曼德拉见面时，他已经装扮成了汽车司机或者清洁工人，连温妮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有一次，温妮正在干活，有人过来让她开车到一个指定地点，那辆车是曼德拉留给她的，已经很破旧了。她按来人的嘱咐把车开过去后，马上有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蓝色工装裤、和白上衣的高个子男人走过来。温妮觉得看上去很陌生，她正想辨认一下是否见过此人的时候，只见他径直打开她的车门，并命令她让出司机的坐位，坐到旁边去。接着，他一屁股坐到了驾驶座上。天哪！直到这时，温妮才认出他就是自己的丈夫！就这样，曼德拉驾驶着破车，在妻子的陪伴下，大大方方地来到了一个车行。他很快把旧车卖掉了，然后又为温妮买了一辆新车。他们驱车来到了繁华的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停车线前停了下来，这里是苏尔大街，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曼德拉向温妮说了声“再见”，便打开车门从容地走出汽车，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在事业和家庭这对矛盾之间，曼德拉无疑选择了事业，但他尽自己所能给温妮一点帮助和安慰，因为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深深地爱着她。残酷的斗争现实，使他无法尽

职尽责地当好温妮的丈夫，当好儿女们的父亲，可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1961年6月26日，是9年前“蔑视运动”发起的日子。曼德拉在这天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这份声明以“斗争是我的生命”为题，谈到了要动员黑人的全部力量，拒绝与政府的合作，并利用各种手段，破坏南非正在动摇的经济；呼吁国际组织开除南非，呼吁世界各国断绝与南非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此外，曼德拉也谈到了他自己：

我已经得知一个逮捕我的通缉令已经发出，警察正在追捕我。全国行动委员会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严肃的考虑，并且已经征求了很多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机构的意见。他们建议我不要去投案。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我将不向一个我不承认的政府投案。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会认识到，在这个国家当前的条件下，把自己交给警察，寻求廉价的牺牲是幼稚和犯罪。我们目前有一个重要的计划，认真地、毫不迟疑地实现它非常重要。

在这里，曼德拉所说的计划实际上指的是M—计划，这是一个保证非国大组织转入地下后继续斗争的行动方针和计划。

我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是一条比坐牢更为艰难、更要承担风险和困苦的道路。我不得不与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开，不得不离开我的母亲和姐妹们，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一个逃犯那样生活。我不得不关闭我的事务所，放弃我的职业，像我的许多同胞那样，生活在贫困

和痛苦之中。在今后一段艰苦的斗争中，我将继续担任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发言人。我将和你们肩并肩地与政府进行斗争，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直到赢得胜利……我不离开南非，也不自首。只有通过艰险、牺牲和战斗的行动才能赢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斗争，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这时开始，非国大积极筹备建立从事武装斗争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人们用祖鲁语称之为“恩孔托·维·西斯维”。曼德拉出任该组织的第一任总司令，全国最高指挥部设在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的里沃尼亚，那里的一个小农场——利里斯利夫农场租给了“民族之矛”。

斗争完全转入地下，到处是白色恐怖。政府悬赏捉拿重要人物。曼德拉遇到过几次险情，却都化险为夷，没有出事。11月的一天，曼德拉化装成司机在约翰内斯堡街头等车，接他的车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按预定时间来接他。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一位黑人警察正向他这边走来，两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黑人警察脸上露出的复杂表情明明白白地告诉曼德拉：他认出了他。曼德拉心想，这下完了。然而警察没有作声，他不露声色地从曼德拉身边擦肩而过，并且悄悄地向曼德拉伸了下大拇指。

1961年12月，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卢图利大酋长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因为他长期倡导非暴力主义而获得的。卢图利说：“功劳不是我的，它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确，非国大奉行非暴力主义原则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了非暴力反抗行动的里程碑。然而，几天之后，即12月16日，非国大便开始了完全不同的反抗行动——“民族之

矛”正式发动了武装斗争。

12月16日，是南非黑人永远忘不了的日子。1838年的这一天，祖鲁人为抵御布尔人的扩张，血染巴弗洛河。以后黑人们称这一天为“丁干日”，而白人则称之为“契约日”。“民族之矛”选择了这天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等地，搞了一系列爆炸破坏活动。在约翰内斯堡引爆了10枚炸弹，伊丽莎白港5枚，炸坏了一些高压电缆和政府机关建筑。

“民族之矛”在当天散发的宣传品中，向南非人民发表了宣言：

我们——“民族之矛”一直寻求在不发生流血和内战的情况下获得解放，就像解放运动所做的那样。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第一步行动能唤醒每一个人，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导致灾难的发生。我们希望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恢复理智，现在还为时不晚，在形势尚未发展到爆发内战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就更换政府并改变其政策。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是对国民党进行内战和军事统治的一个打击。

每一个民族都会面临只剩下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者战斗。南非正面临着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政府把运动的和平意愿视为软弱，把人民的非暴力政策当作政府实行暴力的绿灯，拒绝诉诸暴力被政府认为他们在对人民使用暴力时一点也不用担心会遭到报复。“民族之矛”的方式与过去这一切做了决裂。

在“民族之矛”开始采取行动的同时，“泛非主义者大会”也转入地下，并成立了自己的武装——“波戈”。“波戈”是科萨语，意思是独立。

60年代初期，“民族之矛”与“波戈”的斗争方式和手段有所不同。前者目标明确，只袭击政府的办公机构和经济目标，不袭击个人，避免流血；后者则把全体白人都当作攻击目标，他们袭击警察，杀死密探，甚至绑架并干掉为白人当局做事的黑人。

从1961年底到1963年，黑人的武装力量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进行了数百次破坏和袭击活动，引起白人社会的极大恐慌。但是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加上白人政府全力以赴的打击和镇压，他们一次次的行动遭到了失败，到1963年6月初，被捕的“波戈”成员已达到3000人以上。

为了取得广泛的支持和援助，曼德拉于1962年1月初偷渡出境，前往埃塞俄比亚等7个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以及英国访问。这时，他已是当局缉拿的第一号人物。离开南非，曼德拉觉得自己像一只逃出牢笼的小鸟，多少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含义。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他见到了老朋友奥利弗·坦博，坦博安排他在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上作了发言。在各国来宾的掌声中，他走上讲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感受、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头脑、以一个训练有素的演说家的口才，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南非种族主义制度下黑人的苦难，分析了今后的斗争前景，呼吁非洲各国领导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民对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给予关注和支持。

曼德拉坚信南非黑人的反抗斗争总有一天会取得胜利，他批评了对南非黑人力量持怀疑态度的观点。他说国外一些

人士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在我们国内特殊的形势下，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永远不会取得自由。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政府手中掌握着令人生畏的力量和镇压机器，它的军队对民众实行残酷镇压，对其政权的反对派进行种种迫害。为此，这些人敦促我们在国外寻找救国办法。”曼德拉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自己对这种观点的评价：“没有比这离真理更遥远的了。”

“以为外部压力会使我们从内部对付敌人变得不重要，产生这样的幻想对我们将有致命的危险。在南非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其核心和基础在南非国内。除了那些必须在国外从事重要工作的人员之外，需要大量的自由战士在国内开展斗争。”

他的讲话在来自东部和中部非洲的与会代表中产生极大反响，使人们真正了解到了南非种族主义制度的现状。

会后，曼德拉又访问了一系列非洲国家，会见了各国领导人，同他们交换了看法。他还走访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一个军事指挥部，在那里进行了考察和学习。阿尔及利亚的这支人民武装力量，于1962年7月结束了法国132年的殖民统治，成功地赢得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曼德拉为此很受鼓舞。

曼德拉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款待，并得到了给予南非黑人支持的许诺和保证。他看到这些国家里，白人与黑人和睦相处，同乘一辆公共汽车，同进一家影院，同住一个住宅区，所有这一切，在南非是不可想象的。此次出国，给曼德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回忆说，那些国家没有白人的压迫，没有愚蠢的种族隔离和种族偏见，没有警察的骚扰，没有羞辱与无礼，“所到之处，我都被当作人来对待”。

1962年7月20日深夜，曼德拉结束出访，秘密地回到国内。他先在约翰内斯堡向“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做了关于此次出访的报告，然后动身前往纳塔尔，给德班地区指挥部做报告。在那里，他按照约定会见了卢图利大酋长，二人相见分外高兴。谈话间，卢图利责备曼德拉在“民族之矛”宣布终止非暴力政策的问题上事先瞒着他，没有同他商量。曼德拉笑着作了解释，并表示歉意。他解释说这样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对大酋长而言，当时刚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么做的结果使他免于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从而起了保护他的作用。卢图利宽厚地表示谅解。分手时，他们相互拥抱，互祝平安。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第二天驱车返回约翰内斯堡的途中，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在靠近霍威克瀑布的地方，突然出现了3卡车警察，他们拦住去路，之后蜂拥而上，将他逮捕。

原来有人事先告了密，这些警察早就在这里等候他多时了。他们是来执行任务的，至于要抓的是谁他们并不清楚，只知道这辆车上有一位当局要捉拿的重要人物。

这一天是1962年8月5日，星期日。

● “历史将做出判决”

当局指控曼德拉煽动黑人罢工和未持有效证件出国。对他的公开审讯定在1962年10月22日，在比勒陀利亚举行，那里是曼德拉十分熟悉的地方，“叛国罪审判”曾经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进行。

曼德拉决定自己承担辩护。

开庭了，曼德拉身着民族服装出现在法庭门口。听众席上的人们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曼德拉面对情绪激昂的听众，挥动拳头高呼：“权力！”，人们立即齐声高喊：“属于人民！”

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了。他措词严谨、嗓音洪亮，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加上他那非凡的气度，引得通常一到这时就躲在一边打瞌睡的警察都睁大了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他谈到了历届政府使用暴力镇压和屠杀人民的情况，接着他说：“政府的暴力只能起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反抗的暴力……人不可能不做事，不说话，不对非正义作出反响，不对压迫表示抗议，不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 and 美好生活而奋斗。”

他在法庭上痛斥种族主义制度的罪恶，表达了自己对种族歧视的憎恨：“我对它的憎恨是基于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同样憎恨它。这个法庭对我采取的一切做法都不能丝毫改变我的仇恨，它的改变只能建立在消除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非正义和不人道的基础上。我一直为此而斗争。”

说到这里，曼德拉看了法官一眼：“无论阁下根据法庭裁决对我作出何种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之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就像人们总会做的那样。在我刑满释放后，我仍将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

曼德拉环顾了一下四周，表情坦然，语调平静地说：“我已做好服刑的准备，虽然我知道，一个非洲人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的处境会是多么痛苦和险恶。我曾经坐过牢，我知道

甚至在监狱的大墙内，对非洲人的歧视有多么严重，那里非洲人的待遇要比白人的待遇糟得多。”

他接着说：“但是，这些条件不会使我放弃已选择的道路，也不会使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放弃。因为对于人来说，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自由是他们最高的向往。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有信仰的人放弃它。”

他的话深深打动着在场听众们的心，有黑人，也有白人。从他们的目光和表情中可以看出，这位黑人领袖说出了广大黑人内心深处话，赢得了一些白人的同情。

曼德拉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南非各个角落，黑人们自发地组织集会，打出标语，强烈要求当局释放曼德拉。

1962年11月7日，法庭宣判的日子到了。温妮也赶到了现场。法庭外面，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法庭宣布了最后的判决：因煽动罢工判处3年监禁，非法出境判处2年监禁。这意味着曼德拉将要在监狱里度过5年漫长的岁月。曼德拉又一次充满自信地表示：“我毫不怀疑子孙后代将宣告我无罪！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来的罪人，是维尔沃德政府的成员们。”

宣判结束了，曼德拉走出法庭，面对无数关心、热爱他的人们，他坚毅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有节奏地大声呼喊：“权力！权力！权力！”他听到了周围的人们跟着他发出了3次震耳欲聋的呼声：“属于人民！”有人向他高喊：“曼德拉继续斗争！”温妮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同唱起了《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喊声、歌声响成一片……

曼德拉被押往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不久，他被转送到罗本岛最高治安监狱，这里与开普敦隔海相望。

就在曼德拉被监禁在罗本岛期间，又一次大的灾难正向

非国大走来。当时，“民族之矛”起草了一份武装推翻种族主义政府的计划——“马伊布依行动计划”，“马伊布依”的意思是“我们的土地”。这份计划需要提交全国最高指挥部讨论方可实施。1963年7月11日，正当沃尔特·西苏鲁和东开普的领导人戈万·姆贝基等6人在利里斯利夫农场讨论这一计划的时候，早已追踪至此多日的警察突然包围并逮捕了他们。“马伊布依行动计划”和几百份非国大文件，以及曼德拉访问非洲的日记，全部被搜走。接着，警察又顺藤摸瓜，破获了“民族之矛”的一个弹药库。

当局大喜过望，他们认为已经掌握了许多有力证据，因此，准备新帐旧帐一起算，对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重要领导人进行公开审判，要将他们判以重刑，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必要时，不排除对他们处以死刑！

这就是举世关注的里沃尼亚审判。

1963年10月9日，法庭第一次开庭。开庭之前，曼德拉已从罗本岛被押回比勒陀利亚监狱。审判在比勒陀利亚正义宫法庭举行。警察全副武装守卫在法庭内外，里沃尼亚案的被告们在警察的押送下到达现场。人们发现，将近一年未见到的曼德拉消瘦了许多，掉了足有40磅体重，不过，他神采依旧，举止气度仍然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他是此案的第一号被告。

“法庭肃静，起立！”随着喊声，法官们堂皇入场、就座。

被告们的首席辩护律师是在叛国罪审判的辩护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费舍尔，他又一次担负起了为黑人领袖们辩护的重任。他所率领的辩护团由伯朗基、查斯卡尔森、比佐斯等律师组成，乔尔·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他们心里十分明白，这个案子十分棘手，即使他们有三头六臂，也难以使被告逃脱

牢狱之苦，事实上，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方有可能使被告免于死刑。

大律师舍费尔首先集中力量抨击起诉书，他指出这个起诉书在没有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就抛了出来，因此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对曼德拉的指控中，说他参与了一系列破坏活动，而那些活动发生时，他早已被关在了监狱。法庭同意撤销起诉，第一次开庭只好草草收场。

12月3日，法庭重开审判。经过修改的起诉书对被告的指控是：以暴力推翻现政府为目的，招募和训练人员，从事破坏活动，准备游击战争；阴谋在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南非时给予援助；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推进南非的共产主义；为实现上述计划，寻求并接受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突尼斯等国的经济资助。

宣读完起诉书，法官发问道：“第一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申明有罪还是无罪？”

曼德拉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应该站在被告席上的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随后，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诉讼和调查。在这期间，法庭请到了173个证人出庭作证，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有同情被告的，也有出卖同事的。辩护律师团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告诫被告绝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指控他们企图推翻政府的罪名成立，他们将被判处死刑。费舍尔告诉曼德拉，他们必须成功地证明，关于游击战争问题他们从未做过什么决定，他们判定的暴力政策明确规定不得在破坏行动中伤害性命。费舍尔为了说明问题的重要性，还补充说：“我必须坦率地讲，即使我们成功了，法官也可能强加死刑。”

被告代理人乔尔·乔夫了解费舍尔的心情，他是多么不

愿意谈到这种可能性啊，但是为了不使它成为现实，他必须讲明白这一点。辩护律师和被告要齐心协力，对付所有难题。费舍尔的夫人曾经对乔夫说，她在夜里常听到丈夫说梦话，他好几次大声呼喊：“我必须救他们！”其实，乔夫何尝不是这样，他曾在睡梦中看见曼德拉等人被推上了断头台，他一下子被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经过律师们和曼德拉等人的反复商量，最后他们一致决定，由曼德拉以法庭供述的形式，在被告席上向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关注南非黑人解放事业的人民，发表一个政治声明，全面阐述非国大的立场，然后由其他被告对付法庭辩论。

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法庭再次开庭，经过几个月的诉讼，这一天将开始进入法庭辩论阶段。一大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正义宫法庭。温妮和从特兰斯凯赶来的婆婆也来到了这里，她们的心情既紧张不安，又激动不已，因为她们都为曼德拉的安危担心，同时又为能见到亲人而高兴，除此之外，她们也为曼德拉感到自豪和骄傲。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费舍尔主持辩护。他首先代表被告方承认“民族之矛”进行了破坏活动，但是否认被告曾制定过一个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然后他宣布，本案辩护将从第一号被告宣读法庭供述开始，“他亲自参加了‘民族之矛’的创建，能够向法庭讲清那个组织的来龙去脉”。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戴好眼镜，开始宣读他那经过一番慎重准备、事后引起巨大轰动的著名篇章：

我是第一号被告。我具有文学学士学位，曾与奥利弗·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几年律师业务。因为被

判犯有非法出国罪和煽动人民参加 1961 年 5 月底的罢工罪，我目前正在服为期 5 年的徒刑。

接下去，他驳斥了政府关于非国大受外界势力影响的指控：

首先我想说，政府在起诉中所说的南非的斗争是受外国人和共产党人的影响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的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由于外面的人可能说过什么。

说到此，我必须立即并且详尽地谈谈暴力问题。法庭上所提到的事情有些属实，有些不属实。不管怎样，我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这样做不是轻举妄动，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制订计划时对政治形势进行了冷静而认真的分析估计。这种形势的产生基于白人对我们的人民多年的暴政、剥削和压迫。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1962 年 8 月我被捕之前，我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言语坦率，毫无掩饰。他声明，“民族之矛”建立的原因有二：“第一，我认为，政府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非洲人民的暴力反抗。除非有责任心的领导能对人民的情绪加以引导和控制，否则将爆发恐怖活动。这会带来这个国家不同种族之间严重的敌视和仇恨，甚至超过战争所造成的后果。第二，我认为除暴力之外，非洲人民已没有其他途径来争取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斗争的胜利。反对这种主义的任何合法方式都被法律所禁止。我

们被置于要么永远接受下等人的地位，要么公然反对政府的法律。这两种选择之间，我们选择了反对法律。

说到这里，曼德拉又解释道，起初，非国大是力求避免通过暴力手段来反对法律的，但是由于其他方式和手段早已被禁止，政府又首先诉诸武力对付反对力量，“只有这时，我们才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

不过，“民族之矛”并非一个恐怖组织，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是，在破坏活动中不得造成人员伤亡。曼德拉利用这一“公开演讲”的机会，再一次申明这一点。

关于非国大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曼德拉反驳了政府的指控，即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有共同的宗旨和目的。他指出，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合作。非国大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是《自由宪章》，它并非一张社会主义的蓝图。在经济上，宪章提出的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主张；而不是共产党倡导的土地国有化。在政治上，非国大的主要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实现非洲人的团结并赢得充分的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代之以工人阶级的政府，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建立国家。曼德拉还特别说明了这样一点：“共产党试图强调阶级差别，而非洲人国民大会试图协调它们。这是二者的重要区别。”

为了说明非国大尽管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不同，但却并不影响二者的合作这个事实，曼德拉还旁证博引，举了二战中英美苏合作的例子。“英国、美国与苏联合作抗击希特勒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证。除希特勒之外，没有人敢说这种合作把丘吉尔和罗斯福变成了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力图带来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这个例子举得再恰当不过了，这是国际范围内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事例。那么，在一国之内有没有这种情况呢？他紧接着讲到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共产党人与本民族同胞共同推翻殖民统治，赢得自由的事实，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建立共产党的政权。

国外的情况介绍完了，曼德拉话锋一转，又把人们的视线拉回了国内。“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起进餐，一起交谈，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他们是唯一准备与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

他接着指出：

我们不仅仅在国内政治当中把共产党人看作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领域共产党国家一向给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共产主义阵营一直支持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常常比西方国家更同情我们的处境。虽然全世界一致谴责种族隔离，但是共产主义阵营比绝大部分白人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更响亮。

我现在谈谈我本人的立场。我已经否认我是共产党，既然如此，我想我不得不具体阐明我的政治信仰。

我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非洲人爱国主义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这样。像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都认为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使我们的人民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摆脱历史遗留的极端贫困的

状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曼德拉侃侃而谈，时而抬头望着在场的法官和听众，时而扶一下眼镜，低头看一眼供述稿。法庭里安静极了，给人的感觉是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声音。

4 个多小时过去了，曼德拉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结束了他的长篇声明：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与白人统治进行了斗争，也反对黑人统治。我珍视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法庭一片寂静，接着从旁听席上传来了叹息和抽泣声。曼德拉最后的一句话，使在场的许多人感到眼前一片黑暗，因为“对他的人民来说，曼德拉就是一切”西苏鲁的夫人是这样说的。

第二号被告西苏鲁继曼德拉之后出庭答辩。他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了，如今他似乎忘了自己是一名被告，好像又站到了集会的演讲台上。他的讲话铿锵、坦荡，向当局发出了质问和挑战。

里沃尼亚审判不仅在国内引起震动，在国际上也产生反响。1964 年 6 月 9 日，在最终宣判的前 3 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南非当局停止审判，释放被告。美国虽然当时投了弃权票，但事后私下里暗示南非政府不要把问题搞大。

国内黑人的反抗斗争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南非政府在最后如何处置黑人领袖的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1964年6月12日，是法庭最后宣判的日子。就在前一天，法庭已认定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犯有被指控的全部4项罪行，被告中只有一人被宣告无罪。因此，他们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曼德拉明确表示，如果判死刑，他将不上诉。在死神阴影的笼罩下，被告们显得十分镇静。

得到消息的人们不顾一切地从各地赶来，他们一大早就等候在法庭外面，许多人在开庭前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到处是警察，为了预防不测，在通往法庭的主要干道上，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拉出了40英里长。人们似乎对全副武装的警察视而不见，更多的人向正义宫涌来。人群中打出了一幅幅标语牌：“支持我们的领导人！”“不要眼泪——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宣判的时间到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法官宣读判决书：被告所犯罪行实属重大叛国罪，但是政府决定不以这种形式进行指控，因此，对本案所有被告将免去极刑，而判以终身监禁。法官话音刚落，辩护律师们纷纷上前与费舍尔默默握手，他为拯救这些黑人领袖的生命又一次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黑人解放事业的有功之臣！

曼德拉在走过听众席的时候，竖起了大拇指，向人们致以非国大的敬礼。

温妮带着两个女儿等候在法庭外面，她想最后看丈夫一眼，可是人太多了，她带着孩子简直无法挤上前去。当曼德拉等被押上囚车时，人群中的呼喊声响成一片：“权力！属于人民！”温妮强忍与丈夫离别的痛苦，站在台阶上，脸上浮现着微笑，向丈夫挥手告别。她觉得，此时自己的一举一动都

要显示出内在的勇气和力量，决不能让那些把丈夫送进牢狱的人看笑话。然而，当她晚上回到家中，安顿孩子们睡下以后，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失声痛哭起来。

各国记者对里沃尼亚审判纷纷作了报道。这样令人心灵震撼的事件，这样令人感动的场面，许多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是这样评论的：“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被判有罪的人，是英雄和自由战士，他们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泰晤士报》预言：“历史将作出判决，最终的罪人是南非当权的政府——这也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拉巴、莫索莱迪、姆兰盖尼、卡特拉达被送往罗本岛，他们要准备在南非最残酷和恶劣的监狱中度过一生。被告中唯一的白人丹尼斯·格德伯格被送往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这是南非黑人斗争史上令人永远难忘的一页。

● 高天滚滚寒流急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们锒铛入狱，幸存的领导成员被迫转移国外。在地下组织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民族之矛”的武装斗争方针，也由进行破坏活动转为准备长期的游击战争。泛非大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与非国大是一样的。曼德拉等人被送往罗本岛的时候，泛非大主席索布克韦已经先他们一步在那里等候他们了，从1963年到1969年，他在罗本岛被囚禁了6年。大批的“波戈”战士于1963年被捕后，也先后转送到这里。在这种形势下，泛非大的领导机构和主要力量也被

迫转移到国外，以积蓄力量，为今后的游击战争做准备。

一时间，“万马齐喑究可哀”，黑人有组织的斗争和反抗几乎见不到了，黑人解放运动进入低潮时期。南非当局进一步强化立法，全面禁止黑人的行动自由。政府禁令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禁止参加集会，禁止出入港口、机场、报馆，禁止离开司法部长勒令其居住的地区，禁止写文章发表。一旦有人被施以禁令，便不得再担任公职，而且从晚6点到早6点不得走出家门，等等，不一而是。

1963年5月1日，南非议会通过了不经审讯就可以对嫌疑犯拘留90天的条例，以后又延长为180天。这样，任何人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就可能被逮捕，因为只要警方说怀疑他有违反意图，就可任意将其拘留。在拘留、关押中，体罚、拷打成为家常便饭，拘留的对象也从成年人扩展到青少年。

南非国内的恐怖统治，搞得人心惶惶，人们不敢高谈阔论，不敢组织聚会，不敢随意四处走动。种族主义的法律无孔不入地制约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警察挥舞着警棍，开口闭口地叫嚷：“你触犯了法律！”而当局、警方对黑人群体的种族主义管制和镇压，则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现代化手段也日益广泛地被用于维护种族主义统治、镇压黑人运动之中。为了严密监视黑人城镇的每一角落，以及黑人群体的一举一动，并且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调集有效的镇压力量，当局以最先进的通讯系统将全国各地的警察力量联结起来，对讲机、步话机、监视器一应俱全。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出击，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反抗力量一网打尽。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在黑人运动陷入

困境，斗争走入低潮的时候，黑人的青年一代在逆境中成长起来了。

为了贯彻隔离政策，建立独立的“黑人家园”，当局开始注意培训一批黑人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于60年代初，办起了三所黑人大学，一所有色人大学、一所印度人大学。到60年代末，在校的黑人大学生达到9000人左右。

这批黑人学生是在残酷的种族压迫环境下长大的，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父辈为反抗种族压迫，抛头颅、洒热血。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丢掉了职业，被打入狱中。还有更多的黑人在贫困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这些青年学生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思想灌输就是白人尊贵，黑人低贱，与生俱来的肤色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无论是有教养的，还是没有教养的；无论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有文化的；也不管所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只要肤色是黑的，就永远被人视为最野蛮，最愚笨的人。一名黑人，即使一生苦苦奋斗，进入中层社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但他也必须按白人的法律办事，循规蹈矩；必须看白人的脸色行事，不得冒犯。“白人至上”是要求黑人必须遵守的信条，否则，他将寸步难行，甚至丢掉已经拥有的一切，使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触犯法律”的帽子在黑人头上高悬，“违反法令”的棍子在黑人眼前晃动，谁要想以身试法，越雷池一步，等待他的将是拘捕关押、判刑坐牢。

多年的文化教育没有能够奴化黑人青年，反而形成了他们政治上的敏感性；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生活环境，没能把他们培养为“顺民”，反而使他们有了更强烈的民族意识，更富有战斗性。

1969年，南非黑人大学生建立了“南非学生组织”，并在

1970年初举起了“黑人觉醒运动”的战旗。黑人觉醒运动最初是在黑人青年学生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潮，是以他们为代表的黑人文化复兴运动，以后逐渐在黑人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形成新的黑人运动的高潮，从而结束了60年代出现的黑人运动低落的局面，使黑人斗争重新高涨。

“南非学生组织”是黑人觉醒运动的核心，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是著名的黑人青年领袖斯蒂夫·比科，人们把他看作黑人觉醒运动的创始人。

比科是在南非种族主义制度下长大的青年。沙佩维尔大屠杀时，他还是个年仅13岁的孩子，他的哥哥于3年后被当局逮捕，理由是他哥哥是“波戈”组织成员。他因此而受到牵连，被赶出学校的大门。后来，他终于考入了纳塔尔大学医学院。虽然，他所学专业是医学，但是他却一心想从政治上拯救南非黑人，他才华横溢，思维敏锐，又极富鼓动性，因而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了黑人学生运动之中。

在比科看来，黑人解放首先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锁，实现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彻底解放。他认为黑人生来并不低贱，除了肤色的差别以外，与白人没有什么不同。黑人本来应当与白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但他们受到白人当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的歧视，所有应当属于他们的权利，都被白人政府人为地剥夺了。他号召黑人自尊、自信、自立，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自觉地抵制和反对一切强加于他们的种族歧视观念。比科走出校门，深入到黑人群众之中，广泛宣传他的主张，提出“以黑色为骄傲”，“黑色最美丽”。

黑人觉醒运动者持有一种崭新的观点，他们认为“黑人”这一概念应当包括有色人和印度人在内，他们都是“非

欧洲人”，同属被压迫民族，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反对白人统治。这一观点对于增强黑人的政治斗争力量，促进被压迫者更广泛的合作与联合，起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黑人觉醒运动者反对所有同情黑人的白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且不愿用“南非”一词来称谓自己的国家，他们觉得那是白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像泛非大，愿意把自己的国家称为“阿扎尼亚”。

黑人觉醒思潮迅速发展，很快在社会上成立了一系列以这一思潮为指导的组织，其中“黑人大会”就是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在动员、组织黑人继续反抗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国大、泛非大两大黑人组织早已被当局取缔，其领袖人物大多被投入监狱，其秘密组织机构也都转移到国外去争取援助、积蓄和培训武装力量了。南非国内的白人政府一时间的确有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他们认为从此南非局势更加稳定，白人政权更加牢固了。孰料想，就在他们认为可以轻松一下，歇口气的时候，比科领导下的黑人觉醒运动又呼啦啦地兴起了。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起初，南非政府并没有把“南非学生组织”放在眼里，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帮毛头小伙搞些有黑人特点的活动罢了，再说黑人学生单独建立自己的组织，以有别于白人学生会，与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并不相悖。70年代，随着运动的发展，当局逐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972年，黑人觉醒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他情绪激昂，措辞激烈，使白人当局嗅到了强烈的火药味，结果学校只得将他逐出校门。这件事，在黑人校园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学生们采取罢课行动，他们强烈反对班图教

育法，对种族制度发起了攻击。

黑人青年们积极支持黑人工人的罢工斗争。黑人工人开始罢工时，他们给予声援；警察镇压、逮捕罢工工人时，他们举行抗议集会。

1974年，葡萄牙发生政变，推翻了卡埃塔诺政府——一个在非洲地区顽固推行殖民统治的政府，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先后获得独立。消息传来，南非黑人无比振奋，人们自发地走上街头，狂欢庆祝。“南非学生组织”和“黑人大会”于1974年9月25日组织了大规模的黑人游行活动，庆祝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胜利，同时号召举行全国范围的群众庆祝集会。警察又一次出动了，他们逮捕了“南非学生组织”和“黑人大会”的部分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审讯。对警方来讲，他们只不过又把当年对付非国大领袖的那手拿了出来；对黑人群众而言，都感到黑人斗争又有了领头人，在黑人运动经过一段沉寂之后，黑人觉醒运动又使广大黑人看到了希望。

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学生暴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索韦托是南非最大的黑人城镇，黑人人口大约在100万左右，其中有半数人口的年龄在20岁以下。这些学龄青少年由于生活所迫，很少有人能够完成中学学业，他们对现有的生活环境和教育制度十分不满。黑人觉醒思潮在这里有着广阔的发展土壤。当南非政府实行强制奴化教育，规定黑人中小學生必须有一半课程用阿非里卡语授课时，学生们的怒火便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们有组织地走上街头，面对警察的枪弹，他们毫不畏惧，用自己年轻幼小的生命谱写了一曲黑人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的赞歌！

索韦托学生暴动虽然被镇压了，但它很快发展为全南非

青年学生与南非当局的全面对抗。他们反对种族主义教育制度，反对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不平等待遇，反对一切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对待青年学生运动，当局也毫不手软，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也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况且黑人觉醒运动已日益呈现燎原之势。

青年黑人领袖比科自然成为南非当局迫害的重点人物，他不断地遭到指控和监禁。1977年，他三次被关押，最后一次是8月18日被捕的，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能够出来。9月12日，比科在受尽刑罚之后，惨死狱中。人们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被折磨、拷打后的伤痕，他的脑骨多处破碎。政府监狱中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在黑人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全国的黑人学校举行罢课，以示抗议。9月25日，是为比科举行葬礼的日子。有2万多人冲破警察的重重封锁，赶来参加葬礼。比科是为黑人的解放事业而死的，他是南非黑人优秀的儿子，南非黑人为他的去世而深感悲痛。参加葬礼的黑人青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与警方发生冲突，混乱中打死了两名警察。著名的黑人主教图图在这种群情激奋的局面下，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要求政府面对现实，人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他说，像比科这样最没有种族偏见、最平和的黑人青年都被迫害致死，今后就更无人相信南非还会实现和平变革。图图主教的一番话代表了广大黑人的心声。的确，从南非的社会现实来看，谁还能对白人政府寄予丝毫希望呢？

为了消除隐患，当局又一次采取了1960年对付非国大和泛非大的办法。1977年10月19日，当局宣布取缔“南非学生组织”、“黑人大会”、“黑人家长协会”、“南非学生运动”等

十多个黑人觉醒运动中的活跃组织，许多黑人青年领袖遭到逮捕，上述组织的大批成员被迫逃往国外，这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出路。据南非警方的估计，大约有 4000 名青年越境出国。他们到国外开始接受军事训练，盼望着有一天能够以暴力打垮南非政府的武装力量，赢回黑人的尊严和地位。在这 4000 人当中，后来大约有 3/4 的人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另外 1/4 的人加入到了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队伍之中。这两家最早的黑人解放组织吸收了新鲜血液，组织力量进一步增强。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非国大流亡组织基本上形成了健全的机构，并从苏联方面得到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于是，他们的破坏活动又开始出现在南非国内，而且日渐频繁。据统计，1977 年非国大的破坏活动为 11 起，1978 年增加到 15 起，以后逐年增多。1981 年 1 月至 10 月，仅城市地区就出现了 40 起破坏事件。非国大的破坏活动仍以政府的经济设施为主要打击目标。1982 年底，其武装力量一举炸毁了库依伯格核电站，使政府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政治上也十分狼狈。为了寻找对策，加大打击黑人武装破坏活动的力度，当局还专门成立了“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以配合警方破获案件。

与非国大相比，泛非大的情况不太乐观。主席索布克韦 60 年代一直被囚禁在罗本岛，1969 年南非政府为了平息世界舆论的指责，故作姿态把他放了出来，转送到离他的家乡约翰内斯堡 300 英里的金伯利，实际将他软禁起来。他每天的行动都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每天在户外活动的的时间不得超过 12 个小时。他以前是一位大学讲师，即使在狱中，他都没有丢掉学习的习惯，而出狱后却被禁止出入任何大学和其他教育机关的大门。此外，当局还禁止他发表任何文章和作品、禁止参加各种集会、禁止和政府所开列的名单上的人们

通信。1970年，美国一所大学聘请他去任教，但南非政府断然拒绝了他的出国请求。显然，失去了人身自由的索布克韦是无法继续领导泛非大的组织工作了。

在这种情况下，勒巴洛开始行使领导职权。他组织流亡在外的泛非大成员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准备，当局闻到风声后，要求英国政府在南非境外给予协助。1963年4月的一天，英国警察袭击了设在马塞卢的泛非大总部，逮捕了13名成员，搜走了全部文件。勒巴洛有幸逃走。南非政府根据英方查抄的文件，在国内实行了一次大规模逮捕行动，有成千上万名黑人遭到逮捕。勒巴洛则先后来到了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地，这时，泛非大领导内部发生内讧，他们出于各种目的和原因，相互攻击和倾轧，勒巴洛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指责。流亡伦敦的泛非大成员在一位前泛非大地区主席马修·恩夸纳的领导下，甚至展开了反勒巴洛的活动。这使得已经处在困难条件的泛非大组织又从内部受到了削弱。

勒巴洛一贯强调暴力斗争对于实现南非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他称赞中国和古巴的革命经验，也称颂越南是一“光辉范例”。但是他承认自己的观点与上述国家革命斗争的领导人的有所不同，他主张既在农村，也在城市进行武装斗争；革命需要城市黑人与农村的黑人配合行动，在城市里开辟第二条革命战线。他还运用毛泽东关于分清敌我友的斗争策略，主张对一切反对南非白人政权的人敞开合作的大门，包括“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同我们的人民的愿望完全一致”的白人。此外，他还主张进行“自力更生”的武装斗争，反对某些泛非大领导人呼吁联合国制裁南非的做法，他说，革命者必须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且，“联合国正在被美国利用为其对外政策的工具，以镇压或削弱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因此，当我

们致力于反帝的革命斗争事业时，我们不能对希望联合国干涉的要求表示支持”。

在斗争的方针、策略上所持观点的不同，也成为导致内部分裂的原因之一。

直到1980年，泛非大的创始人之一约翰·波凯拉从罗本岛监狱刑满获释后，于1981年担任了流亡组织主席，泛非大的工作才出现起色。在他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步入正轨，内讧也随之结束。1985年，波凯拉去世后，约翰逊·姆兰博不但接任了他的职务，而且将已经出现的良好工作局面也保持下来。姆兰博也曾长期被囚禁在罗本岛，在群众中同样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领导下的泛非大又重新在国内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在国外接受过特殊军事训练的泛非大成员，神出鬼没地活动在南非各地，使当局的保安警察经常遭到难以预料的袭击。

泛非大的破坏行动与非国大的行动遥相呼应，破坏事件接连发生，此伏彼起。黑人群众亲切地感到，老的民族解放组织又回到了他们身边。

第 五 章

行将就木的种族主义

● 无力回天的博塔政府

经过 60 年代的沉寂，70 年代的觉醒，进入 80 年代的时候，黑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黑人的反抗与白人当局的镇压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形势逐渐向有利于黑人斗争的方面转变。

随着南非经济的发展，黑人工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白人在数量上的劣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种族歧视政策下的职业保留制度越来越成为南非经济发展的障碍。白人资本家只好以高薪待遇吸引其他企业的白人技术工人，结果形成了互挖墙角，竞相抬价的恶性循环。他们叫苦连天，一面呼吁政府放松对黑人工人的种种限制，一面悄悄违反规定，招募有一定专业技术知识的黑人上岗，填充原属于白人的职位空缺。黑人技术工人的数量在 70 年代里出现了明显增长的势头，这无疑增加了黑人工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分量，以及在南非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

黑人工人为了改善待遇，举行了一次次的罢工斗争。资方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改变了以往完全靠武力镇压的做法，硬着头皮与工人代表举行

谈判。随着资本家对黑人工人依赖性的增强，工人与资方讨价还价的砝码也在加重。

1979 年南非政府通过了《工业调停法修正案》，取消了 20 年代的法案中关于黑人工人不得组织工会的规定，以及第 77 条中有关职业保留的全部规定。从此，黑人工人获得了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对黑人工人而言，这是一大胜利，是对种族歧视政策一大冲击。黑人工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出现了更加有利于黑人罢工斗争的有利形势。据统计，加入工会组织的黑人工人 1979 年大约为 80 万人，1984 年便迅速增加到了 140 万人。工人们团结在工会周围，统一行动，统一步调。在罢工斗争中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黑人团结的力量，因为他们的的确确尝到罢工斗争取胜的甜头。

继各企业工会、行业部门工会成立之后，跨行业的黑人工会、同行业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也出现了。起初，政府规定黑人成立工会必须向官方登记，否则不予承认，但是形势的发展是官方所无法控制的。越来越多的工会成立后，白人资本家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不管其是否已经登记注册，便表示承认其合法存在，使得政府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当局对此无可奈何。

到 80 年代中期，在黑人工会运动的发展中先后建成了两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南非工会大会”和“工会全国委员会”。南非工会大会到 1987 年，已经发展会员上百万人，并于 1990 年与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结成联盟。工会全国委员会是仅次于南非工会大会的全国第二大工会组织，它在成立后的第二年，便与泛非大建立了联系，并与之结盟。

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在黑人青年学生、妇女、宗教人士、城镇居民中，也酝酿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联

合阵线。1983年6月，拥护黑人觉醒运动主张的200多个黑人组织，联合成立了“全国论坛”，它提出的口号是“反对种族主义”，它们奉行的原则是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不与压迫者合作；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反对与一切统治阶级的政党结盟。8月份，一个更大规模的组织——“联合民主阵线”成立了，它是由赞成《自由宪章》的570多家组织联合组成的，其中除了黑人组织外，还吸收了有色人组织、印度人组织，以及一部分白人民主人士加入。联合民主阵线强调“非种族主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所有、这里和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求所有的权利、我们在这里就要、我们现在就要！

全国论坛和联合民主阵线的出现，标志着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由过去分散的、局部的斗争，发展为联合的、全国性的斗争；由单纯黑人的斗争发展为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斗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黑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水平和质量，增强了对白人政权的打击力度。

联合民主阵线成立后，把打击的主要目标放在了“三院制议会”上。

1978年，南非博塔政府上台。两年后，津巴布韦人民推翻白人政权，获得独立，南非一下子成了保留种族主义制度的孤岛。博塔政府如坐针毡，惊呼南非已处在“共产主义的全面进攻”之中。在坐立不安当中，他们要想出“良策”，以巩固白人政权。为缓和种族矛盾，也减少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博塔政府决定在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前提下，实行有限改革。

1983年，首先实行宪法改革。南非议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破天荒地规定，把清一色的白人议会改为白人、有色人、

亚裔人 3 个议会，即所谓“三院制议会”。同时，新宪法还将总理内阁制改为总统内阁制。白人当局对此做了大量宣传，甚至张灯结彩，庆祝这一体现“种族平等”的新宪法的诞生。然而，这不过是博塔政府演出的一场闹剧。在“三院制议会”当中，有色人和亚裔人的席位极为有限，加在一起也不如白人的议席多；权力也极为有限，他们只有权参与管理本种族内部的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项事务；其他涉及国家财政、司法、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务则与有色人议会和亚裔人议会无缘。他们实际上成了一种陪衬、一种摆设、一种掩人耳目的装饰。

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来说，宪法改革把他们弃之门外，他们依然没有任何参政的权力，没有为黑人说话的场所和机会。因此，宪法改革不仅没有缓解种族矛盾，而且在黑人中引起了极大愤怒，他们不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彻底改革少数白人统治多数人的种族主义的局面。而有色人选民和亚裔人选民也不愿为白人政权所利用，他们自觉抵制选举，拒绝白人当局给他们的一点点政治施舍。

联合民主阵线所奉行的路线是：把反对白人专制政权的各个种族的人民联合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强烈的反抗斗争的风暴。

在种族矛盾不断加剧的强大压力下，博塔政府力图巩固阵地，站稳脚跟，把汹涌澎湃的黑人怒潮平息下去。

于是，继宪法改革之后，政府又鼓足了勇气，忍痛牺牲了一些白人种族主义利益。比如，在某些公共场所允许黑人出入，像图书馆、体育馆、剧场、餐馆等文化娱乐场所中，解除了种族隔离的规定。1985 年，是博塔政府拼命鼓吹改革的一年，这年废除了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令。在种族主义思

想根深蒂固的白人眼里，不同种族间的通婚被视为合法已是一大历史进步，在以前那是不可想象的。“保持白种人的纯洁性”不但是白人政权的需要，而且是白人居民的普遍要求。他们不愿意与黑人处在一个生活空间，不希望黑人与他们平起平坐，这种种族主义情绪不但在成年人当中保持着，而且也影响着白人青少年一代。南非电视台曾经在1986年举办过一次观众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18名观众都是20岁以下的白人青少年。他们讨论的题目是，“假如我是总统”。孩子们在讨论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种族隔离问题。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赞成实行种族隔离政策。14岁的朱迪明确赞成全面的种族隔离，他说，如果我当总统，我就给黑人开放一处海滩，其余的全部留给白人。一位16岁的孩子说，教育制度可以实行一些改革措施，但是不要太快，“我的朋友们都不愿意班上有黑人”。有的孩子对黑人简直怀有一种仇恨的心理，13岁的马尔科说，如果我当总统，就给每个白人发一支枪，让他们每人打死一名黑人，那样黑人就不会闹事了。青少年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情绪之严重程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自1948年执政以来，顽固地、坚持不懈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已使种族主义的毒水渗透到了南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今要想在某一方面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清理，即使是表面的，也决非易事。

博塔政府本想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总趋势下搞点零敲碎打的改革，以缓解压力，稳定局势，保持南非经济的发展，却也遭到了来自党内的右翼势力的攻击。他们指责博塔政府的改革背叛了阿非里卡人的民族利益，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实际上，80年代的白人社会已经出现了分化，在一

部分人死抱住“阿非里卡人的民族利益”不放的同时，另一部分经济界、企业界的人士，则更看重白人的实际经济利益，“肤色”与“金钱”相比，还是处于第二位的。他们不愿看到南非的反种族主义破坏活动吓跑外国资本，不愿意因当局的镇压政策招致国际社会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因此，他们对种族隔离制度持批评态度。

博塔政府在种族隔离制度这一问题上的心态是极为矛盾的：不改革不行——正如博塔本人所说的那样“不适应，则灭亡”；改革又很难办，迫不得已只能试探着向前迈着小步。其中滋味，博塔总统本人最为清楚。

1986年，南非政府又颁布了《恢复南非国籍法案》，同意给4个“黑人家园”中的部分黑人恢复南非国籍。“黑人家园”“独立”的闹剧刚刚演出了不到一半，就忙着收场了。

当年，《通行证法》也被迫取消。这是最令黑人憎恨的法令之一，它曾使多少黑人蒙受耻辱，被关押，被判刑。如今，它终于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对黑人来说，这一天来得太迟了，为了等到这一天，他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人们仿佛又看到了26年前曾经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看到了索布克韦大义凛然，到警察局门口自愿被捕的情景，看到了卢图利大酋长愤怒点燃通行证的那把火焰，也看到了死难者洒向土地的殷红的鲜血……

黑人们没有因为个别种族隔离法案的取消而显得过于兴奋。他们当然为斗争得来胜利成果而感到高兴，但这一切却都在情理之中。在他们看来，政府改革的步子离他们的要求相差太远，他们要求真正实现黑人的解放，取得与白人一样的权力与地位。

在内政上日益陷入困境的博塔政府，面对斗志不减的黑

人反抗浪潮，以及对政府缩手缩脚的改革早已显出不耐烦的白人上层知识界的尖锐批评，在苦无良策、万般无奈之中，想到了还关在狱中的非国大领袖曼德拉，盼望能从他那里找到一个突破口……

● 愿把牢底坐穿

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和西苏鲁等人在南非黑人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博塔政权想通过和这些重要人物的接触为自己寻找一条最佳出路，应当说是明智的选择。

20 多年前，曼德拉等人被关进罗本岛监狱，在那里一关就是 18 年。在他们入狱后的漫长岁月中，黑人斗争一度陷入低潮。但是非国大、泛非大等黑人组织依然存在，其成员在国外秘密地开展活动，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狱中的黑人领袖们也从未停止过一天的抗争，“消沉”二字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是找不到的。在他们那里能够看到的是超人的毅力，非凡的勇敢，豁达的心态，以及博大的胸怀。

罗本岛距离开普敦大约 7 英里，总面积仅 8 平方公里。这是一个荒凉的石灰岩小岛，岛上阴冷潮湿，寒风劲吹，常年笼罩在浓雾之中。小岛四周海面波涛汹涌，浪涛拍打在岸边的岩石上，形成巨大的白色浪花。这个小小的岛屿记载着南非黑人饱经沧桑的历史，自 17 世纪以来，就成为关押黑人领袖的一所政治牢狱，它同许许多多杰出黑人领袖的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长期的囚禁生活中，曼德拉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他的狱中难友们对他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他总是以乐观的态度、豁达的性格看待人生，看待自己目前的处境，看待南非黑人的未来。无论与他私下里谈话，还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从未给人以忧郁之感，从不认为自己可能活不到出狱那一天了，他始终期待着光明与自由，也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赢得光明与自由！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在狱中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一有机会就在院子里慢跑。

起初，曼德拉被定为“D”组犯人。“D”组犯人的亲属只能半年探监一次，每次30分钟；允许犯人每半年与家人通信一次，内容不得超过500字。这使温妮在最初几个月里感到“痛苦欲绝”，她觉得自己“简直像生活在地狱里”，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孤独和寂寞。曼德拉是她力量的支柱，她不能没有他！狱中的曼德拉深深了解这一点，他不但以自己那强烈的感染力去激励难友的斗志，而且通过有限的家书鼓舞妻子，给她以精神上的力量。在丈夫的影响下，温妮坚强地从孤独与寂寞中站了起来，并且积极投入了黑人妇女界的工作，以及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的运动中。

曼德拉以其铁人般的意志，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影响着他的每一位亲人、朋友、同事和难友。

罗本岛的一位难友玛哈拉吉是这样回忆的：“他的士气足以鼓舞所有同他接触的人……全体难友，不管政治信仰如何，都信任曼德拉，把他当作自己的发言人。他经常在斗争中指导我们，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进行过绝食、怠工、请愿……回想起来，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在温妮被监禁、被拘留的时候，以及在听到她惨遭拷打的时候，纳尔逊也不曾灰心丧气。他对未来的信心与

日俱增。”

另一位难友说：当局把我们关进监狱有两个目的，一是挫败我们的士气，二是让世界忘掉我们。但是他们没能达到目的。“由于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使你坚强起来”。他充满感情地补充说：“曼德拉教我如何生存。当我生病时，他会叫所有别的人照料我，他也亲自来看我。”

恩塔杜·莫特拉纳大夫曾经做过温妮的家庭医生和孩子们的监护人，当他 1976 年来到罗本岛见到曼德拉时，他感叹道：“啊，多么坚强，多么有力！除了新添的几丝银发外，他和我多年来认识的纳尔逊还是一模一样！庄重、尊严，好一副科萨人酋长的气派！精神饱满，体力旺盛。”

这就是监狱中的曼德拉给人们的印象，监狱生活没有使他那旺盛的斗志和非凡的气度有丝毫减损。还是听听温妮·曼德拉的感受吧：“到那儿去是令人振奋的，有一种像蓄电池被重新充电似的感觉。我想，那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那么多的鼓舞，那么多的勇气。他们当然会回来，回来后在一个黑人执政的南非扮演自己合法的角色。纳尔逊将成为我们的总理。”

温妮的感受是正确的，她的信念简直成了预言，谁曾想当年她在逆境中说出的这番话在 90 年代的南非竟成为现实，当年的囚犯成了今天新南非的总统！

当然，纳尔逊·曼德拉并非是神，他也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人。只是“坚强”二字让他战胜了一切。

他在罗本岛的时候，先后传来了他的大儿子和母亲去世的消息，这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他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静静地坐着。他心里疼痛、内疚，同时也更增添了对

白人当局的憎恨。作为父亲，他对儿子的关心和照顾太少了；作为儿子，他留给母亲的除了黑人的骄傲以外，还有太多太多的焦急和忧虑。他为此而内疚，但却不感到后悔。他只是因悲伤而使情绪有些低沉，所以一个人默不作声地呆了很久。然而，他的沉默引起了老朋友、老战友西苏鲁的注意，当西苏鲁得知消息后，给了他最珍贵的理解和爱护。西苏鲁像兄长一样与他促膝长谈，帮助缓解他的精神痛苦。第二天清晨，当曼德拉又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他已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状态，谁也不知道他家里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曼德拉！

长期在逆境中生活的曼德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斗争经验的增加，学会了克制自己，更懂得了斗争的策略性。难友们看到，他身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狱中生活使他对种族主义制度的仇恨与日俱增，但另一方面这种仇恨的发泄在他身上越来越不明显了。他显得更加大度、平和，无论对事、对人，更加注重客观分析，注重方式方法的实际效果。他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尽力去改变监狱对政治犯的待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南非政治犯的处境。

岛上的气候比较特殊，夏天极热，太阳照射在石灰岩上反射出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到了冬天，天气又变得很冷，阴雨连绵，寒风刺骨。而监狱里起初每人只发给两条毯子，没有床，黑人犯人只发给一条短裤，而印度人和有色人可以得到一条长裤。犯人们冷得受不了为了改善监狱的待遇，曼德拉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带领大家进行绝食、怠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还进行请愿，提出书面的和口头的要求和意见。他们甚至还派出了代表团去面见南非司法部长，反映监狱犯人的非人生活。

斗争的结果，监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有一些变化。毯子一条一条地增加，最后每人连铺带盖一共得到了5条。冬天，黑人政治犯也都发给了长裤，并且允许他们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穿都可以。1973年到1974年的时候，曼德拉由于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监狱还发给了他一张床，以免地上过于潮湿。以前牢房里没有桌子、椅子，吃饭、写信都很不方便，经过多次与狱方交涉，先是每人发给了一张2英尺宽，2.6英尺长的小桌，犯人可以站在桌边做事情，以后又增加了一条长凳。

犯人们每天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要打石头、捞海藻。在石灰矿坑，他们用镐和铁锹刨挖石灰石，然后把挖出的石灰石装上卡车运走。他们在看守的逼迫下不停地挖采、装车，干得浑身酸痛，手上和脚上都是血泡，满头满身沾着石灰粉末。有时，他们被带出去捞海藻，不管天气多冷，即使刮风下雨，也必须出工。在曼德拉的带领下，犯人们提出抗议，甚至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狱方施加压力。结果，挖采石灰石的工作到1975年终于停止了。另外，每人还发给一件橡胶雨披，供雨天干活时穿用。1973年以前，监狱里淋浴洗漱都是凉水，从不供应热水，在不断地抗议中，犯人们终于在下工后能够洗上一个热水澡了。1973年的一天，狱方还出人意料地把政治犯们召集起来，发给每人两件背心和两条运动裤。这在监狱里是破天荒的，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其意。几个星期后，红十字会的人来罗本岛参观考察监狱，其中的道理便不言而喻了。

曼德拉在狱中一直是难友们的代言人。他待人慈祥、温和、幽默，从不向别人倾诉个人的困难和不满。但是一旦狱方无理对待狱中难友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话，而

不考虑他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有时给监狱总长写信，要求他过问监狱的情况，听一听政治犯的呼声，搞得监狱总长挺狼狈，不得不做出一些表示。

渐渐地，他们还获得了狱方这样的默许：犯人可以在牢房里与狱友交谈，直到晚上8点为止。这在过去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们被判单独监禁，彼此交谈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惩罚。

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学习的权利和听音乐、看电影的权利。他们被允许学习英语、阿非里卡语、祖鲁语、科萨语、数学、生物、地理、物理理论等课程，而其它许多课程，如历史、法学、速记、德语、法语等都在禁止之列。曼德拉本想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入狱之前他已经登记注册了。但是这个计划由于狱方的阻挠没法实现。于是，他又学习阿非里卡语。这本是一门被黑人憎恶的语言，提起阿非里卡语就会使人们想起索韦托暴动中在警察的枪林弹雨中倒下的孩子们。然而，出于斗争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望，曼德拉认真刻苦地学习起这门语言来。入狱前，他不会说、读、写阿非里卡语，自学的结果，居然达到了大学水平。人们难以想象出，作为黑人领袖，作为阿非里卡人的监狱中的一名囚犯，他是以怎样的平和心情和宽广的胸襟来进行学习的。多少年以后，当曼德拉走出监狱，重获自由，作为黑人领袖出席重大集会时，他居然在讲话中用上了阿非里卡语，这对促进南非民主进程，提高曼德拉在白人中的威望，发生了微妙的积极作用。

黑人觉醒运动兴起后，不少黑人青年被投入监狱，他们也被送到了罗本岛。曼德拉充分抓住斗争得来的学习机会，鼓励帮助青年继续学业，使许多人在狱中通过函授取得

学位。

就这样，曼德拉成为团结和鼓舞狱中难友的核心，他的巨大的感染力甚至影响到下级警官和看守。对此，他的一位难友是这样说的：

在他与监狱官员的关系上，不论是出于有意或出于本能，纳尔逊对高级官员和下级官员总是区别对待。对那些知道他们立场的下级官员，曼德拉总是如父亲般慈爱。很多年轻看守对他很友好，时不时就他们的职业和社会问题听听他的忠告。一些看守向曼德拉带来他们父母的问候，说他们也非常想见到他，还羡慕他们的儿子能有机会认识这位狱中伟人。

曼德拉对待那些中级官员则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那些人“在等级森严的阶梯上受向上攀爬野心的激励，往往表现得比高级官员还要高级。每当他们装出这种一本正经的模样时，马蒂巴（在罗本岛难友们对曼德拉的称呼）总会揶揄地说：‘你瞧，你是一个下级，你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要见你的上司……’”

对于高级官员，他从不客气，对他们往往提出各种尖锐问题，要他们给予答复。“你们为什么压迫我们？”“我们要求政治地位，我们要求从狱中获释！”他常常使这些官员感到无言以对，陷入难堪的境地。不过，曼德拉从来都是以理服人，据理力争，而不是凭感情用事，更不会采取粗暴的态度。有一次，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来罗本岛视察，曼德拉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间提到非国大的方针、政策以及犯人提出的要求。没想到与这位司法部长的谈话简直要把曼德拉气

晕了。他回来后对难友说，这位部长大人对非国大的历史和政策一无所知他根本无法就非国大的《自由宪章》与他进行讨论和争辩，因为身居要职的克鲁格从未读过那份文件，可竟然还振振有词地谴责说那是一份共产主义者的文件。曼德拉为司法部长的愚昧无知而感到愤慨，但是多年的磨练早已使他学会了克制自己，他既没有讽刺挖苦部长大人，更没有激动地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他心里清楚，那些都无济于事，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对方恼羞成怒，不利于今后对问题的沟通。因此，他压制住心中的强烈不满，只是很有涵养和风度地要求克鲁格回去后研究一下非国大的历史和《自由宪章》。

看来，克鲁格的确被曼德拉说服了，他回去后真的翻阅了那些“被禁阅的文件”，并且因此而被野心勃勃的属下告发，丢掉了官职。

不过，在狱中人们也见过曼德拉大发雷霆的样子，尽管这种情况极少。那一次是因为监狱中的普林斯中尉对他的妻子出言不逊造成的。当时，温妮正在申请来岛探视，但是这位中尉却说温妮来岛的目的是想借此出名，真是岂有此理！曼德拉入狱后，温妮也因他而吃尽了苦头，她受到监视，遭到搜查、逮捕，被判刑、流放。曼德拉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虽然我总是尽力摆出一副勇敢的面孔，可是我实在不能适应你被关进监狱的事实。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像这种特殊的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温妮，是他心中的希望，是他内心深处不容任何人践踏的一块净土，是他深藏的一份爱！他多么盼望早日见到久别的妻子，他知道温妮和他有着一样的心情。然而，眼前这位自命不凡的小人居然说温妮是为出名才来看他！他感到最亲爱的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怒不可遏，一

反常态地大声怒斥普林斯中尉，并向他使劲挥舞着他那经过拳击训练的铁拳。当他快步走出那间办公室时，他使足了力气，“砰”地一声摔上了大门。直到他回到牢房后，还气得直喘气。

尽管人们都认为曼德拉很了不起，包括许多白人都对他怀有敬畏的心情，但是他本人对此却很清醒、冷静。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天才，甚至不承认自己是黑人运动中出类拔萃的领袖。他觉得，今天的曼德拉是时代所造就的，是南非特有的形势造就的，是非国大前进历程中的产物。

● “释放曼德拉”

历史跨入 80 年代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南非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呼声越来越高。

1980 年 3 月 23 日，在索韦托的一所天主教堂里，5000 名群众举行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 20 周年。集会上，群众呼吁当局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图图大主教代表南非教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在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起草的请愿书上签了字。接着，包括温妮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一场由报社首先发起的“释放曼德拉”的运动开始了。

黑人社区的领导人提出：释放所有在押的黑人政治犯，准许流亡人员回国，取消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其他黑人组织的禁令，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星期日邮报》不久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曼德拉的女儿津荠的文章：《给我父亲自由》，同时刊登了津荠和她的外

甥女以及母亲温妮振臂呼喊“权力”的照片。

“释放曼德拉”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它像熊熊燃烧之烈火，又一次把黑人运动推向高潮。国际上马上作出反应，1980年6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敦促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

1982年4月的一天，曼德拉、西苏鲁和另外3名里沃尼亚案的政治犯，接到狱方通知，立即收拾行李，离开罗本岛。没有讲明是什么原因，他们就被匆忙地送上了车。就这样，他们离开了这座关押了他们整整18年的小岛。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间牢房，熟悉这里的阴雨、阳光、浪涛、海声，还有遍地的石灰石。他们在这里共同度过了18年的铁窗生涯，留下了他们的辛酸、痛楚、愤怒，留下了汗水、脚印、歌声，留下了他们最美好的年华。进去时，曼德拉还是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离开时，已是年逾花甲，岁月在他的额头、面颊上留下了道道刻痕。如果细算起来，曼德拉在罗本岛的时间比别人还要长一些，因为早在里沃尼亚案审判之前，他就因煽动罪和非法出境罪“光顾”过这里了。

如今，他们终于离开了这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地方，但是，并非获得自由，他们被转送到了开普敦附近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他们仍然被锁进了单人牢房，与他人隔离，与世界隔绝。

然而，南非人民没有忘记他们。1983年“联合民主阵线”成立后，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更高了。曼德拉向成立大会捎去了口信，受到了与会上万名代表的山呼海啸般地热烈欢呼。

慑于国内的压力和仍在与日俱增的曼德拉的影响，当局做出了某些姿态上的调整。1984年5月12日，当温妮和以往一样，带着女儿、外孙女去波尔斯摩尔监狱探视时，一进去

就被格雷戈里警官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温妮起初有些疑惑，甚至有些紧张，她想是不是丈夫生病了？格雷戈里警官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她，对她说，从今以后你们探视时可以在一起了。温妮为此激动不已。多少年了，每次探视都是隔着厚厚的玻璃，拿着传话筒讲话，连对方的面容都看不太清楚，离别时，他们只能隔着玻璃吻别。她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了探视室。经过空间上 22 年的隔离之后，他们重新聚在了一起，祖孙三代人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时间地亲吻着自己的亲人。

这是催人泪下的一幕，令人心颤的一幕，也是 22 年来最令曼德拉一家人难忘的一天。

1985 年，博塔政府在采取了一些所谓改革动作之后，又作出了新的表示。1 月 31 日，博塔总统在南非议会上宣布，政府可以考虑释放曼德拉，但是条件是：“曼德拉先生作出保证，以后不再为了政治目的而策划、鼓动或从事暴力活动。因此，现在不是由南非政府来决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抉择。现在要求他的是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2 月 8 日，温妮在女儿和家庭律师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了波尔斯摩尔监狱，她要带回曼德拉给博塔总统的答复。

2 月 10 日，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在索韦托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温妮不顾当局的禁令，也出席了大会，她委托女儿津荠代表曼德拉及其被关押的政治犯表达了对联合民主阵线的问候，以及对图图大主教的热情祝贺。津荠借此庄严的时刻，发表了一份声明，那是父亲在狱中口授的声明——《告南非人民书》，津荠说道：

我的父亲及他的战友们希望首先对你们——广大人民发表他的声明，同时他们十分明白，他们有义务对你们说明，而且他们只有对人民说明的义务。

我父亲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战友们讲话，并且他希望代表所有因反抗种族隔离而被监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苦受难、代表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代表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人讲话。

接下去，津莽宣读了《告南非人民书》：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过去是并且仍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直到我离开人世为止。奥利弗·坦博对我来说简直比兄弟还亲，他是我近50年来的挚友和战友。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珍惜我的自由的话，奥利弗·坦博比你们更加珍视。我知道，为了我获得自由，他宁肯献出生命，我同他之间观点完全一致。

谁都热爱自由，谁都珍视自由，曼德拉也不例外。但是，这种自由必须是真正的自由，必须是无条件的自由。曼德拉接着以更加直截了当的语言回答了博塔提出的问题。

对政府强加给我的条件我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凶暴的人，我的同事们和我在1952年写信给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去寻求我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并未理睬。斯揣敦当政时，我们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再次被置之不理。维沃尔德执政时，我们要求召开代表南非全体人民的国民大会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

徒劳。

只有在所有其他反抗方式都行不通之后，我们才转向武装斗争。为的是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说他将取消种族隔离；让他使人民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合法化；让他给所有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和被迫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便使人民能够决定谁来管理他们。

我非常珍视自己的自由，但是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从我坐牢以来，死去的人太多了，因为热爱自由而遭受苦难的人也太多了。我向那些为他们哀悼和哭泣的寡妇、孤儿以及他们的父母致意。在那漫长的、孤寂的和白白流失的岁月里，我不是唯一的受难者。我不比你们任何人缺少对生活的爱，但是我不能出卖我生来就有的权利，也不准备出卖人民获得自由的权利。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而坐牢的。

紧接着，曼德拉在声明中对博塔所说的自由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没有合法地位时，给我的能是什么自由？在我随时可能因为违反通行证法而被捕时，给我的能是什么样的自由？当我亲爱的妻子仍被放逐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能得到什么自由？在必须得到批准才能在城镇地区居住的情况下，我能有什么自由？在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的情况

下，我能得到的是什么自由？在我的南非公民身份不被尊重的情况下，我能得到的又是什么自由？

最后，曼德拉以斩钉截铁的语言结束了他的声明：

只有自由人才能谈判，囚犯不能签订契约。在我和人民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作出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不可分的，我将回到你们中间。

所有在场的群众为曼德拉的声明而欢呼雀跃。他们信任曼德拉，崇敬曼德拉，曼德拉不愧为他们的领袖。温妮亲眼目睹了人们激动不已的情景，曼德拉的声明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温妮为丈夫而感到骄傲。

被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和罗本岛监狱的所有里沃尼亚案的政治犯，一致拒绝了博塔的释放条件，他们宁愿把牢底坐穿，也决不接受任何带有屈辱条件的所谓自由。

案犯之一卡特拉达在给朋友的信中，谈了自己的想法：

似乎我们离“自由”只有一步之遥，但事实上从宣布之日起，这就是一架不能启动的车。当我说我不是英雄的材料造就时，我并不想表现那种假谦虚。的确，我没有度过任何不眠之夜便作出抉择，因为这是如此精心设计的羞辱我们的意图，除了拒绝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面对棘手的种族矛盾和南非黑人各界强硬的政治态度，博塔政府采取了软硬兼施两手策略。他一方面鼓吹改革，提

出有条件释放政治犯，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机器，以对付黑人组织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黑人暴动。

1985年3月21日，是沙佩维尔血案25周年纪念日，一些地区的黑人群众举行了悼念活动，警察又一次动用武力，枪杀黑人，激起了黑人越来越多的暴力行动。小到扔掷石块，大到纵火，搞得白人当局十分紧张，总有一种顾此失彼，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感觉。他们恼羞成怒，索性于7月20日宣布全国36个黑人城镇处于紧急状态。警察和军队被赋予特殊权力，他们可以任意逮捕、搜查、审讯、关押黑人，枪杀黑人也不受惩罚。大批的黑人被抓进监狱，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南非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但在国内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8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实行种族主义制度的政权，这与世界历史进步的潮流是相违背的，南非国内的局势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 国际社会的愤怒

南非的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对南非黑人的处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印度是第一个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国家。1946年，在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印度代表便对南非种族歧视政策进行了指责，反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南非印度人实行歧视。不久，印度政府便单独采取了与南非断绝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

的行动。

国民党上台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得到强化。联合国大会从1952年起，把种族隔离作为议题。这一年的大会上有多达十多个亚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对南非当局进行了谴责。以后，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然而，对于国际社会的反应，南非白人当局采取了抗拒的态度。他们拿出了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作为挡箭牌。这一条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南非当局强调说，种族隔离问题是南非的内政，联合国公开干涉南非内部事务，是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虽说南非也算得上联合国的一名“元老”，既是1942年签署《联合国宣言》的26个盟国之一，又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的51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是它敢于在联合国公然蔑视联大决议，决不是因为它的资格有多老，而是因为背后有关键性的大国在撑腰。

由于南非地处大西洋和印度洋交界之处，扼守着东西方交通要道，因此在有着称霸全球计划的大国眼里，无疑属“战略地位重要”之列。好望角航道与苏伊士运河相比，虽然航线较长，但是它终年不冻，二战期间，这条航线曾经成为在中东、北非、印度作战盟军的生命线，保证了军队军需给养的供应。当冷战之风吹遍全球的时候，南非的身价也上升了。美国对这一战略要地给予了特别重视。它想方设法笼络南非，防止苏联势力的渗入，以确保南非丰富的矿产资源通过好望角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在美国看来，中东有个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南非则是个盛产战略矿产原料的波斯

湾，因而对美国高科技工业和国防尖端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西方国家在冷战形势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南非及南部非洲离开西方阵营，那么我们不仅失去了关键的战略矿产资源，而且还意味着将失去对我们西方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在东西方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南非也懂得利用自己不低的身价，靠向西方国家。它自称是南部非洲的反共“前哨”，要求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之下，获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和支持。美国出于同苏联争夺、较量的需要，便采取了袒护，甚至支持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立场，由此保证自身的战略和资源需求。

于是，当南非在联合国受到指责的时候，美国便站在南非背后，和它唱起了一个调子：种族隔离问题是南非内政，联合国不应过问！1955年底，美国代表在联大发言时说：“我们认为必须十分注意的是大会应当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宪章有关国内管辖权限的条款。”以此为借口，想阻止国际舆论对南非白人政权的谴责。

美国的袒护政策，使得南非有恃无恐，1955年，它索性召回驻联合国的代表以示抗议。

1960年的沙佩维尔大屠杀震惊了世界。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就南非问题通过决议，要求南非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缓和种族矛盾，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不想，南非对此置之不理，非但不听，反而采用极端手段，宣布紧急状态法，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组织。

印度再次公开谴责南非暴行。由于南非属英联邦成员国，马来亚总理义愤之下，写信给英国首相，要求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上讨论南非问题。尽管英国政府想回避这一问题，和美

国唱起了类似的调子：英联邦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但是在1960年5月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大多数国家对南非白人政权的残暴行为还是给予了猛烈抨击。

1960年，正值“非洲独立年”，在非洲独立浪潮的推动下，在英联邦成员国的责讨声中，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了南非，发表了著名演讲——非洲大陆变革之风，并且表示如果南非政府不顺应潮流，阻碍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英国将不再给予支持。麦克米伦的话引起南非白人当局的不满。当年10月5日，南非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改联邦为共和国。许多亚非英联邦国家主张把南非从英联邦驱逐出去，不得已，南非于1961年3月退出英联邦，并于5月31日正式改名为南非共和国。对此，麦克米伦政府痛心不已，因为这不仅标志着英国同南非近百年历史联系的结束，而且有可能损害到英国在南非的经济贸易利益。

1962年11月6日，也就是南非法庭以煽动罢工和非法出国罪，判处曼德拉5年监禁和苦役的前一天，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成员国与南非断绝外交关系，中止贸易往来，并要求安理会对南非加以制裁。在国际上要求制裁南非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况下，南非当局依仗大国的保护伞，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地加强种族主义镇压行动。1963年7月，警方采取突然行动，将“民族之矛”的活动据点一网打尽，当场逮捕了西苏鲁等人，并开始了令世界瞩目的“里沃尼亚案”的主案审讯。在南非国内实行白色恐怖的关键时刻，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7日通过了181号决议，承认南非局势的恶化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决定对南非实行非强制性武器禁运。所谓“非强制性”，也就是武器禁运要根据各国自愿的原则进行。联合国本想通过这一决议一方面对

南非当局施加压力，另一方面限制其武器进口，使它得不到足够的武器去装备警察、军队镇压黑人群众。但是，这一决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在决议通过的前几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还板着面孔，指责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国际制裁的议案是“坏的法律和坏的政策”。美国反对制裁，而英法两国则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大国的态度把联合国181号决议的作用降到了最低程度。南非的武器进口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不过，世界各国反对南非当局实行种族主义政策的压力，使它在对“里沃尼亚案”的被告们作出判决时，成为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它毕竟不愿触犯众怒。

1965年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新的决议，谴责南非白人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要求对南非实行经济和外交的国际制裁，而美国和英法国家一起投了弃权票。由于只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把“道义”二字抛在了一边。

就在联合国一次次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同时，西方国家对南非的贸易和投资也在增长。60至70年代美国对南非的贸易增长最快，到1978年，美国已超过英国成为南非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在南非的投资从1966年到1981年增加了5倍，达到24亿美元。最令南非当局感到欣慰的是西方国家在武器供应上对它的支持。其中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合法的和非法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向南非输出了大量武器。据美国商业部出口控制办公室的统计，1963年1月1日到1971年9月30日期间，共向南非出售轻型飞机、运输机和直升机1967架，价值近2亿美元。此外，美国还默许以色列和台湾同南非进行军事技

术上的合作，结果，南非很快具备了生产尖端武器的能力，并且逐步由武器进口国，发展成了武器出口国。

由于西方大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一直反对强制性地全面制裁南非。它们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多次投票否决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的动议，使得安理会一直无法通过有关强制性全面制裁南非的决议。

1976年，南非索韦托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压，1977年，黑人青年领袖比科在狱中被迫害至死，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声援黑人反种族压迫、制裁南非白人政权的行动。非国大和泛非大的代表被邀请出席联大有关会议，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的辩论。此时，美国正值卡特政府执政时期，虽然它也实行了袒护南非白人政权的政策，但是比较而言，它一度采取了比历届政府都强硬的做法。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也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卡特政府为了维护美国在国际上已经受损的形象，也为了在国内笼络广大黑人选民，不得不考虑改变以往政府的一些做法。此外，卡特也想借此改善与非洲黑人国家的关系，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展和渗透。这样，在1977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以全票通过决议，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立即停止向南非提供军队和警察装备、弹药、零件，以及核武器生产技术。这一决议的通过，使南非黑人很受鼓舞。不过，关于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的决议，由于美英法等国的反对，则始终未能通过。就是在态度强硬的卡特政府时期，对有关进行强制性经济制裁的决议，也都持否决态度。

即使如此，南非当局也大有被西方国家抛弃之感，他们甚至称卡特对南非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是“微笑着杀人”。1978年上台的博塔政府，发出了“不适应，则灭亡”的呼号，

他调整策略，采取了镇压与改革并重的方针。对于南非 1984 年的“宪法改革”美国里根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说这是“朝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此外，里根还在他第一任期内，给予博塔政府很多精神上的和外交上的支持。他称南非是“友好国家”，“不是盟友的盟友”，还表示决不遗弃在历次战争中都站在美国一边的老朋友，弄得博塔政府惊喜之余，万分感激。

此时，远在不列颠岛的撒切尔政府，也与里根政府遥相呼应，极力阻止英联邦国家对南非采取一致的制裁行动。撒切尔夫人的外交以强硬而著称，但是在南非问题上，“强硬”二字不是用在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上，而是用在了强硬地反对制裁南非的立场上。

可见，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早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对南非制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除了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了某些制裁措施以外，西方大国基本上采取了暗中支持的做法，成为联合国制裁南非的阻力，不得已时，也会做出一些姿态，象征性地制裁一下南非。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关系走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美苏对抗时期的地区“热点”纷纷降温。苏联从非洲地区也开始收缩力量，避免新的军事卷入。于是，美国多年来所面临的苏联在南部非洲的势力扩张和渗透威胁随之消失了，南非的战略地位也因冷战的结束而大大降低。以前，南非政府一向打着“抵抗共产主义”的幌子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对外武装入侵邻国，对内加强国家机器，镇压黑人运动。他们把黑人的暴力反抗也说成是受苏联等国共产主义煽动的

结果。如今，形势变了，西方国家对南非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当南非政府于1985年7月在全国36个黑人城镇宣布紧急状态后，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变化并慑于外来的巨大压力，开始了有别于以往的行动。

美国于1985年9月对南非开始实行有限的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向南非执法机关出售计算机、禁止核技术出口以及禁止向南非提供新的贷款。当南非当局变本加厉，于1986年6月又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法时，美国国会在10月份通过了《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这一法案就美国与南非的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等往来作了严格限制，其中规定禁止进口南非的煤、铀、铁、钢、武器、弹药、军用车辆、农产品、纺织品、金币，禁止向南非出口石油产品、原油、弹药、核技术，禁止对南非进行新的投资。美国的经济制裁行动给南非当局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不小，美国一些大的公司中断了与南非的业务往来，纷纷撤出南非。

然而，事情到此还未结束，更令南非当局痛心的还在后面。1987年1月，美国政府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国外的领导人坦博进行了第一次接触，由此开始了与被取缔的南非黑人组织的对话。坦博发现，里根政府已经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点，即如果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参与，就找不到南非问题的解决办法。当年9月，国务卿舒尔茨在纽约发表讲话，要求建立一个“联合的南非新宪法秩序，规定所有的南非人均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不问其种族、语言、民族血统或宗教”；建立“一个多党参加和所有南非成年人都有普遍公民权的民主选举制度”。

在美国的带动下，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也于1986年开始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南非白人政权拉开了

距离，加入了制裁南非的行列。

英联邦国家也在 1986 年作出了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决定。尽管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死抱住反对制裁南非的立场，然而南非的种族主义压迫和统治已为世界各国所不容。在国际局势迅速缓和的形势下，南非问题更突出出来，人们对当今世界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国度感到惊诧，那里的黑人、有色人仅仅因为肤色与白人不同，便遭受了 100 多年的统治和镇压，至今仍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在监狱中，而他们被关押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要求获得民族解放和自由。

为了给自己逆潮流而动的立场找个合适的理由，撒切尔夫人坚持说，英国政府之所以反对制裁南非，正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因为黑人将是制裁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想保护那些会受到制裁伤害的黑人。然而，在南非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有 77% 的黑人支持国际社会的制裁行动。温妮·曼德拉愤怒地批评撒切尔政府的所谓理由，她说：

玛格丽特·撒切尔居然敢告诉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南非人民，我们要求制裁是错误的！这位女首相对南非的母亲们在大街上到处收拾孩子们尸体的惨景视而不见，真使我毛骨悚然。

非国大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坦博先后会见了英国、美国以及南非国内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呼吁他们对南非当局施加压力。图图大主教也奔走于美欧各国，呼吁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

一场声势浩大的制裁南非的运动展开了。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柯达影像公司、可口可乐公司、

埃克森石油公司，相继宣布退出南非。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宣布出卖它在南非巴克莱银行中 40% 的股份。根据联合国的一份统计材料，到 1988 年已有 520 家多国公司卖掉了它们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全部资产。从 1985 年至 1988 年，资本外逃 200 亿兰特，约合 91 亿美元。到 1988 年底，南非的外汇储备只剩下 19 亿美元，也就是说，它的外汇储备只够 6 周的进口费用了。

南非种族主义经济发生了危机。

第 六 章

扬起六色国旗

● 审时度势的德克勒克

1988年，曼德拉在监狱里迎来了他的70岁生日，至此，他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25个春秋。他的生日是在7月18日。在他的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地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呼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人们多么盼望这位一生受尽了苦难，身陷囹圄，却名扬四海的老人，能在70岁这一天重获得自由啊！6月11日，在伦敦温伯利大型体育场，一场以“愿你70岁时获得自由”为题的大型摇滚音乐会隆重举行，这是一个有7.2万人参加、演出长达10个小时的盛会，英国广播公司向全球作了转播。英国公民还发起了一个万人签名送贺卡的活动，以此表达对曼德拉生日的美好祝愿。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芬兰，也都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集会、音乐会，以及示威游行等活动，中国北京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给予声援。世界各国领导人，包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内，纷纷出面表示，应尽早释放曼德拉。

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等国的外长向曼德拉发出了联合贺电：“对于所有为使南非摆脱种族歧视而努力的人

来说，曼德拉成为与这一非人道的和不公正的制度进行斗争的象征。希望曼德拉能够在没有种族压迫的南非自由庆祝自己生日的时刻尽快到来。”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爱尔兰总理豪伊和新西兰总理朗伊发表联合声明：“曼德拉对所有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人来说，都是自由的有力的象征。曼德拉是全非洲人民献身于反对种族隔离主义斗争的代表。他的理想是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各种族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分郑重地指出：“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是南非著名的黑人领袖。他为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争取种族平等和基本人权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赢得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敬佩和支持。”

一时间，全球大地上响起了一个声音：释放曼德拉！还曼德拉以自由！

在南非国内，军队和警察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政府明令禁止一切庆祝活动。但是人们不愿意在无声无息之中度过这一天。温妮于7月18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读了数十封曼德拉生日贺信，其中有国外领导人发来的生日贺电，也有国内教会、学生和工会组织发来的贺信、贺电。非国大主席坦博也寄来贺信，并代表非国大授予曼德拉“非洲民族最高勋章”。

所有这一切，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黑人英雄曼德拉的敬仰，更表达了南非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思念。曼德拉很快在狱中得知了消息，他在监狱大墙之内捎出一封信来，信中说：“就像你们一直想念着我一样，我也时时思念你们。我非常感谢你们大家。我对前途充满希望。”

就在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大势已去，黑人运动以摧枯

拉朽之势动摇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根基的时候，博塔总统于1989年1月突患中风。不得已，他于2月3日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留任总统。这年是白人大选之年，博塔真恨自己早不得、晚不得，偏偏在关键时刻，身体机能出了毛病。其实，这倒和白人政权的种族主义统治相吻合了，这台统治机器的转动也到了勉强维持的地步。原国民党德兰士瓦省主席、现任国民教育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当选为新的国民党主席。自1948年以来，国民党政权第一次出现了两驾马车的现象。无论是博塔，还是德克勒克，心中都十分明白，这只是暂时现象，权力终归要集于一身。他们各自暗中较劲，希望把一分为二的权力再合二为一。

几天后，新上台的国民党主席德克勒克便首先做出了新的姿态，给抱病在身的博塔一个措手不及。他在三院制议会发表了一番讲话，表示要积极促使各种族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就建立一个各种族都可接受的“公正与和平”的制度进行谈判。通过谈判达成一部新宪法，保证一切南非人，不论什么样的种族或肤色，都有政治发言权。他明确表示说，要建立一个消灭种族压迫的新南非。

德克勒克的动作是出人意料的。此前他在担任部长期间，忠心耿耿地追随博塔路线，他主张种族隔离政策，拒绝与黑人组织对话，反对非国大提出的一人一票选举制。特别是担任教育部长期间，责令白人大学必须停止政治活动，否则将以削减政府补贴作为惩罚，从而引起了白人开明人士的不满。所以，人们本以为，他会继承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在种族隔离问题上与博塔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入，根本没有估计到他一上来便以改革者的姿态亮相了。

博塔为此感到浑身的不自在，但是力不从心，他本想再

搏一搏，可实在是没有那份体力和朝气了。这时，国民党出于大选的考虑，纷纷呼吁博塔让位，博塔万般无奈之中被迫妥协，同意在9月份大选后引退。

知道自己政治生涯行将结束的博塔总统，不知是想名垂史册，还是想在最后冲刺一下，总之，他于7月5日把曼德拉接到总统官邸，创下了白人政府首脑与非国大领导人正式会晤的“第一次”记录。在此之前，曼德拉已开始了与司法部长科特西等4名政府官员的对话，他始终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一人一票选举、实行武装斗争、发动群众运动等各项非国大的原则，所以释放只能是无条件的。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与博塔总统直接对话的要求。博塔计划让手下人先出马迎战，自己先不露面，结果，拖至今日，他实在坐不住了，于是主动叫曼德拉前来“饮茶”，摆出了他从未有过的一种政治姿态。曼德拉利用这一机会，正式提出了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思想。

曼德拉指出：

我们国家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是一个长时间引起我极度关切的问题。目前我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有必要紧急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办法……

事实非常清楚，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宣布放弃暴力斗争，并不是政府面临的真正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府还没有准备进行谈判，还没有与黑人分享权力……这是政府拒绝与我们对话的真正原因，也是它要求我们解除自己的武装，而同时它却继续使用暴力对付我们的人民的原因所在……

我相信，绝大多数南非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希望看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紧密合作，为我们国家的新时代奠定基础。在这个新时代，种族歧视和偏见，镇压和反抗，死亡和破坏，都将成为过去。

一个星期后，曼德拉把他的思想主张正式以声明的形式公布出来，他对黑人群众解释了希望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想法。他说：“这个声明并没有背离我 29 年来所坚持的立场，即政府与群众民主运动、特别是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话，是结束暴力冲突，在我国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

根据曼德拉的主张，非国大很快于 8 月份确定了与政府谈判的先决条件，并且在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特别委员会哈拉雷会议上通过。这些条件主要有：释放所有政治犯；取消对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军队撤出黑人城镇；取消紧急状态法。国际社会对此普遍表示赞同和支持。非国大进一步采取行动，在国内黑人群众组织中，统一认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同时扩大与南非各界的接触，阐明非国大的政策，澄清一些误解，以求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1989 年 9 月，德克勒克在全国白人大选中当选为南非国民党政府总统。他头脑灵活，精明强干，带着要在南非大干一番的勇气和信心，登上了南非政治舞台的巅峰。

德克勒克于 1936 年 3 月 18 日，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近郊的梅费尔，这里是白人工人居住区。他的家族在阿非里卡人中具有显赫地位。他的祖父曾经当过两届国会议员，父亲在国民党单独执政后，曾先后任国民党德兰士瓦省总书记、内阁劳工和公共建设部长，以及参议院议长等职务。他的姨

父汉斯·斯特赖顿 1983 年出任南非总理。可以说，德克勒克是在种族主义极其浓厚的白人政治圈子中长大的，从小的政治熏陶，在他人生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于 1958 年毕业于波特切夫斯特鲁姆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之后，他买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雄心勃勃地从事起律师职业，很快就使这家原来很不景气的事务所变得兴旺起来。然而，他并不是单打一地做律师工作，与此同时，他在政治上也有所发展。他先是当选为国民党韦里尼欣区的主席，之后又于 1973 年被选为南非参议院议员，当时他的父亲正就任参议院议长。1978 年，42 岁的德克勒克进入内阁，出任沃斯特总理手下的邮电通讯部长。此后，他春风得意，仕途顺达，又先后担任了社会福利部、体育部、矿业能源部、内务部、国民教育部的部长。当博塔政府的宪法改革搞了个三院制议会后，他又先后兼任白人议会部长委员会主席、议会主席等职务。他一步步地向着更高的政治权位迈进，最后终于在 1989 年 9 月，乘博塔患中风之机，顺势登上南非共和国总统宝座，时年 53 岁。

这位昔日人们眼里的国民党右翼人物，是打着实现种族平等的改革旗号上台的。当年年底，他与曼德拉举行了第一次会晤，曼德拉要求，黑人解放组织在与政府坐下来谈判之前，必须取得合法地位，因此在释放他的同时，必须取消党禁，允许非国大等黑人组织在国内合法存在。德克勒克认真地听着曼德拉的阐述和要求，他需要在 90 年代即将到来之际，做出重要抉择。

此时的南非在国际上已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德克勒克上台之前，与南非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只剩下 22 个，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拒绝承认南非政府。而国际社会广泛的

经济制裁，又使得南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度落入谷底。面对风雨飘摇的白人政权，德克勒克政府是进？是退？是墨守陈规，固守阿非里卡人的阵地？还是大胆改革，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此时此刻已到了刻不容缓、立即做出抉择的关头。德克勒克经过反复地、苦苦地思考，决定审时度势，大胆改革，以“打破停滞、不信任、分裂、紧张和冲突的恶性循环，走向全新的南非”。

● 布满荆棘的改革之路

1990年，是南非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当人类历史跨入新的年代，南非社会也启开了通向新时期的大门。

随着南非政治气候的缓和，世界各地的记者们纷纷飞抵南非，他们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这里将发生重大事变。

2月2日，德克勒克在南非第九届议会第二次会议上，第一次发表议会演讲。他的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议会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他郑重地向在座的议员们、向所有的南非人、向世界上一切关注着南非事态发展的人们宣布：取消党禁，使非国大、泛非大以及南非共产党等政治组织在国内合法存在；解除对包括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在内的33个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的禁令；释放374名政治犯，并准备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部分地解除紧急状态法。同时，德克勒克指出，南非政府已经决定，将在近期内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2月11日，下午4点多钟，曼德拉终于结束了27年之久的铁窗生涯，在夫人温妮的陪伴下，满怀胜利的微笑出现在

监狱的大门外。早已等候在马路两旁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他们使劲挥舞着非国大的黑、绿、黄三色旗，振臂高呼：“非国大万岁！曼德拉万岁！”曼德拉夫妇手挽手，激动地向沸腾人群致意，他们不断地高举拳头，表达胜利的喜悦。

出狱的第二天，曼德拉便在开普敦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有意识地把种族和解的信息传达给白人。他在坚持一人一票的选举以实现多数人统治的主张的同时，明确表示非国大准备在与政府谈判时会作出某种妥协，从而寻找一种对黑人和白人都适合的解决办法。人们看到，经历了漫长铁窗生活的曼德拉，思维敏捷依旧，只是更加老练、稳重，举手投足都显示着黑人民族领袖的尊严和政治家的风度。

2月13日，曼德拉来到了索韦托，这里举行了15万人的欢迎大会。他强调黑人运动内部要保持团结和严格的纪律，他说“纪律和忠诚将使我们得到解放”。到会者大多是黑人青少年，他们敬仰曼德拉，热烈地响应了他的号召。

接着，曼德拉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在那里召开的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被选为非国大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非国大决定，尽快把总部迁回南非约翰内斯堡，并责成西苏鲁负责国内组织的重建工作。同时决定，尽快与德克勒克政府举行会晤，讨论消除制宪谈判障碍问题，必须在消除障碍的基础上，进入制宪谈判阶段。

1990年5月初，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与南非政府代表团举行了首次会谈，8月初，双方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8月7日上午，会谈双方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曼德拉宣布，非国大暂时停止武装斗争。而德克勒克政府的承诺是释放所有政治犯，准许流亡国外的解放组织人员回国，在全

国范围内取消紧急状态，修改国内安全法规。至此，双方就消除制宪谈判的障碍问题已达成协议。这是非国大与政府加强合作，有意加快政治解决步伐的结果。第二次会谈后，曼德拉接受了南非电视台的采访，他说，现在通往全面谈判的道路已经畅通。因此，接下去的任务，应当是转入实质性的制宪谈判了，那将是比消除谈判障碍更为艰难的工作。

制宪谈判的目的是制定一部新宪法，在这部新的国家根本大法中，要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重新规定新南非社会制度、政权机构和公民权益的基本准则。这是一件关系到各个种族和部族重大政治经济权益的大事，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协调问题，因此，制宪谈判的进程中，必然充满了艰辛。

影响谈判进程的各种因素很快暴露出来，它们来自各种矛盾和斗争，有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有黑人内部的暴力冲突，也有白人内部的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间的利害冲突，而所有这些矛盾和斗争又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谈判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谈判最大的阻力，首先来自白人方面。他们自从来到南非土地上，就把自己放到了优于黑人的地位，以当然统治者的身份占领了一块块土地。南非联邦成立后，随着种族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白人成了南非的特权阶层，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利益。“白人至上”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时突然让他们接受白人与黑人平等的思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是不会眼看着白人特权的大厦即将坍塌而无动于衷的。

南非白人在南非人口中仅占13%，他们担心黑人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力后，一人一票的选举将造成黑人对白人的统治。因此，许多白人强调“集团利益”原则，主张以种族集

团为基础，分享政治权力，从而建立一个白人拥有否决权的立法议会。

此外，来自白人右翼势力的破坏力量是南非政府实行改革的一大障碍，也是谈判进程中的一大隐患。白人右翼约占白人选民的30%，其中最大的政党是1982年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保守党，它成为白人右翼势力在议会中的代表。保守党中有一批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他们反对与黑人分享权力，坚持按种族分割南非，主张建立排斥其他种族的“白人家园”。1990年德克勒克的改革路线逐渐明朗之后，保守党对制宪谈判的计划进行了种种阻挠和威胁。他们与院外的极右翼白人组织相呼应，对政府改革施加压力。南非社会上的极右翼白人组织曾经多达100多个，后来合并为20个左右。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阿非里卡抵抗运动，这是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准军事组织，拥有大约1万名成员。如果说保守党起码在口头上还表示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那么极右翼白人组织则公开声称要用武力保卫阿非里卡人的利益。他们不断制造暴力恐怖活动，不仅暗杀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开始了对白人开明人士的暴力行动，并在政府办公地点搞爆炸活动。他们认为德克勒克对非国大的每一点妥协和让步，都是对阿非里卡事业的背叛，因此，他们扬言要暗杀德克勒克、绑架其亲属，甚至推翻现政府。

右翼白人的活动，给德克勒克政府的改革带来很大麻烦，使政府在同非国大的谈判中受到牵制。这些组织代表了社会上一批靠享受白人特权过日子的阿非里卡人的利益，其影响不容低估。1992年英国BBC电台曾经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1991年8月有关报道说，阿非里卡抵抗运动的成员可能不足万人，但其支持者可能是其成员的50倍。他们有能力制造混

乱。他们公开宣布，到时候要杀德克勒克，再杀曼德拉。1992年10月份，据警方估计，这一组织的武装人员已达到1.6万人。

除了白人右翼势力以外，来自黑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也是影响南非改革与和谈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黑人内部，因卡塔与非国大的矛盾最为突出。这两大组织的支持者之间时常发生暴力冲突，从1987年到1991年，双方便有5000人在冲突中丧生。

因卡塔是仅次于非国大的第二大黑人政党，它的领导人是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布特莱齐。他出身于祖鲁族的部落酋长家庭，1977年起一直任夸祖鲁首席部长，他常常自称为900万祖鲁人的领袖。70年代初，他创建了“民族自由”政治组织，简称“因卡塔”。1975年，这个组织改名为“民族文化解放运动”，1990年7月再次改名为“因卡塔自由党”。

布特莱齐早年受非国大的影响，曾加入非国大青年组织，当过卢图利的助手。非国大被取缔后，他提出取消对非国大的禁令的要求，继而又要求释放曼德拉。直到70年代中期，因卡塔与非国大都保持着良好关系，非国大甚至认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替代被取缔的非国大，率领黑人群众反对种族主义制度。但是从70年代末开始，因卡塔与非国大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出现分歧，以后矛盾不断加深。比如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因卡塔反对使用暴力，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这与非国大坚持武装斗争的观点有很大区别。又如在国际制裁问题上，因卡塔反对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制裁，认为制裁的受害者最终是黑人，这与非国大呼吁制裁南非的立场是相违背的。以后，政治分歧不断扩大，并演变为暴力冲突。

1990年南非改革进程开始后，德克勒克政府以非国大为黑人组织代表，以曼德拉为黑人领袖，共商南非改革大计，使南非逐渐出现了政府与非国大在南非改革的舞台上共唱主角的局面。相形之下，一直视自己为黑人领袖、视因卡塔为南非政坛主角的布特莱齐，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他认为在南非民主改革进程中因卡塔的地位受到排挤，于是更增添了对非国大的不满情绪。为了表明因卡塔的政治存在，他不断攻击非国大的政治主张，在制宪谈判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出难题，搞刁难，节外生枝，变幻莫测。他甚至直接策划对非国大成员的暴力袭击事件，以致使两大黑人组织间的暴力流血冲突愈演愈烈。白人右翼势力乘机插手，支持因卡塔与非国大抗衡，以破坏南非改革进程，从而使得黑人组织间的矛盾更加复杂。

为了顾全大局，推动改革，曼德拉于1991年1月29日在德班与布特莱齐举行了首次会晤，达成和解协议。然而，问题的解决并不那么简单，暴力冲突仍在发生。非国大敏感地意识到，因卡塔背后肯定有人支持、操纵它。果然，当年夏季“因卡塔门”丑闻的曝光证实了这一看法。政府法律秩序部长弗洛克不得不承认曾向因卡塔秘密提供资金25万兰特（约合10万美元）。顺藤摸瓜，进一步又了解到，南非军队对大批因卡塔成员进行过秘密军事训练；警察纵容因卡塔成员携带长矛、刀、斧在黑人城镇武装示威，殴打、杀害非国大的支持者。东窗事发后，德克勒克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并于7月29日宣布撤销法律秩序部长弗洛克的职务，同时撤销国防部长马兰的职务，以求平息由此引起的轩然大波。

改革的道路上阻力重重，甚至曾经与非国大同甘苦、共患难的泛非大，起初也反对进行制宪谈判，他们代表黑人左

翼组织的观点,认为南非政府没有为谈判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仍然不放弃武装斗争。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泛非大一度改变了拒绝与政府谈判的立场,在推动南非制宪谈判问题上,采取了与非国大合作的态度。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自己一方提出的意见在多党制宪谈判预备会议上未被采纳,泛非大又愤然退出谈判。直到1993年,它才在形势的变化发展中权衡利弊之后,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此外,非国大与黑人部族保守势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部族的保守势力以某些黑人家园的领导人为代表,他们是种族主义制度下政府的家园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已成为黑人中享有权势的人物。因此,当非国大积极推进南非民主改革进程的时候,他们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看到,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产物,黑人家园已岌岌可危,于是,在民主改革进程中他们明显右倾,力图保住到手的权力和已享有的利益。这种情况,必然为制宪谈判的进行又增设了一道障碍。

● 制宪谈判扬帆起航

德克勒克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执掌南非政权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而他本人,又在南非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表现出自己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胆识和勇气。

1991年上半年,南非议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种族隔离法令。先后有80多项种族主义立法被废除。到6月份,作为种族隔离制度支柱的几项法令:《土地法》、《集团住区法》、《人口登记法》全都被废除,至此,从法律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失去了使其合法化的根基，这是南非向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迈出的重要步骤。为此，有人评论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丧钟敲响了。

现在，摆在南非政府和黑人解放组织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新宪法，以取代维护白人统治的旧宪法。

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91年10月，由非国大和泛非大共同发起的爱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德班召开，有90多个政党和组织出席了大会。参加爱国阵线的各党派在制宪谈判的原则立场上达成共识，即现有的宪法是不能代表人民意愿的种族主义宪法，必须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制宪会议，起草和通过新宪法；在制宪谈判期间，由过渡政府而不是现政府管理国家，并由过渡政府监督选举，保证公正地向民主制度过渡。曼德拉认为：

南非爱国阵线的意义就在于把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解放组织团结起来，南非人民要用一个声音说话。

1991年12月，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民主南非大会”，共有19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来自联合国、英联邦、非统组织的100多名观察员也应邀出席。会议由首席大法官科比特主持。他说，这次会议将就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成立过渡时期临时政府、选举产生制宪议会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各方代表共同签署了一个《意向宣言》。宣言指出，要努力建立“一个不被分割的南非；全国人民具有共同的公民身份、爱国主义和忠诚；追求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而不论他们的种族、肤色、性别和信仰；使南非成为一个没有

种族隔离和任何其他形式歧视的国度”。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都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曼德拉说：

民主南非大会为我国尝试建立民主制度提供了第一次机会……对全体南非人来说，建立一个南非、一个国家、一个选举制度、一个前途的时刻已经到来。

德克勒克则表示相信：“谈判形成的建议将会得到全体南非人的全力支持。”

南非制宪谈判由此正式拉开帷幕，它标志着南非的民主改革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非处在了政权转变的关口，来自各方面的力量相互间展开了激烈较量，有公开的，有暗中的；有和平方式的，也有暴力手段的。各种力量都希望在未来南非新政权中争得一席之地。对于已经开始的制宪谈判，各方的矛盾和分歧日趋明朗化，非国大与南非政府的主张表现出很大差异。

在制宪机制问题上，非国大和爱国阵线主张，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负责起草制定新宪法；南非政府则认为，没有必要产生制宪会议，多党制宪谈判即可讨论制定新宪法。

在过渡政府问题上，非国大主张在制宪期间成立一个由多种族成员组成的过渡政府，由它管理国家，并监督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以及监督大选；南非政府则坚持现有议会和政府的合法性，声称新宪法产生之前不会交出权力，但又表示将考虑与黑人分享过渡阶段的权力问题。

此外，在过渡时间上和新南非的政府组成，即权力分配等问题上，非国大与南非政府之间也都存在着很大分歧，最

后达成在大选后建立过渡性的全国团结政府、过渡期为 5 年的协议。

南非各种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白人右翼的破坏和干扰、黑人内部的不和与暴力冲突、黑人部族保守势力的对抗、军警中保守派的血腥屠杀，以及德克勒克政府极力削弱谈判对手以维护更多的白人利益的态度，使得整个谈判过程一波三折。时而进展顺利，时而艰难曲折；时而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时而互不让步陷入僵局；时而取得突破性进展，时而被迫中断。改革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暗礁、险滩，但是改革毕竟是众望所归的历史潮流，绕过暗礁和险滩，改革之舟仍要扬帆乘风，向前航行。

面对白人右翼势力的激烈反对，德克勒克果断决定于 1992 年 3 月举行南非白人公决。他要求白人选民在赞成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与反对改革坚持种族对抗之间作出抉择。他说，如果投票结果表明白人多数是反对制宪谈判的，他将辞职。当时，南非各界对白人公民投票的结果都不敢抱乐观的态度，因为除了白人右翼势力坚决反对政治改革以外，白人中改革前景忧虑、担心、甚至恐惧的心理也十分严重。德克勒克要推进政治改革和谈判的进行，必须证明自己是代表大多数白人利益的，否则，不但自己心里没有底，在社会上也难以对付来自白人内部不同派别的指责和干扰。3 月 17 日，南非政府举行白人公决，白人公民的 85.5% 参加了投票，结果支持德克勒克政府民主改革的赞成票为 68.7%，获得压倒多数。德克勒克为之兴奋不已，他信心倍增，在国内外的声望也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1993 年制宪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在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之后，一度中断的谈判于 1993 年 4 月重新恢复。代表性更为

广泛的 25 个政党和南非政府共 26 个代表团参加了谈判。就在人们对民主改革进程重新寄予希望的时候，又发生了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哈尼被枪杀的事件。这是白人右翼分子所为。这一血案比上一年曾经发生过的几次惨案对南非政局的影响都大，因为哈尼不仅是南非共产党总书记，而且是非国大少壮派领导人之一，在广大黑人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普遍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曼德拉的接班人。并且，这一事件的发生又处在南非重开制宪谈判的紧要关头，已经启开的希望之门是否会再一次关上，南非各界表示极大的关注。在一些地区，被激怒的黑人对改革进程的缓慢失去了耐心，发生了抢砸商店、烧毁汽车、攻击白人的事件。

非国大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他们必须控制形势，保证多党制谈判的继续进行。哈尼遇害当晚，曼德拉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呼吁黑人保持冷静和克制，不要被企图破坏改革进程的人所利用。非国大明确指出，不要对白人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因为这不是种族斗争；当务之急是保持政局稳定，加快政治过渡，尽早确定大选日期。

非国大的说服和引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绝大多数黑人表现了克制，使得这一事件不仅没能阻止制宪谈判和民主改革的进程，反而促使南非各方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加快了谈判步伐。在各方的努力下，谈判取得历史性突破。

6 月 15 日，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讨论确定了南非大选日期，因卡塔自由党等 6 个政党和组织提出异议，并退出会议。剩下的 20 个党派不受其影响，继续讨论，最后一致通过决议，确定 1994 年 4 月 27 日为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日期。这一决定又在 7 月 2 日的多党谈判论坛上被正式批准。

9月23日，南非议会特别会议通过了经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批准的“成立过渡行政委员会”的议案。根据这项议案，过渡行政委员会将行使政府的部分职能，并主持1994年的大选。过渡行政委员会下设几个分委会，分别主管地区和地方政府、法律、秩序和安全、国防、财政、外交等方面的事务。12月7日，由多党代表参加的南非过渡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南非由白人单独执政的历史的结束，从此开始了多种族政治代表共同管理国家的新的历史篇章。

12月22日，南非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非种族主义临时宪法，这表明南非种族主义隔离制度在法律上被彻底废除。临时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益受到宪法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一切种族歧视。多少年来，南非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将种族隔离制度合法化，黑人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受教育权利等所有公民权利被剥夺殆尽。如今，终于有了一部能够反映南非各种族利益的临时宪法，不能不说是南非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曼德拉对此的评价是：

宪法草案的通过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从1990年8月非国大与政府就扫除谈判障碍问题举行会谈算起，到临时宪法的诞生，制宪过程已经用3年多的时间；如果从民主南非大会的召开算起，也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至此，多党制宪谈判完成了它的历史重任，正式落下帷幕。

1993年，是南非民主改革取得辉煌成果的一年。在推动

新南非诞生的艰难历程中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1993年10月，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受之无愧。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总统拉齐拉卡早就说过：“德克勒克和曼德拉这两人是注定要一起成功或者一起失败的。”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使命把他们俩人紧紧连在了一起，应当说，他们一起走向了成功。

国际社会对南非的改革进程给予了密切关注和充分肯定。1993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取消对南非的一切经济制裁，不久，欧洲共同体也决定取消对南非的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诺向南非提供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南非经济走出困境。中国政府也宣布恢复同南非的经济贸易关系。非洲国家相继与南非恢复建立了外交关系。

● 新南非的诞生

南非民主改革进程进入了全民大选准备阶段，各党派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活动。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越来越激烈。白人右翼组织扬言，不惜用一切手段维护白人统治，阻止新南非的到来。直到1994年3月中旬，因卡塔自由党还在抵制大选，继而提出推迟大选。处于主导地位的两大大政党——非国大和国民党，分别代表着多数黑人和多数白人的利益，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他们不共戴天；在制宪谈判过程中，有斗争、有合作；如今，他们决心排除一切阻力，使大选如期举行，以便使南非尽快走上政局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正常轨道。

南非历史上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大选在即，一个民主、统一、种族平等的新南非呼之欲出。力图推进南非政治改革进程的政治家们，胸怀雄图大略，雄心勃勃地设计着新南非的蓝图。

为确保大选和平、公正地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定，将派遣近 1800 名观察员前往南非监督选举。接着，非洲统一组织、欧共体、英联邦也决定派遣观察员赴南非监督大选。

为了给大选铺平道路，4 月 18 日和 19 日，德克勒克、曼德拉和布特莱齐举行了紧急会晤。会后签署了《和解与和平备忘录》，因卡塔自由党在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宣布参加全国大选。

4 月 26 日至 28 日，南非第一次全国大选如期举行。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利的黑人群众兴奋异常，许多人激动得夜不能寐，半夜就来到投票站等候投票。

在夸祖鲁首府乌伦迪附近的一个小镇子上，有位 108 岁的老人，她一生受尽歧视。投票那天，她在儿子们的帮助下，到投票站去了两趟，但是由于选票没有及时送到而没有投成。最后一天的下午，选票到了，她再一次赶到投票站，第一个投下了庄严的一票。当记者上前问她对大选如何看时，老人举起双手激动地说：“我是南非走向民主的见证人！”

索韦托是曾经发生过学生暴动的地方，投票那几天，这里秩序井然。一位中年孕妇在妇产医院里参加了投票，第二天她生了个男孩。她高兴极了，她说：“我的孩子与新南非同时诞生！”

曼德拉在纳塔尔省德班市的一所中学里参加了投票，他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我们几十年的希望和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德克勒克在夫人的陪同下，来到比勒陀利亚的一所小学投票站。他在投票后感慨地说：“今天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全南非共有 2200 多万选民参加了投票，对其中大部分人来讲，是生平第一次平等地参加大选。选举结果揭晓了，非国大获得 62.65% 的选票，国民党取得 20.39% 的选票，因卡塔自由党得票 10.54%。非国大大获全胜！

人们涌上街头，欢呼雀跃。非国大于 5 月 2 日举行了庆祝大会，曼德拉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人们太激动了。在经历了 300 多年最残酷的种族压迫和无数次血与火的抗争之后，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终于在自己的国土上站起来了！

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当选为新南非第一任总统。5 月 10 日，在比勒陀利亚举行了新总统宣誓就职大典。这位南非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国内外来宾的注视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我在此郑重宣誓忠于南非共和国，作出真诚庄严的保证：自始至终推动那些将促进共和国利益的事业，并反对可能危害共和国利益的事情……

曼德拉充满激情的浑厚嗓音在新南非的大地上回荡。

大选后产生的民族团结政府也于第二天宣告成立。这是一个以曼德拉为总统，以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主体的新政府。它不仅表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已经成为历史，而且宣告了一个由南非黑人多数领导的种族平等的新政权的诞生。

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充分体现了民族和解的精神。第

一副总统由非国大全国主席姆贝基出任；第二副总统由国民党领导人德克勒克出任。在政府内阁的 27 个部长职位中，非国大得到 18 个，国民党取得 6 个，因卡塔自由党获得 3 个。内阁权力的分配体现了多党合作的精神，符合临时宪法关于分享权力的原则。总统曼德拉表示，所有南非人，不论其肤色，同属于一个民族大家庭和一个国家，他愿为建设新南非与德克勒克、布特莱齐通力合作。第二副总统德克勒克也表示，将全力支持曼德拉的工作。

由红、白、蓝、黑、绿、黄 6 种颜色组成的新南非国旗已经在南非的大地上冉冉升起。然而，曼德拉政府没有时间去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它全力投入了重建南非经济、妥善处理新时期各种族和部族间的相互关系等艰巨的工作任务之中。

尾 声

摆脱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桎梏、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的南非，日益显露出其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巨大潜力。虽然由于历史上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长期影响，南非经济存在着许多缺陷，但是它却已作为非洲经济的最强国而崛起。这个仅占非洲总人口 6%、土地总面积 4% 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全非洲的 1/3，属非洲第一位。它不仅工业门类齐全，钢铁、煤炭产量居非洲之冠，黄金、钻石生产位于世界前茅，而且拥有十分发达的农业，它已成为邻国粮食进口的主要供应国。

走过了艰难历程的南非人民，正在为南非的振兴和繁荣继续努力着。人们相信，南非将在非洲和世界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就在本书即将收笔的时候，从南非国土上又传来新的消息：1996 年 12 月 10 日，曼德拉总统在沙佩维尔签署了 344 年来南非第一部非种族主义的民主新宪法，南非各政党历时 5 年的艰苦制宪、修宪进程，至此宣告正式结束。

这部作为南非根本大法的新宪法，是南非人民经过上百年的风风雨雨，历经坎坷和磨难，赢来的种族团结、民族和解的胜利成果。它将以 11 种官方语言印发全国。

南非总统曼德拉在签署新宪法后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各种场合进行呼吁，不论是泛非大、民主党、自由阵线、因卡塔自由党或是国民党，这些党派里面都有好人。作为南非领导人，我们的责任是发现这些好人，创造一种环境，能使这些人的聪明才智、专业知识和丰富阅历为整个社会服务，使所有南非人民受益。

沙佩维尔的签署仪式，使人们不禁又想起了 1909 年制定的种族主义联邦宪法，又想起了 1960 年的“沙佩维尔惨案”……但是，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南非今后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还很长很长，然而它充满了希望和光明。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AyNTkxMz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259138.zip",
  "filesize": 12597076,
  "md5": "ad97d0c4ae3fc3a14729e460fd40ccab",
  "header_md5": "e8ce083b0b5876b9077a74d2e3bd4088",
  "sha1": "76ed9ebb95bda313ec7eaf3bf2fe2ff5beed32f3",
  "sha256": "0818053148473ba614c98124eb1d7353fd315567028bac7047245d51ac9c061f",
  "crc32": 284042165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2773338,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5d\u03a6\u2500\u2564\u2514\u00b7\u2502\u2560\u00fa\u2551\u2500\u2567\u2556\u255f\u2556\u2524\u2553\u2553\u256b\u03c3\u2553\u2248\u2565\u03c3\u2562\u2556\u2552\u2219\u2569\u255d\u2500\u2310\u00ed\u2556_10259138",
  "pdg_main_pages_found": 197,
  "pdg_main_pages_max": 197,
  "total_pages": 207,
  "total_pixels": 79634772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